

新 中 學 文 庫
啼 笑 皆 非

林語堂原著並自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林語堂原著並自譯

啼

笑

皆

非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此書贈良友

華爾士先生

賽珍珠女士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

——孟子

我的朋友，你是這偉大賢達雅典強邦的公民，何以汲汲名利權勢，而忽略道義與真理？

——蘇格拉底供辯

建造和平世界，不是簽訂條約所能達到的。釐正倫常，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到，但欲求和平，非先正人倫不可。

——羅斯福夫人

中文譯本序言

——爲中國讀者進一解——

本書原名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作於三十二年二月，三月中旬脫稿，七月紐約出版，年底已五版。當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蓋一感於吾國遭人封鎖，聲援無方。再感於強權政治種族偏見，尙未泯除，三感於和平之精神基礎未立，大戰之宗旨未明，大西洋憲章之適用範圍未定，自由與帝國之衝突難關未破。甚或爲帝國主義張目，或倡武力治安，或斥世界平等聯邦而盛倡武力挾制天下。以此國外民衆旁皇炫惑，莫知適從。時余憧憬乎第一次大戰之際，威爾遜高舉正義之旗，天下聞風而起，一若世界新紀元即將實現，不禁爲之慨然。蓋自凡爾賽和約以後，世事每況愈下，各國爾詐我虞，廉恥喪盡，正義無存，以致造成一般悲觀氣氛。理想家不敢復言『了結戰爭之戰爭』，現實主義者愈昌言強權政治，而『第三次大戰』之名詞，已疊疊見諸文字報章，出諸政界名流之口。好夢打破，花落烏啼。余有感於懷，乃作是書，以究世亂之源。其言苦，其志哀，雖謂用血淚寫成，未嘗不可。

是書主旨，可以一言蔽之，卽由現此戰事戰略之處置，明強權政治之存在，由強權政治之存在，推及物質主義之病源，再由物質主義之病原，追溯歐西百年來學術思想上自然主義，科

學定數論，及悲觀思想之所由來，而後指出最近科學思想之轉變，可以打破唯物觀念，改造哲學基礎，復建精神與物質之平衡配合，使人道主義得超越自然主義之上。由人道與自然之新配合，宇宙觀人生觀必隨之而變，即見老莊與恩斯坦相去不遠，東西哲理，可以互通，而人道得以重立於人間。

書分四卷。卷一論『局勢』，陳敘今日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大戰之伏機。卷二論『道術』，指出道術之淪喪，及以物質主義方術解決危機之錯誤。卷三論『徵象』，批駁現行戰後和平之各種論著，以見今日思想之癥結。卷四論『治道』，由學術思想上分析近百年來文化之去向，及推陳人道掃地之史因，並由科學窮極思變之新傾向，透入一道曙光，排脫唯物機械論，重立自由意志論。以內容言之，卷一多談亞洲復興所引起之新局面。卷二多論種族偏見，歐化愚見，數學迷信，機械心理等小枝節。卷三多舉今日西方討論和平之方案。卷四專談學術思想哲學基礎問題。

讀此書者，應從頭讀起，順序而下，以見前後貫串。蓋本書構法，似抽芭蕉，錢大昕『養新』之餘意也。今日戰事及國際政治，僅係外層而已；剝其外層，便見強權政治（卷一卷二），再剝強權主義，便見物質主義（卷三），復剝第三層，便見科學定數論，自然主義悲觀主義（卷四『當代篇』『化物篇』），是為診斷之結論。最後三章（『齊物』『窮理』『一揆』），乃言哲學家道之新建設，及世界和平之原理。末附後序，以寄感懷。

世人有可與言者，有不可與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書譯出，公之吾國讀者。吾不欲失言，故請斷章取義歪曲事實之專家勿讀吾書。惟求得關心治道之有心人，讀到一二道得衷曲之處，領首稱善，吾願足矣。不可與言者，姑無論矣，復爲可與言者進一解：

一、本書原著，係爲西方人士而作，所謂對症下藥也。不知其病，便不解醫士何以開此藥方。若物質文明，提高生活程度，非不美也。矯而正之，因其過猶不及也。提高生活程度，不應反對；惟以提高生活程度爲人生文明之全部，混文明文化爲一談，便須反對。今日果有人，以爲叫世人每日有四杯牛奶可喝，世界使會良善和平起來，不喝牛奶或居竹籬茅舍者，便是野蠻，此便須反對。經濟保障，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養，不應反對；惟以經濟保障代替世界之自由平等，而認爲此次戰爭目的之終點，並且捨棄自由平等，因求保經濟保障，而瓜分人國，攫取物資，召未來戰禍，便應反對。自然科學，人人贊成，無一疵可摘；惟自然科學之唯物觀變爲一切人生之唯物觀，生出冷酷逆情之強權政治，鬭爭主義，便非反對不可。

二、物質文明好，物質主義不好，言其過也。是猶充實國防好，窮兵黷武不好，亦言其過也。西文字面加『主義』(-ism)者，常含有過分之譏，若『物質主義』，『武力主義』(militarism, militarism)是也。又如『商務』，原爲“Commerce”，第加-ism，便成“Commercialism”，即所謂『金錢主義』而富貶意，亦言其過也。反觀吾國，物質文明之病，在於『不及』，而不在『過』。人家已過，我尙不及，故非趕上不可。吾國今日正應大聲疾呼，提

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窮，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無一非物質條件，故必趕上物質文明。今日吾民穿的苦，吃的苦，住的苦，行路苦。民生主義便是我們共同的好夢，大家應趕緊把我們的國家弄好，希望老百姓大家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行路便利，成一富強康樂氣象。且應大家留心，這個世界並不是好世界，是強權世界。故尤應大聲疾呼，提倡生產救國，靠一股氣趕入工業時代，否則不能自存於此世界。此為富國之唯一基礎，建國之前提，即因工業化而生出西方工業社會之複雜問題，亦所不顧。惟日本學西洋物質文明，並學其物質主義，及其所生之商業主義，侵略主義，帝國主義，是則不可不於理論思想上，先為之防。

三、東方西方，皆有精神文明，皆有物質文明。孟子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及斧斤以時入山林等。曰畝，曰桑，曰斧斤山林，無一而非言物質。倒底物質講得不澈底，故『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物質文明，人家已做到，我在孟子二千餘年後尚未做到。然孔子言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便是孔教視精神重於物質，精神物質皆兼言之，而得中和平穩之論。西人治科學窮宇宙之理，豈非精神方法，民主政治成功，豈非精神教育？故言東西文明之異同，乃言各有畸輕畸重而已。西方學術以物為對象，中國學術以人為對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誠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遠，精深廣大之處，我不讓人；精詳嚴密，窮理至盡，人定勝我。是故上識之士，以現代文化為全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國文化，亦不燧

鑄爲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長，補人之短。（如欲發展中醫，必先能將中醫打進『西醫』——即世界唯一共同之醫學——圈子裏去，混爲一部，然後可以有貢獻於世界醫學。）嘗謂近代真能學貫中外者惟總理一人，因其能兼容並蓄，融會貫通，故並能救西方資本主義之弊。總理常言：『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是善讀易者，何來不許中國人讀易？中識之士，眼光所及僅限本國，不足以言補救世界文化，但亦可採人之長，補己之短。下識之士，僅知有我，不知他人；人家大好科學排在目前，尙不知襲來而爲己用，若不肖子孫，不知發揚光大祖業，惟日數家珍以示人。但此輩尙不失爲中國人，惟有洋場孽少，認爲固有文化整個要不得，不曰士大夫意識，則曰小資產階級，並忠孝廉節，一切詈爲封建，必欲行其根本毀滅中國舊社會之陰謀而後已。此輩一見西方文物，則捧屁而恭聞，稍談孔孟周易，則掩鼻而却走，是爲亡國滅種思想，名爲摩登，實則買辦之流亞，民斯爲下矣。

本書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自譯，十二篇以下，由徐誠斌先生譯出。此次回國途中，校閱略覺匆促，未當之處，容再版時修正。原文所無，譯文中加釋加註之處，以（……）號別之。

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於重慶

原序

此書之作，因有些不得不說的話，待要明白曉暢把他說出。

今日世界正需曉暢平近道理，用曉暢平近的話申說出來。當代亂世學者越講越糊塗，要闢邪說明明德者卻須明暢為主。

當代的問題是道術淪喪及其振興的問題。一把沙塵，可起信念。讀了萬卷條頓哲學，不如聽一朵野玫瑰說法。

這些話不知從何說起。皇天默佑，賜我勇氣把他說到底。

第三次大戰烏雲已籠罩天邊。大家眼快心靈，尋箇活路出來。

目錄

中文譯本序言——爲中國讀者進一解——

原序

卷一 局勢……………一

前序第一……………一

業緣篇第二……………一

時變篇第三……………一九

述古篇第四……………二五

證今篇第五……………三四

果報篇第六……………五二

卷二 道術……………六一

排物篇第七	六一
明樂篇第八	六九
卜算篇第九	七七
明禮篇第十	八五
歐化篇第十一	九〇
愚民篇第十二	九六
歧路篇第十三	一二二

卷二 徵象……………一二三

強權篇第十四	一二三
不爭篇第十五	一二九
簿書篇第十六	一三四
血地篇第十七	一四八
亡道篇第十八	一六〇

卷四 治道……………一六五

當代篇第十九	一六五
化物篇第二十	一七七
齊物篇第二十一	一八八
窮理篇第二十二	二〇一
一揆篇第二十三	二〇七
後序	二一五

啼笑皆非

卷一 局勢

前序第一

此篇自述
並解題

我正濡墨下筆宜洩積憤之際，卻不免遲疑一下，未知吐露真情直書所懷，是否值得。問題不是於我值得，乃於讀者值得與否。我已確定這是值得的。蓋凡著書行世，必使作者讀者之間，真能開誠相與，暢所欲言，始能開卷有益，而欲如此，必使讀者相信，可以聽到作者肺腑之言，宛如良友夜談解衣磅礴一種境地。良友爐邊夜談，決不至意不得宜，最多意見不同而已。然同意小事也；意見不同始可收他山之效。在這種夜談，大家每每吵得臉紅耳赤，然後前所未達者，渙然冰釋。凡作者肯流露真情，決不致爲人所誤解，況且有時肯聽諍言，互相規諫，才算是真友。

於此不妨先說我個人衷曲的事。這一月來，恹恹迷離，如在夢寐間。回想起來，一片漆

黑，只記得半夜躺在床上驚悶，輾轉思維，怎樣攻破這鐵一般的華府對援華的封鎖線。還半夜不寐，揣摩羅斯福總統給我們的悶啞謎。羅斯福說：『就以目前而論，我們空運輸入中國的物量和滇緬公路所運相等。』這句話委實俏皮，可是令我不快，我不願聽人家對於我國戰時急需品之接濟說俏皮話。到底航運多少噸量，我有確數，這確數中外官方始終不敢公布出來。這真是最後一根草，把這沉着負重的中國駱駝壓壞了。恍惚有人打我一記耳光，耳鳴眼昏，不省人事。

且聽我告訴你，這駱駝是怎樣壓壞的，我已經歷次遭人打耳光；準確的講，是我國遭人打耳光。但在我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樣。也會聽見俘虜受日人批頰，竊想耶穌對此應是何種意見。耶穌遺訓，只說到第二次批左頰而止；倘是左頰轉後，又來第三第四個巴掌，應當取何態度，聖經沒有明訓。傷頰倒不打緊，侮辱才真難受。人家自私自利，這也容易諒解，不易諒解的是悻悻無禮。偶然無意中挨踢一下也無妨，可是人家踢你之後，聲明你挨踢一脚又何妨，或是說他是偶然踢你玩的——這就難受。美國連汽油爛鐵供給日本轟炸中國婦孺，這美國人知道，我也知道。中國人有『堅忍』的特長，是忍得住的。作一個比方的話，假如此刻，在日美作戰之時，中國宣告中立，而以爛鐵供給日本，同時盛稱『中美友誼』，並褒揚美國『英勇的抗戰』，在此情境之下，美國輿論與外交界能否像中國在珍珠港以前的寬宏大度，就頗有疑問。但難受的是羅斯福於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洋洋得意，誇

贊這爲虎謀皮政策的『成功』；這便是我受批第一類。自然說話傷人，都是出於無心。可是這一巴掌，足使以前種種的小磨難都置之腦後——歷次外務部對於日本損害美國在華產業利權的層層抗議；或者蕪湖一座洋棧和三條板凳受損害，或是鎮江一座禮堂和四隻貓被摧殘，而對於轟炸中國婦女卻一字不提。

第二次批類，是倫敦政府第二次下令封鎖緬甸公路。事實已經證明，鄰邦始終無意用自己的軍隊去堅守緬甸，同時又不早讓中國大軍入境共守，其名雖非下令封鎖緬甸，其實卻與下令無別。但是誰想到退出緬甸之後，會有一位英國將領表示『滿意』，誇稱這場戰役『贏得三個月可以鞏固印度的邊防』。

第三次批類，是租賃案運到緬印的中國物品，遭人扣留，而中國政府事先不曾被通知或磋商。

第四次批類，是緬甸封鎖之後，華府吏從中作梗，抵賴搪塞，不肯稍盡微力，以適宜航空運輸補救維持。

第五次批類，是中國軍事代表團來華府，供給專家的知識經驗，協助友邦擬訂共同攻日戰略，卻遭人冷落不理。

第六次的重巴掌，是侮辱中國的謠言盛傳華府，說中國是『法西斯蒂』是『帝國主義』，是將資濟物品『屯積』起來。這些謠言用意，是表示中國不值抬舉，所以不給援助，甚爲合

理，並且活該。

經過這幾次巴掌之後，又來羅斯福總統，在中印航運情形令人髮指不堪公布之際，說那俏皮話，聲稱那情形好的無以復加，這自然把中國駱駝壓壞了。至少，我一個中國人不覺得那句俏皮話有什麼好笑……以後，卡薩布蘭卡會議開完，巧詞遁飾，或簡直撒謊，說史達林反對邀請蔣介石云云，繼續使我在一月來昏迷若在夢中。

到了昨天下午，我到隣近街坊去散步，打算尋箇究竟，把這團縈紆鬱悶之氣打開，提防得個神經衰弱症。我立定主意，要用美國人的眼光來看我國，同時要把眼光放遠，看看此後幾十年中國在世界政治之發展。由此得兩條結論。

第一條結論，在一月來已在我心裏逐漸形成，就是此後幾十年間，中國必須以友邦資格與英美攜手。同時這政策附帶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依照這次在戰爭期中之經驗，無論世界聯治取何方式，中國決不會受人平等待遇，因為中國是亞洲黃種。如依同盟國的主張行去，停戰時中國連一個雛形的空軍都不會有。要人家平等待遇，須再過二十年等到中國像日本一樣，能自己造軍艦、飛機、大砲、坦克車。到那時候，也不必去爭什麼平等不平等，因為這是現代文明的『世法』。這時候未到以前，中國遵照先哲古訓，『大智若愚』，尙可以吃得消幾次的侮辱，受得住幾記的耳光。就是日本也得暫時忍受五：五：三的侮辱；這海軍比例影響日人心理之深，絕非西人所能推料或理解。但是中國向來有寬大、容忍、講理的精神，足以對付這個

局面。第二個條件是，中國須學西方各國過去及現在的模範，以本國私利爲前提。這種友邦的資格，不應妨礙中國去謀私己的利益，自力更生。爲達到與西方列強平等唯一的途徑，如有同樣情形發生，也不應妨礙他去供給汽油爛鐵給他『友邦』的戰敵，或是封鎖『友邦』的生命線，以買中立強國的歡心。

我已看準，這是必然之勢，是中國達到國際平等地位所必趨的路，什麼溝通文化促進邦交的話都不關事。因爲今日中國初次加入列強團體，正像小兒初次上學。這小孩的母親諄諄囑他入學要謙恭和讓，才不愧爲有禮人家的子弟。但是我是這小孩的親叔，那個學堂已進過了，那般學生的道德行徑也深知熟悉了。這親叔看見他姪兒頭一天回家路上被同學毆打，就脫下長褂，教他姪兒回擊自衛的拳術，並告訴他這是在那學堂叫一般同學看得起的唯一方法。我勸那小兒不必啼哭……誰敢說那親叔的話不是呢？這樣一回想，我心中就有把握，而此後我國再受人欺凌，再吃人巴掌，直到武備平等之時，我也再不慌張，方寸不亂。因爲我已算好，這是現代文明世界應有的事。

第二條結論是一種妙悟，一種玄深知遠的直覺。我展望中國強盛起來，蘇俄強盛起來，而全亞洲民族都強盛起來。我知道這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國家，全統一全醒悟起來，而且經過這次烽煙戰火的煅煉，一定蒸蒸日上，自己既有更生的力量，任西洋國家如何壓迫，再也不會受人壓在下頭。

這樣肚裏一算，我心氣就平下來。現在我看見這些夜郎自大的國家，以爲武力統霸世界在希特勒雖然失敗，在他們手裏可以成功，我並不發惱，肚裏只覺好笑。只是相信武力霸道之冥頑，看來有點不耐煩。於是這短期間胸中一團懣氣，憋得我頭昏腦脹動彈不得，一旦烟消雲散，痰迷一通，五腑六臟舒暢起來。我走回家，入廚房，開冰箱，放聲而笑。我的女兒說父親怎麼神情大不相同了。

人心委實奇怪，能受多少，就是多少。新近在朋友家大家談起私生子問題，把世界立身成名的私生子總檢閱一下——所談的是歷史上庶出或野合而生的名人，不是紐約汽車夫之所謂 Bastards〔略同「畜生」〕「豬糞」〕，這就包括紐約全市的行人了。我們討論私生子所受的冷眼奚落，有的就此退縮而屈服，而有的個性倔強，竟能克服環境，而因受過冷酷的待遇，益發立志磨礪而自強。孔子便是一例，秦政也是一例。如果意志堅強，定可超脫物境。有時一人有相當的聰明毅力，什麼沮喪失望都可化成一幕啼笑皆非的把戲。

以人心之聰明智力，遇見塵世的混濁，虛偽，頑固，則不期然而然噴出奇麗的火花。我以爲人心智慧的功用，就是噴火花。所以像〔行爲論的心理學家〕瓦特生和那羣科學低能兒，認爲人心只是聽見吃飯搖鈴引起反應，而不是對此人間世之囂張乖戾妖言詭行發起反應，你只好拂袖而別。……

所以大家只好在這苦中作樂。我承認現代世界戲場是悲多樂少。這十年間人類精神上的

苦痛我已覺得。我不相信從這種精神的荒漠上會突然有一種新世界新天地出現。我四面都聞見屍體腐爛的穢氣。人心同人身一樣，發出一種氣味。某一派人就有一種鼠味，這派人專門親善阿陀，昭和及佛朗哥（奧國皇室阿陀太子，美國某部曾經暗中拉他台）。有些人味若從久年密封的香積櫥出來。這當代是令人哀痛的。你想上次大戰，大家都相信那是『了結一切戰爭之戰爭』，並且立志要使他實現，到了第二次大戰，沒有一位我讀過的作家敢悄悄暗示，這是了結一切戰爭的戰爭，而依此主張做去，豈非大可哀哉？

你越愛好你的理想，越覺得心痛。比方說，你願意看見印度自由有小小的積極的進步，因為印度問題代表世界一切民族自由的問題。然而你真愛好那個理想，但是有人摧殘這理想如摧折一枝花，你就覺得心痛。

幸而世界上的悲劇都有滑稽的成分。古今中外，由冷眼細心人看來，沒有一代不是像一座瘋人院。古今中外，沒一代不出幾位小丑。這使我想到了德國詩人 海尼在他旅中畫景書中的一段妙文：

『是的，就在世界悲劇最淒慘的一幕，也有令人發笑的事發生；……在這宇宙大劇場，一切與戲台上一樣。也有醉漢登台，也有皇帝一時忘記戲文，也有佈景任拉拉不下來，也有後台對讀戲文者提醒演員的聲音太響亮，也有舞女藝人運用大腿的詩意贏得叫彩，也有面具化裝——這面具化裝就是全劇的精華。而天上呢，可愛的小天使坐在前排包廂，拿起手

提眼鏡，下看人間的丑角，上帝自身正襟危坐在正廂，或者覺得不耐煩，或者正在估算這位演員薪水太高，那位演員薪水太低，而沒有一位扮演的好的，不久總得叫他們停演，關門大吉……」

嗚呼，我們的當局不是神明，只是矮小疑是疑非的常人，像那些忘記戲文的皇帝，而我們小平民得充當後台對讀戲文的人去提醒他們。有時像（北非）柏盧敦（美國外務部扶出來人物）一齣戲唱得最熱鬧的時候，美國後台提醒演員的聲音的確說得太亮。平心而論，提醒者的本心，也是爲這一場戲的好。然而老演員常常忘記戲文，並不限於美國；全球各處，這戲唱得不很順利；或是北非洲一幕，或是西班牙一場；彷彿到處都有混亂的喊聲；還有奧國一幕，老板同提醒人還在爭吵，應否讓奧國皇室阿陀上台，還有印度打成一團糟的一幕，在那裏爲自由而戰的人正向爲自由而戰的人挑戰。

可是且別忘記，提醒戲文的人真能挽救一幕的危機。名角記性不好，及時給他點醒，還可以玉成他唱完一齣好戲。戲唱完了，簾幕迭次上下之時，這點醒他的人也願意幫同鼓掌，並遞送花籃到台上去。但正在扮演之時，看見那老角色再三再四忘記戲文，甚至全劇主旨都似乎不甚了了，這時對讀戲文的人自然心慌。閉幕之後，老名角站在台旁就會咒罵那提醒的人，『你這混帳好管閒！我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到那時提醒的人自該上前去恭維一聲，『那還得說。鑫雲伯，這齣戲你一生就沒有唱過那麼好？』

所以這幕戲唱時叫你悲喜交集，而艾登和赫爾在第二幕業已開幕之後，才在演習那段應該排在開場關於蘇俄的序幕。這戲台上也有仙聖，也有妖精，也有民主主義者，也有帝國主義者，而據說帝國主義者正在為民族自由而戰，而民主主義者正在為帝國主義而戰——這等於說，大家都在為輸將各私有地盤而戰，或者正裝這種模樣。甘地禁食禱告，這是一種怪事，叫耶穌教徒都惶惑不解起來，而哈利法斯爵士（英國駐美大使）聲言，倘使他以一個聖公會的教徒資格，竟登印度總督府的屋頂去禱告禁食，本國人會把他送進瘋人院。還有安琪兒爵士（Norman Angell）（英國作者，以前做個好書，現在美國替本國宣傳）力爭自由的權利，而同時又力爭英國爭奪印度人力爭自由權利之權利。竊想天上可愛的安琪兒坐在前排正廂拿起手提眼鏡下看這齣時，不知作何感想，我感覺一九四二年是天上安琪兒為人間同名者揮淚之年，如果安琪兒也有淚的話……

在這世界悲劇之時哈哈大笑有點不該。但是點醒戲文的人用心是純正的，雖然他喊的聲音太亮時，也無端多叫在座觀衆發笑，因為錯誤總是好笑的。每個時代有他的丑角，而這些丑角叫你發笑。大人大錯，小人小錯。然而大人最好指出小人的小錯，而最不喜歡小人指出他們的大錯。錯誤是大人可鑄成的專利，也是等到大人已成千古後小人可以指出的專利。一旦瞑目，傀儡戲就收場，而我們就運用我們的歷史觀。死者不爭不辯，不洩秘密，死的檢查官不會由棺材裏伸出手來刪削後世的文章，所以讓他們在今世有此刪削的快樂。今日我們已可非笑張伯倫的

荒唐，及凡爾賽和約當時炳耀一世的英雄，和已往十年間國際聯盟官僚的錯誤，因為他們的錯誤已經鑄成，無法補救，而指出已往的錯誤叫做有歷史賞鑑力。先訂一個方式，說過去的祖先賢聖都有隕越，但現話的世界領袖必須除外，這樣決不會出岔的。所謂教歷史教歷史也者，乃我們須教歷史而不可令歷史教我們也。

天下事莫不有個時宜。我們一九四〇年代的人，可以笑一九三〇年代的人的錯誤，而輪到一九五〇年代的人，他們也可以笑一九四〇年代人的錯誤。好在眼光放遠一點，就有歷史賞鑑力。大戰完了，花香鳥啼，世界還是世界，在啼笑悲喜之間流動下去。有時悲多喜少，有時悲少喜多，有時簡直叫你哭不得笑不得。因為自有人生，便有悲喜啼笑，等到淚水乾了，笑聲止了，那塵世也就一乾二淨了。

業緣篇第一

此篇言唯心史觀並解釋事功不減果報循環之理爲全書立論的張本

但是如果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現世，我們便遇到一種難題，這是歷史科學所無法解決而歷史經濟觀一派所常欲避免的，因爲這一派辨不出他是牛是馬。這就是歷史上所謂『不可思議』（imponderables）的東西。（按時論家歷史家常以此字代表非數字所能指定之因素，若民族個性社會心理等，常對物質條件而言。）Ponder（『思議』）一字原出臘丁文 pondus，意爲『重量』，所以這字於我的意義，不是叫你不可思議，而是叫你不可衡量。在於講歷史『科學』的人，這是何等可憐的告窮的招供！（按科學非衡量其所研究的標物不可）但是這東西明明擺在那裏，也沒有重量，也沒有體量，無色無形，叫你不可捉摸。

然而我們談起現代目前的事勢政策時，雖然只願談物質的數字；比如有多少架轟炸機坦克車可以擊敗希忒勒，一旦談到幾十年的往史，便忽然變成唯心家。常常要承認有所謂『不可衡量』的成分，或是稱爲『精神上的力量』，或稱爲『心理上的要素』（如『民氣』，『士氣』，『國家元氣』，『思潮』的權力等）——一種科學所不得分析的賸餘物。換言之，我們巴不得承認精神史觀（或唯心史觀）。但現代人的思想習慣，最討厭的是不能方便衡量，或分析，或化成數學公式的東西，假定如我們有個量電表，可以測量民氣民情的『電壓』度數，我們馬上就

明白了。可是事實不然，所以只好像對強敵讓步一般，我們把他放在化驗室之一角，口裏喃喃自語說『不知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只好談起佛法說業。〔按梵語 Karma 『羯磨』指身心口行必有苦樂之果，名爲業因，通常所謂『宿業』『現業』之業也。〕印度人早已發明道德行爲善惡果報的因緣，要明白這道德上的緣法，必先用歷史眼去。簡單的說，這是一種論說，謂吾人對於我們的身口意行都要負責，這些意念行動和過去與將來，都有因果的關係，結不了緣，而且我們無法逃出這因果報。這近似科學對於物質宇宙所謂動力的因果公例（凡動力因果必相等），及物質不滅氣力不滅說。普通耶教徒及普通佛教徒要將這因緣果報移到來生去，證明他們尙未深知這道德行爲的果報在現世已有適備作用的原理。

近談羅斯福總統在林肯生辰廣播詞文，發見林肯是婆羅門教徒（羯磨之論，起於婆羅門；美國一八六〇年左右唯心論哲學家若愛默生（Emerson）等綽號爲波士頓城的婆羅門（Boston Brahmin），愛默生實受印度古代哲學的影響）。老實說，誰相信我們心思行爲的緣果不滅，便是婆羅門。羅總統廣播詞末引林肯的話說：

『諸位同胞，我們不能逃避青史。我們這屆國會及這任政府的人，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留名後世。無論地位貴賤，事情小大，沒人可以逃出這個關節。這回我們所親歷的烽烟戰火，要燭照萬世，或者遺臭，或者留芳。』〔美國南北戰爭時林肯對國會演講詞〕

在這一段話中，林肯恰巧把業緣論說的要點說得恰當無遺。『我們不能逃避青史』——這便是業緣。在一八六二年林肯可以闡發這意思說，『我此刻說話的聲音，似消沉於空間，而實留存於永久。如果我們有一架科學儀器，可惜現在沒有把這聲浪精微的表記出來，或者可以發現這聲浪傳播宇宙。我們的道德行為的播下業種也是如此。』『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留名後世。』——這是無法逃避的。『無論地位貴賤，事情小大，沒有人可以逃出這個關節』——極細小的事件，也留個緣果。『燭照萬世』——因緣生法，萬世不滅。『或者遺臭，或者留芳』——善惡宿業時時跟在我們身上。換言之，現在及過去與將來流動中之一刹那，緊緊被業緣繫住。『現在』(now)這字沒有數學上的意義或畛域，由n寫到w時間已倏忽不見。我們是浮動在時間的潮流上，時時刻刻存在於昨日與明日之間。

依這婆羅門學說看來，所謂『先打勝仗，再談打仗之所以』簡直荒謬絕倫。時間不容你這樣割成斷片。『先打勝仗』邱吉爾的立論在哲學上不成話，這是基於他受已往的牽制及對將來的畏怯。因為他全然不願意排除已往，並且大大願意逃避將來。一個人連戰後和平問題都不敢着想討論，必然是听夕懼怕將來。我知道並且看見 w-t-w-t (即 Win-the-war-First) 邱吉爾也不能免俗，也被迫於來到勝利以前，隨時討論到英國殖民地的將來及波蘭的疆界。然而日月如梭，業輪常轉，要把邱吉爾飄流下去，正像春汛把落葉飄到堤壩。早晚是要飄泊到那他最害怕的和平的堤壩——除非他是被時潮撇在後頭。

物理學有條公例，叫做『動與反動必相等』。像宇宙吸力公例，這條公例說來很淺易嚴正。說這種淺易嚴正的一句話卻不容易，因這句話的後頭有些複雜的數學公式，也許長到二十七個字母，爲常人所絕難了解而未曾料到的。業緣這條道理，說道德界上的動與反動必相等，也是同樣的精微玄妙，但不那樣容易用數字來證明。佛家說宿業，說這是『積』漸下來，功德與罪業是由日積月累，由我們的身心意念口語的一切作爲積重難返而來，正像物理上的『動量』，由小推進，小稽延，小牽住而消長生滅。所以人生在世，總由宿業積漸而達到某種果報，或是正覺，或是沉淪。釋迦在法句經(曇鉢偈)開場，就用心理說法說得清清楚楚。

『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卽言卽行，罪惡苦追，車轢於轍。

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卽言卽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按見雙要品第九，巴利文缺首八品故以此爲開場。Max Müller 英譯，首二句尤比中譯曉暢：『法緣心造，以心爲基，以心爲體。』〕

這種道理須要一點印度人的想像力，才會把精神上的東西看得像物質上的東西一樣當真。假如我們的法身有個形相，我們可以看見這形相是由我們的意念構成的神經絡，像主管肌肉動作的神經發生動作。這些動作影響本人及他人的總結果。便湊成人類社會的一種動勢，而決定箇人及人類社會將來的事勢。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像打床球，一粒推動一粒，並由其推動之角度猛勢斷定第二粒的去向一樣的準確不易。這便是人生行爲思念負道德上的責任的一種學

說。佛家言，『法輪』便是指此，在比較悲慘的意義上，也叫『業輪』『業障』。

這道德世界公例的一種說法，可謂差強人意。這說法可謂相當的謹嚴，謹嚴精嚴是我們〔科學時代〕所要求的。我們已經慣談經濟。一包棉花，或是出入口過剩，或稅率高低，大家容易了解，因為打包數字總是清楚明確。『一包棉花』，容易了得，可是『一包友誼』，或『一包合作精神』總不大成話，而我們最恨是那些籠統不着邊際的話。有時偶然，我們的（指西洋）外交家心神不定，卻撇開實地，唱起高調談什麼『威武不能屈的抵抗精神』，或是『人類愛好自由的力量』，而聽得人不耐煩起來，罵他們唱高調。有時又有時評家社論家也心神不定，忘其所以，大談起『歷史上不可捉摸的權力』，『心理要素』，及『不可思議』的東西，宛如真有其事。

老老實實說，我們〔諷西洋〕最恨去思議那些不可思議的東西。越思議，思想越不清楚，而那些很着現實思路很清的國會議員及政客，便齊聲喊罵，說這些高談闊論，無補實際。這時我們心窩裏，有點喪魄，有點頹唐，自愧不該違犯時代的精神。於此決心，下次只說入口限額，腳踏實地，上帝鑒佑，當不致阻越。如果下次專談爭權奪利毫不退讓大家可能的話，個人名譽尚可補救。比如提高生活程度，——純動物的物質生活程度——或是工資最低限度，或是收入保障。這誰也不至誤會。歸根結蒂，一切可折成黃金，除非是銀兩，因為這是黃金時代。俗語固然說，『烟燻未必盡黃金』，因為還有錫，還有鎊，然而至少鎊錫有個價格可談。

所以現代人討厭空談仁義道德，這很易解。可是世上偏有許多東西，叫你無法衡量或證明。比方說，個人的尊嚴與平等自由，這是無法證明的，因為科學決不能證明個人有什麼尊嚴，連自由都無法證明。正正相反，科學如果是科學，只能證明世上無所謂自由，不然科學的機器式的定律到那里去了？這些精神上的東西，永遠不可捉摸，只有遠遠的神出鬼沒，似隱似現，卻也無法否認他的存在。在我們忘其所以比較不科學不數學化的時候，我們深知這些道理有個真諦，只是不即不離，若有若無，像個巫山神女，在我們半夜三更閉門獨坐之時，偷進室內，用手從後頭掩住我們的雙眼，輕輕的說：『你猜是誰！』朝朝暮暮這神女要來臨，可望而不可即。只有相信精神生活的人，看來十分真切，彷彿身體形相俱全。

印度哲學的業緣學說，卻是謹嚴的可怕。真理合算，公道也合算，而如果印度玄學是真的話，靈魂的自由也可叫你年底大分紅利。事實上，佛陀及婆羅門等出詞不至如此鄙倍，但是道理意義委實如此。如果我們相信精神的東西也會叫你**有報**，有時且有很好的收報，如果我們能證明在道德上，如在物界上，動與反動是相等，我們便可去探討那些不可思議的東西。所以『羯磨』(Karma 即『業』)這一字，在我成爲中明歷史的精神觀的工具，成爲排斥經濟的原因與救策，而確稱道德的因果的工具。除非我們明白這點，所談戰爭與和平的話，都不會超過我們所謂『豬與泔水』(養豬見識一般)的經濟學 (Swine-and-slop economics)。

中|日|戰|爭，便可引爲業緣的好例——暫時不說業緣二字，只稱他爲不可捉摸的潛勢力。中

國反抗〔反動〕之強度，可以證明正與日本前期殘暴不仁〔發動〕之強度相等。凡講宿業，都講數十年『積漸』的功罪陰險，一旦發爲果報，見於事端。試問中國全國團結一致，設有武人對敵投降，這種精神上大力量何由而來？

只有把這力量看做日本暴行的反應的總結果，才會明白。我在那篇長賬指出數條：民國四年之二十一條件；凡爾賽和會上割據山東之野心；二十年東三省之侵佔；二十一至二十五年間覬覦無恥在陸軍及領事保護之下大規模的華北走私；二十二至二十三年之進窺察哈爾；二十年五年之暗襲綏遠。自二十至二十六年間，反日示威的行動，全然制止。但是民氣的高張激昂，雖然不可捉摸，卻日積月增，到了今日結成中國國民一致英勇抗戰的原因。不但如此，依業緣說法，極小的作爲事端，也有餘波及於後世。像山東交涉員蔡公時，一個中國外交官，橫遭日人剝鼻割耳戕目，這局部事件。也在中國國民的心理上留下痕跡，和南京大屠殺大淫戮一般。日本人以爲『此案了結時』，那『事件』也同時了結；據業緣之說，這案並沒有如此了結。日人不能逃避歷史，中國人也不能逃避歷史，這是中日所以不得不決之一戰的原因。張山來說：『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幽夢影〕。在這種地方我們看見倫理上的因果關係，十分顯然。（經濟史家否認英雄偉人及民氣民情思想信仰之力，參見〔化〕物第二十。）

看看西方戰爭，也是一樣。如果有人能用電表測量珍珠港之襲擊在美國一萬萬三千萬人胸

中所激起電流的壓力，他可以斷定這次襲擊在精神上大不利於日人，和其物質上初期大利於日人相等。但是今日外交家軍事家正忽略鄙夷這種無形的電流，像硜硜然小人要去指揮歷史上的最大戰役。

天下事都有個消長起伏之機在焉，只要我們眼力看得出。像金類或 Inerte（化學新品）受擊時，那擊力傳於物質的奇異紋路，人眼看不見，但用 X 光線照出來，可以看得見。曾聽見反對吃素的人說，你切斷一條蘿蔔，其情形慘痛，猛發的電流不啻哀鳴的聲音一樣。我們聽不見被宰割蘿蔔的哀鳴，希忒勒也算不出被宰割的歐洲所發出業流的聲浪 (karmatic currents)。〔即「羯磨流」，自造新名詞。〕但是過了些時，果報一現，歷史就要指正他的存在，昭然若揭。希忒勒不能逃避歷史。換言之，希忒勒不能逃避他的業障。我真可惜希忒勒不信佛，不然他倒要聰明些。

但忽略歷史的業流者，並不限於希忒勒。我們同盟國也不承認有歷史潛勢力的「業流」存在。我們置之不理，只顧依照養豬見識的經濟眼光，去謀戰爭與善後的計劃。我們簡直不知業緣為何物。在經濟學看來，人嘴與豬口一樣；所有戶口糧食稅率的圖表論文，只是計算豬口而已。他們彷彿說，你把這些豬分欄關起來，放夠食料，而各欄的隔板造的高低適中，那些豬便會相安無事，而天下太平了。

時變篇第三 此篇言亞 洲之勃興

但是業輪常轉不停，這就是言歷史潛勢力正在破裂國際機構的說法。政治上我們卻置之不理，倒行逆施，彷彿沒有這種潛勢力存在。但是因緣果報的公例非人力所能取消。不過我們收豆不肯種豆，收麥不肯種麥罷了。

這次戰爭最重要的事實便是蘇俄與亞洲之勃興，但是我們依然不顧。上文偶然對安琪兒爵士牽涉一句不客氣的批評。當一位歐洲的開通學者而論，他大概不亞於他人。但是在歐洲開通學者的立場，他的所謂世界民族須要合作同舟共濟是純粹『白種性』的，而以蘇彝士運河爲限；特別是限於一種改頭換面的『英美聯盟』主義。〔Union Now 運動，數年來 Clarence Streit 所提倡；安琪兒是英人，新著名爲 Let the People Know，專向美人說話，勸他們戰後與英國攜手。〕他對蘇聯對亞洲的意識，還與英國守舊黨亞思斗夫人見識不相上下。亞思斗夫人說：『我願意俄國及中國加入英美所建造的新社會，但是他們的思想念頭必先學英人。』你想這種寶貝，除了倫敦以外誰會鑲鉗出來？我好久沒法解以下的算學啞謎：假使一人的腦袋直徑是五吋半，但是腦袋骨之厚也是五吋半，裏頭空間地位有多少？

十九世紀世界的政治構造，已在崩潰，帝國已在瓦解——雖是不願意。如果我們看得見在

亞洲澎湃而來的潮流，就得把這世界戰爭看做世界政治構造的革命。這場革命，是亞洲發動到歐洲，不是歐洲發動到亞洲的。事實上，我們正在看見地球重生臨盆的苦痛，卻不看見『新自由之誕生』（林肯語）。

亞洲勃興的勢力，已在步步前進。日本正在恃武力來修訂世界的地圖，中國正在恃堅強的自信力及直上青雲的志向，來改造亞洲民族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印度正在徒然向偵巡機隊武裝巡警及皮鞭禱告來改良他的苦境。但是同盟國猶懵然未覺，倒行逆施，直向業輪的緣法撲來。然而不僅在亞洲，在全世界有潛興的勢力起來，要求林肯所預言的『新自由之誕生』，使世界不致『一半自由，一半奴隸。』這些勢力，使我們的平常觀念傳統脫了銜接，只因新形勢來的兀突，我們當機會皇失措，束手無策，不能毅然去對付新局面。治本之條理既未立，我們只在治標上面剜肉醫瘡，應付不暇。

我不常引耶穌的話，這次非引他不可：

『你們看西方雲起，便說雨快到了，而果然雨到。你們看見南風吹來，便說天氣要轉熱，而果然如此，你們這些假君子，你們見到風雨先兆，怎麼這回倒見不到朕兆呢？』

亞洲的勃興——我把蘇聯當做一半屬於亞洲看法——是這次戰爭最重要的一樁事實。這事實已把我們作戰的秩序單推翻，也要把和平的秩序單推翻。他要把一切總推翻，只有亞司斗夫人的『英人思想念頭』推翻不了。仔細亞司斗夫人『思想念頭』的催眠魔力，一瞪眼會叫這世界

革命停住。但是我確信，就使我們要想把十九世紀的國際構造改弦更張，保留相當白種統霸全球的局面，此刻已嫌稍微太遲。今日的亞洲已經振袖而作，不肯屈居人下，也已長得太大，不便打屁股。西方只好準備與亞洲合作，不然只好準備下次更偉烈的戰爭。

海明威由中國回來，敘述某位中國軍官的話：『你想英人爲什麼帶獨眼眼鏡呢？因爲他留一隻眼要看見他所願意看見的事實，還另一隻眼避着不看他所不願意看見的事實。』德國軍官也是好帶獨眼眼鏡的。但是這就是中國人同美國人所以不好獨眼眼鏡的理由。亞司斗夫人的真意，是說俄人華人都應帶上獨眼眼鏡，可是不幸我們並不希奇這種東西，俄人也不希奇這種東西。由此觀之，似乎很少有看見『蘇俄與中國加入英美所建造新社會』的機會。我個人在華人立場，寧可叫新社會滾蛋，維持我們雙眼正視的光明。

亞洲之勃興就只有一種意義：帝國主義時代之收場。誰也不能制止這個趨向。如要保持十九世紀的制度，白種人只有勒住中國與蘇俄的喉嚨之一法。可是此刻稍微較遲了。西方還可以試試做看，如斯必克門教授、耶魯大學國際政治教授，去年新著美國策略和世界政治，詳見血地第十七。大膽教我們的方法：『且須記住，無論將來聯治調整取何方式，局勢卻正與開始大戰以前一樣。除非美國繼續奮鬥，直到他不但打倒他現在的敵國（德與日），並且打倒他以前的同盟（華與俄），戰後時期就有許多獨立的國家的一種世界出現』（四六〇，四六一頁）。這種有許多獨立國家的世界，是斯必克門教授所不敢想像的。我們美國大學課堂上所教的當真就是這

種政治學說嗎？我還記得第一次大戰期中，『強權政治』這名詞還得用德文寫作 *Machtprinzip*，而且含有德國味道；到了此刻，已經無須了，英文 *power politics* 這兩字已經通行易曉，而德國思想已從中征服我們了。

事實上，凡一民族，只要有中等的聰明，經過相當時期沒有不蹶起的。試問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怎樣起來，白種人怎樣征服全球，怎樣會自信是優勝的民族呢？因為白種人有來福槍大砲，而亞洲人沒有。簡簡單單如此而已。你研究庚子之亂及百年前中法之戰就明白。那時中國兵士帶洋傘持刀槍，有些還帶弓箭。到了光緒年間才聽見有袁世凱練『新軍』，所謂新軍，就是說只有該軍有來福槍，這麼一指出，未免令人掃興；但是退一步說，可以假定兩軍角鬪雌雄，一邊只有鳥槍，一邊有克魯伯鎗的情形，也就明瞭。

讀者至此，必能明白，如要永久把亞洲壓在下頭，唯一合理的方法，只有教亞洲民族不會用來福槍大砲，好像此刻保守美國轟炸描準機的祕密，不令敵人知道一樣。但你明白，經過長期幾十年，這是辦不到的事。有一百年間白種的帝國就是靠這武器的差別來維持。這第二次大戰忽然揭露的，就是此刻日本，中國，俄國都有槍砲。這一件事實，將改變全世界的歷史；那武器的差別消失了。不但此也，日本人的英勇作戰並不亞於白種人；俄國人也如此；中國人也如此。而且大家都在作戰。現在怎麼辦呢？繳除他們的武裝？用世界保安隊去防範制裁他們？用克爾伯森說〔見簿書第十六〕的『限額方法』如華府會議對付日本訂出五：五：三海軍比例的

方法，去壓得使他們不得抬頭！

所謂白種人的文化使命已成個悶啞謎，而似彎弓回擊射士。白種人傳授聖經與黃種人。他本應把他自己所絕不用的聖經傳授他人，而他自己所最善用的鎗砲祕而不宣，他本想在用大砲擊死幾個黃種人之先，已用聖經把他們的魂靈救上天堂，也就於心可以無愧。可是他算錯了。現在黃種人學他們的乖，對於聖經也藐然視之，而從此魔鬼的孽種，白種和黃種在內，拿起湯密鎗，就可把這世界化成血染的疆場。這是說，假如我們思想還是那麼幼稚，只管將歐洲的道義標準移到亞洲，而將白種人的強權政治放大範圍施於全球世界，那末這全球世界就變成一個幾十年一次屠戮的大戰場，正如歐洲自身一樣。

我們知道凡是『思想前進』的人，包括幾位大學教授在內，正在朝這方向想去。歐洲那種混亂崩潰的前因後果，他的道德倫理標準，將成未來世界的模範；霍屯督生番人人每天都要有四杯牛奶喝；印度人都要穿起白領褂起領帶；馬達卡斯卡島人也都上禮拜堂做禮拜；而全世界的人都要叩謝白種文明。這便是白種人的文化使命，是歐洲文化贈與世界的恩賜，不過——這也得承認——幾十年一次火山須得爆發，而那噴出來熱烘烘的礦渣須得波及爪島或緬甸那里某鄉村。但反過來說，鄉下人可以天天喝四杯牛奶，那不很合算嗎？

其實我們對於這時變的解決很為簡單。白種人正在對世界各其他民族說：『我們要求純全，學我們在天之父的純全，但是汝輩只消學我的純全，學我的思想念頭，天父對汝輩很滿

意。就是汝輩皮膚稍黑，上帝總會饒恕你們。趕快到外邊去玩。』這便是斯忒賴忒（Clarence Streit），安琪兒亞司斗夫人的新耶路撒冷。

述古篇第四

此篇引證古代雅典不能解決帝國主義與自由之衝突以致希臘文明自殺爲下章張本

上文所指出因亞洲勃興而發生國際新局面的解決方法，在於我認爲不滿意，不令人起興，世界的自殺總不會令人起興。

斯必克門教授願意看見美國勇往前進，繼續奮鬥，只須再打幾次仗，消滅一兩萬萬俄人和四五萬萬華人，直到他可以稱雄獨霸全世界——他情願如此而不願看見『有許多國家的世界』。我倒願取第二條路，斯必克門教授那種先知先覺大學教授的腔調，令人想起斯彭格勒的悲觀 [Oswald Spengler 西方文明覆滅名著作者] 胸中不快；我們非學者的平民總應樂觀些。斯必克門的真意，是叫西方文明簡直自殺，學伯理克理斯（希臘黃金時代）的雅典的榜樣。好，大家也來搬書籍，做學究，看看修昔的底斯怎樣記述。[Thucydides，希臘的司馬遷，所記當代希臘五十年間內戰 Peloponnesian War 一書，稱爲希臘最客觀公允的史書，爲現代史家所極稱賞。]

希臘覆滅，因爲他未能解決帝國與自由衝突的問題。歐洲文明也須一樣傾滅，如果他不能解決帝國與自由衝突的問題。怎樣傾滅覆亡法子，我們不能效諾士忒拉戴馬，預言其詳 [Nostredamus，歐洲的劉伯溫，生於十六世紀]。但是殺機之隱伏，階段的進展——這歷史階段以肉

眼看來要經過幾世，而在神仙及歷史看來卻只有一剎那——這階段的進展步驟，卻要與希臘自取滅亡的過程根本相同。以古證今，比類正正相合。讀修氏古史的便宜，是在那故事中，版圖較狹，而那古代五十年間的互相殘殺傾陷，今日看來容易一目了然，便於研究。概括言之，那是從雅典海軍勢力與斯巴達陸軍勢力的角雄，及缺乏道德上領袖才幹的悲史。全希臘聯邦的夢化成泡影，原因在於雅典不肯或是不能解決帝國和自由之矛盾。後人讀史，容易指摘雅典人之倨傲不遜爲那取敗之心理上的原因。我們只願今日世界聯邦合作的夢，不太含北希臘聯邦 (Delian Confederacy) 的意味，而沒有亞力山大攀山越嶺而來，征服希臘平原，將那文化炳耀一時的希臘世界一手蕩滅。那幕悲劇的孽障在於那位青衣雅典，也有民主精神，也通脫自喜，也懂得愛好他自身的自由，卻永遠不懂希臘他國也一樣愛好他們的自由。

讀史有時就教人心慌。因古今雷同之處委實可怕。固然，雅典是民主國，這無問題，不幸的是民主國家也會自殺。人類的美術再沒比雅典超逸；雅典人的慧心明理通達，格物致知，他們的美術崇尚樸素，歸於中和。雅典的自負，良有以也。現代民國的總統要表彰他們國家的建樹，或頌揚現代的文明，再也不能超過伯理克理斯 (雅典王) 在那開戰第一年末陣亡將士追悼會上所盛稱雅典人的文化生活。其口語很像美國總統在國會的演說詞：

「在未追悼陣亡將士之先，我要指出我們強盛的基礎，由何樣的文物制度及人生楷則，造成帝國的偉大。……我們的政體，不與他人競爭；他人倣效我們，並非我效他人。我們真

是民主國，因為政權操在大衆，不在少數人之手。但大家雖受法律平等保護，我們也尙賢才；國民的升擢，不是憑靠勢力，是因才選用。窮士也不偏廢；只要有益於國利民生，都可效忠家國。……在燕居時，大家可以隨便，而在公事上，都能誠敬無虧；我們大家所以不犯上作亂，都因有敬上守法之心，尤尊重規矩禮儀，使于禮犯法的人，爲公論所不容。

「此外，我們對於業餘的休息消遣，也不會忽略；我們一年中有按期的運動及禮節。在家有文雅宴安的生活，使我們解悶消愁，優遊度日。因爲我國的強盛，天下的貨物都麇集而至，叫我們安然享受。……在教育上他們（那些納粹的斯巴達人）從小就要受艱苦的訓練，使他們英勇善戰，我們卻安閒度日，但是一旦臨難，也不畏卻！……」

假使伯理克理斯是在爪島陣亡將士的追悼會演說，說辭也不過如此。要是他要宣布一九四三年的感謝節（每年由美國總統宣布節日），可以一字不改。因爲他談到德謨克拉西的要素，依那位史家憑記憶並想像出來所記載的詞句，正像紐約時報一篇社論：

「我們尙美而能反樸，崇文而不懦弱。……雅典的市民並不因私而廢公，就是商人也有相當的政治認識。惟有我們才把一位不管國事的人不認爲守己安分，而認爲庸碌無用；雖然不是人人能建議方策，大家都能評斷政策的是非。依我們的看法，商量討論不是妨礙進行，事端之妨礙乃在未經妥籌熟慮詳慎討論去冒然進行。因爲我們特有先思而後行的能力，而他國只是蠻幹。……總括起來，我敢說雅典是希臘的導師，而雅典人個人都有臨機

應變處危不亂的才能……我這樣表揚雅典的偉大，因為我要昭告全國我們所爭戰維護的，是比沒有我們所享受的幸福的他等國家更偉大莊嚴的宗旨。……』

雅典民主之健全及其人生哲學，沒有比上文說得更剴切精透。不幸的是，雅典是帝國主義的民主國，而希臘各國還是半享自由，半爲奴隸。雅典已經過他的『第一次大戰』——希臘與波斯大戰及沙蘭米海戰大敗——猶不致亡國；所以引起希臘內亂頻仍而至亡國者，是因爲沒有王道的領袖才幹，及雅典之倨傲驕橫，不肯承認全希臘各城的自由平等原則。哥都羅芬教授說：

『波斯戰爭以後，雅典統制北希臘聯邦，遂有第五世紀的大問題排在目前，這就是靠海軍力量的帝國主義民主國（雅典）與靠陸軍力量的守舊貴族政體的國（斯巴達）發生衝突。因這南北戰禍綿延，希臘各國又沒有一個能做賢達的盟主，同時，全希臘主義失敗，又加上希臘各國永不能真誠合作，以致發生第四世紀的政治解決』（Francis R. B. Tolo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 序文第二十九，三百）——就是自殺。

如果古今類似之點，不這樣吻合，倒也罷了。然人情狡黠，妒忌猜疑，強權傾軋，舞弄是非，古今無別，正如修氏所假定。所以他預言：『後有讀者讀吾書，對於往史及因人情之常而復見於將來之故事，欲明箇中真相，而認爲此作不無少補，作者可以無憾矣。』

述古證今，同類之事多得可以使你踉蹌不安。雅典是個民主國，是個海軍強國，和陸軍強

國斯巴達作戰。杜蘭蒂（Will Durant 美國著名作者）說的好：

『其戰爭之基本原因，乃在雅典帝國之日臻強盛，及其獨霸伊堅海面（希臘東海）之貿易及政治的發展。在太平時代，雅典准許自由貿易，但是都要得他欽准；船隻未得他的同意不得航行海面。雅典辯護這獨霸海洋的政策，說是國家命脈所在；他的糧食要靠他國輸入，所以非維護那輪運的航線不可。這個國際貿易的航線由雅典保護，於伊堅海的共存共榮，也不無裨補，但是雅典勢力日益高漲，希臘各屬國日益富強，就對此種情形也日益不滿。

〔Life of Greece，希臘生活第四百三十九頁〕

雅典對其他各國施行治外法權。凡雅典籍民與聯邦籍民發生訴訟，須到雅典的法庭訴訟，只有雅典的法制是文明法制，但是我們也不必幻想，以為那些陪審的雅典市民，都是大公無私的開明學者，毫無國家觀念，不會鄙夷異族，曲護同胞。

那時希臘天下以自由平等為原則建設聯邦共治，本為長治久安唯一的希望，而這時聯邦已變一齣把戲。因為不管取什麼方式，假什麼名義，雅典非獨霸全希臘不可。因要共同維護這世界，抵抗侵略的國家及國際的強盜，所以雅典必須主管以聯邦的名義徵調的海軍。只有國際警衛隊，才能維護伊堅海的國際和平。這把戲愈弄愈不成話，後來雅典用武力強迫他國參加這國際聯盟；誰不參加，就墮他的國都，來共同維護此刻所已明目張膽號稱的『帝國』。杜蘭蒂說：

「據修氏所說，雅典城的民主領袖，雖在本國崇拜自由等於偶像，卻已坦白承認那聯邦已成武力霸治的帝國……崇拜自由與帝國霸道的本身矛盾，又配上希臘他國的偏強自好，遂使那黃金時代歸於滅亡。」〔前書第四四〇頁〕

修氏自己是雅典人，倒也公道告訴我們，那回內戰的真因是雅典的霸道，雅典所要強制決心實現的是雅典式的和平（*Pax Athenica*），他們主張自由貿易，因為所需糧食須由埃及及伊堅海北運來，並且恰合現代識得採用經濟封鎖手段。米加拉（*Megara*）城叛變，歸附雅典的敵國哥林多（*Corinth*）。雅典王即令禁止米加拉的產品運入雅典轄境。米加拉與哥林多便向斯巴達求援。斯巴達出而調停，要求取消這經濟封鎖。雅典王答允，但要求斯巴達轄土須開放門戶，准許國際貿易。斯巴達也答允，但交換條件是，雅典須承認希臘各城完全自主。伯理克理斯偏不肯經管清理大希臘帝國，而斯巴達就此宣戰。修氏說：「我相信此戰真實而未會道破的原因，是雅典威力之高漲使南方諸國畏忌，迫得他們主戰；但是當日公布的開戰理由是如下：……就是另一說法（*Peloponnesian War* 卷一第二十三章）。

所以希臘天下之亡，亡於伯理克理斯的雅典之手。窮兵黷武貿易爭利為戰爭之原，古今一樣。雅典之驕橫弄權，產生一種強權政治的因果圈套，正與現代相同——同盟離叛，合縱連橫，汝詐我虞，朝秦暮楚，強則欺凌小國，弱則討好鄰邦，於是內戰頻仍，卒歸覆滅，杜蘭蒂斷曰：

「在他（伯理克理斯）治下，雅典文化已臻絕頂，只因這致強之術，一部靠強制盟邦的富力，一部靠惹人猜忌的暴力，所以黃金時代的基礎不健全。到了後來，雅典人的政治手腕不足以應付和平策略，亡無日矣。」（前引書第四四二頁）

我們當不至於頭腦簡單，以為帝國主義的民主國家的問題，到現代世界才發生。雅典對於強權政治的原則及武力至上主義，都已熟稔。他們知道帝國的尊嚴，專靠強硬手段對待屬國。像印度總督，他們用強硬手段對付求恢復自由的國，這強硬政策叫他於米羅斯（Melos）島叛變之後，屠殺一切壯丁，並將婦孺入籍，賣為奴隸，雖然他們自己愛好『自由』與『德謨克拉西』。邁提羅斯（Mytilos）島叛變，就斬叛變領袖一千名的首級。蓋帝國主義的邏輯不得不出此。所以〔雅典議員〕克利翁對雅典國曾說：『你們須明白，你們的帝國是憑恃武力威鎮屬國的專制制度。那些屬國百姓常在陰謀叛變；你怎樣克己待他們，也不肯輸誠悅服。只有武力到那里，他們便順從到那里。他們何嘗愛你們？故惟有出諸威鎮一法而已也。』（修氏前引書卷三第三十七章）

雅典人最長議論，他們也會排斥『道義』，發揮強權政治，辯護『從權』政策（expellency）〔羅斯福辯護北非政策語〕。在那雅典人與米羅斯人著名的辯論一段中，雅典人說：

『你我大家應說老實話，不要高談闊論。因為你我都明白，世間上所謂公道，只有雙方力量抗衡時，才會攀上那一套。強者能取什麼，就要什麼，弱者被迫到那里，就得讓到那

里。……誰有本事，就做主子，這是天經地義，人類確實如此，神仙也許如此。這弱肉強食的天經地義，並非我們所發明，也非由我們創始；我們只是受之先代，而傳之後世罷了。我們確知你們及全人類，如有我們今日的權力，也必如此作法。』〔前引書卷五第八章，一〇五章〕

這些話之透闢詳盡，就使德國外交部長利彭賓洛浦（Ribbentrop）或是前任印度總督林離高（Linthgow）也無以過之。

雅典人深信強權武力，牢不可破，以致他們的和平策略失敗。希臘卻也相信一種因緣道理，叫做 *nemesis*（冤冤相報），驕橫（*hybris*）必取覆滅。希臘的悲劇中常反復表彰此義，但在國際政治上都茫然無視，雖然我們也不比他們高明。

在雅典人和米羅斯人對辯一段中，有一種滑稽意味，很像伊索寓言。雅典人很像貓哭老鼠威嚇利誘，要迫他們加入他們的『世界大聯盟』，而米羅斯人像老鼠見貓，求他們大發慈悲，准免享受歸入雅典老母貓肚裏的殊恩。你把今日印度代替米羅斯人讀去，便得了一副修昔的底斯式的現代政治畫圖：

『米羅斯人：你們做我們的主子，固然有好處，但是我們做你們的奴才，怎會於我們有利？』

雅典人：你們的好處，就是屈服可免吃面前虧；而我們的好處，也因保存你們而得便宜。

米羅斯人：但是我們一定要互相仇視嗎？假使我們保守中立，與你們親睦，大家不能好好做朋友嗎？

雅典人：不。還是你們的仇意比你們的親善來得乾脆。因為仇視態度，在我們的屬國看來，表示我們的威風，而你們的親善，反見得我們示弱。』

邱吉爾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在英國議院演講，擁護殖民地部長司丹雷 (Stanley) 的強硬政策。說完時，工黨議員德戴爾 (John Dugdale) 質問，邱首相知道不知道司丹雷那篇『稍微驕慢的話會在美國及大英聯邦引起反感？』邱首相答道：『我們固然不必驕慢，但也不可示弱。』

修氏能於兩千年前將現代政治家的心理動機這樣剖析入微，只見古今人情本來一樣。就是蘇格拉底限定三十天赴死正法的時候，那些人還認為妥洽讓步，就是『示弱』。那位七十老翁碰巧相信 Satyagraha (印度語) 節烈不屈的氣義。告他的人安尼士司 (Anytus) 是代表法律治安，並且代表仁義道德，還按節上廟焚香禱告，安尼士司是個好人，是個規矩信教徒，場面很好看。還有一個好人，名叫彼列多 (Pontius Pilate)，對於一重公案〔耶穌被告案〕洗手脫個一乾二淨。誰說彼列多不是好人？他不過遵循外交規矩，不願意干涉他國內政而已，雖然這是冤殺無辜的一樁案子。老實說罷，古今同類的事，多得想起來就作嘔。

證今篇第五

此篇專言印度問題原名「邱吉爾與伯理克理斯」反證古今證明今日帝國與自由的衝突仍未解決且因此大戰宗旨中途改變暗伏第三次大戰的殺機

讀史固然要耗費金錢精力，修氏一部希臘內戰史在現代叢書買來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讀這部書，也許結果現代世界的耗費損失還要大。因為今日帝國和自由衝突的問題，還未解決，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談起印度問題。

夫印度問題，不僅是印度的問題，乃人類自由的問題，所以已經演出一種矛盾的局面，在這自由戰爭中，印度的自由戰士因犯爲自由而戰的罪名而坐監牢。除了英人而外，對此都會發怔一下。

啊，自由二字，何等動人！撞起自由的鐘！但是你要傾愛自由，須教自由之神先脫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歐洲的女裝。有英國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國的郊野茅屋，炊烟芳草，落日湖邊，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騎着大象在萬山深林中遊行。人類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道我們所愛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國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圍一條透明蟬翼羽紗，無形無色，只用慧心靈眼才看得見。

所以此刻現在，英人正在爲自由而戰，同時也正在戰爲自由而戰的印度人。印度人也正在爲自由而戰，希望獲得自由可以幫助英人在這場自由戰爭中去爲自由而戰。這樣一篇糊塗賬，

越弄越糊塗，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過頭腦的話，必然中風不語。可是這也毋須過慮。在印度不會去談到『四種自由』，或是聽人提起。提起有點難爲情罷！先打勝仗，再用頭腦！只有英人強健的頭腦，才會超脫一切逆情悖理的難關，而據我看來，這難關不難度過。你只須聽印度總督報告囚殺的成績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斷然無疑。『至一九四二年八月爲止，殺死九百四十名，擊傷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萬另二百二十九名，判決有罪一萬六千名，囚禁未付審一萬八千名，』新共和週刊有一篇通訊說：『總督報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場報告殺豬一樣。』且須記住這每隻豬都是一位自由戰士，不怕淫威，鞭打繲綫都不怕，抑豬糞終究是豬糞耶？

近來我冤枉得了一個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紐約婦女認爲排英，因爲我會真心替印度自由呼籲。這呼籲印度自由與排英有什麼關係，我始終看不出，而我的紐約女友也說不出來。我的態度很明顯；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頑，不管那一國，我國也在內。我不僅反對邱吉爾的守舊黨的印度政策——我痛惡而深絕之。邱吉爾是英國人，我也知道，但於我，他的國籍與問題無關；不管這政策出於英法中日任何國之手，我都要痛惡而深絕之。我會明白分辨英國守舊黨人與開明黨人之不同，也會辨別邱吉爾與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美國報館編輯，遇着兩位英國人如邱首相與肯德堡大主教意見恰恰相反之時，認爲應該雙方加以贊同，將這大戰宗旨做個人情，以免越禮。我決不肯把大戰宗旨送我的至親密友做人

情，甚至或是送給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問題，我可退讓。要是鄰邦的內部政策，我也可退讓。甚至問題是先運什麼入中國——先運軍火或是先運可口可樂給駐華的美國空軍，我還可以退讓。但是到人類自由關頭，我決不肯讓步，因為大義所在，不容苟且，而我深知我們今日在帝國與自由之間不得不擇一而從，不容易敷衍過去。因為邱吉爾明目張膽護持帝國主義，我可以推知他小時希臘歷史不會用過功。這還小事，關係重大的是，因為一人壟斷全戰爭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這大戰的性質，目標與宗旨中途改變，然而這大戰的勝利卻須賴中蘇英美各國人的頭顱共同換來。這關係綦重，就是英國的真友，也不當因送人情裝啞吧，噤若寒蟬起來。

其實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把世界人類作戰的宗旨做人情，送給他的至親密友，或是上帝。歷史上不論何時代，自由與反動的勢力都在角鬪，爭佔上風。各人應該運用他的聰明智力去分辨認識這兩種勢力，而站在自由與革命家一旁，毫無袒護的和反動的健將挑戰。有些美國編輯想要討好雙方。但那位老將明站那邊，視死如歸，誓不肯經管清理大英帝國。諸位美國編輯，千萬不可小覷這員老將。那老人家閱事不少，伎倆很高。凡是遇着口談仁義頭頭是道的人，你要小心。當着這員老將聲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盤』(“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屬印度人無疑的國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國作戰，這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口唸『亞孟』？要是這回戰爭是英德兩國的私鬪，這話也沒什麼不該，誰打贏，誰保守他的地盤，那些屬國只當他們的賭品。如果屬國不高興的話，那是另一件事，另開一回戰，由屬國與勝利國去

解決。但這次大戰又不是兩國的私戰，還牽連到多少旁人。英國首相聲明他存意將大英轄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時，中國人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蘭人想到爪哇國，而美國人就想到了自由之神。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邱首相在英下議院討論大英帝國殖民地之將來，說道：『本政府深信無疑，大英殖民地之將來統治，須繼續爲大英國一己的責任。』這是清楚確定無疑昭告我們，邱吉爾立定主張，要保守印度，緬甸，馬來半島，星洲，香港，錫蘭島的版圖。這樣一來，也須讓其他帝國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觀之，將來自成白種人在亞洲的帝國捲土重來的局面。所以個人認邱吉爾爲將來和會上的梅特涅，不是錯見。（按拿破崙敗後，維也納和平會議，由梅特涅親王領導，恢復各國貴族皇室，協同摧殘所有革命勢力，而造成以後五十年間歐洲反動勢力的大集合。）

假如我們以爲邱吉爾忘記亞洲，便是錯了；他永不忘記亞洲——是殖民區。也許我們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國，而是世界人類半自由半奴隸的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問題是，我們這戰爭是否爲爭些主義原則，使戰爭不再實現，求一比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這些問題都不便討論——不管大英帝國的清理或是荷蘭帝國，法蘭西帝國，日本帝國的清理。大家不要談吧。先打勝仗，仗打完了，梅特涅親王總在那邊，大家才開始爭吵攘奪。然後再過三四十年，大家再來幹一下。

要尋究歷史，不能鑽在已經檢查過的日報紙堆中，去追尋那些天天討論的很熱鬧的小枝節。要尋究歷史，應研察主持國政者的心理，去探討本源。印度人說克利浦斯爵士赴印開始談判之時，曾經答應他們組織『內閣』，而克爵士的隨員一樣熱烈的否認他曾經應允給他們組閣的真權實柄（按此指美記者 Oris Fisher 與某英人在紐約國民週刊之爭辯）。在這種情形之下，旁人若以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發癩，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該事之人（這現代伯理克理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誰讀完了以下邱吉爾於一九三〇、三一年所說對於印度基本態度的話，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敗，便是低能兒。要明白這印度問題的經過，須先明白我們的伯理克理斯（雅典王，說見上章）。一九三〇年正月，邱吉爾說，『早晚你們必須打倒甘地和印度國民大會黨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主張』——這些主張恰巧是大西洋憲章用來適用於印度的原則。在西門爵士使團在印度接洽談判之時及其後，反對與印度開談判，認為有傷帝國及其政府人物之尊嚴，喊得最響的人便是邱吉爾，一九三一年三月他說：『我們討論這些問題，只抬高一些永遠不能與我們同意的匹夫的聲價，一方損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嚴和權威。』一九三一年二月，他說：『把這（治印度的）責任移交極勉強極有少數的印度政客黨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種無恥的行爲，便是懦怯，棄職而逃，喪盡廉恥的行爲。這便是使大不列顛含垢蒙羞，在世界歷史上永遠污及大英帝國代天宣德澤及萬民的令名。』原文照錄如下：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ar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 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 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 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這段妙文頗有大英帝國詩人吉卜寧腔調 (Kipling-esque)，邱吉爾和吉卜寧同時在南非洲戰爭中充當記者，吉卜寧對於他邦『不識聖教的下級異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見，邱氏也贊同。嗚呼，使邱氏生於十六世紀尚不失為一位英雄好漢，使生於十七、十八世紀，也足以守先待後；於十九世紀，他便是一位賢臣名相，於二十世紀，他只是唱吉卜寧調的違背時潮的史跡。他主張堅決，立志不移，言詞伶俐，在那幾句話中，不但可以解釋克爵士赴印之失敗，並可解釋整個印度政策之現在與將來。古代希臘伯理克里斯王在國勢正盛之時說話，也不會比他莊嚴，皮匠克利翁 (Cleon) 不會比他愛國，賣麻繩的優克雷底斯 (Euclerates) 不會比他堅決，連賣油燈的海破婆魯斯 (Hyperbolicus) 也不會對雅典市民發出更悅耳媚衆的腔調〔按諸人皆伯理克里斯死後主持雅典政府人物〕。我書至此，不禁想起亞諾的詩句幾行：〔那首詩寫英國南岸海邊的海嘯，名爲“Dover Beach”。詩長短句，弔今追古，慨嘆大道淪亡，斯文掃地，以現代英國與古代希臘相比。莎復克利 (Sophocles) 乃希臘詩人。〕

沙復克利昔居伊海之濱兮，其爲時已甚遠，
曾聞長浪之呼嘯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遠之北海兮，亦聞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濫於兩極，
儼彩幢之舒卷兮，若雲旗之奪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聞長波之太息，
聲宛宛以淒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風之悲鳴兮，漸汨沒乎尾閭。

嗟唯余與汝兮，瞻蒼茫之暮色，
嘆長夜之漫漫兮，心倉皇而失策，
若兩軍之喪明兮，羌渾沌而夜擊。

所以我們不必去推敲印度問題之枝節。雙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類自由的中心問題撇開，可以辯得你倘恍迷離，莫知所適。一個人要做一件事，總會拿出理由來，一個大國定了一種政策，總會採取名正言順的手段。有時你同人家爭辯，就已承認對方的理由有爭辯之價值。

假如此刻，有人對印度人說，美國種族宗教極複雜，有天主教徒，耶穌教徒，猶太人，又有新政策主義者，反對新政策主義者，又有民主黨，共和黨，共產黨，社會黨，東北省人，東南省人，內革羅人，又有浸禮會，美以美會，安息日會，聖公會，摩門教（多妻教），而且猶太人，意大利人，希臘人，愛耳蘭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條街坊，而且美國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門，印度人也只好搖頭作罷，不再去理辯那錯綜迷離的紛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鄰而居，而且如美國的意大利人同愛耳蘭人相安無事，也許更易相處。不但此也，對於一件事他們全國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兩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國。南斯拉夫國不是一樣嗎？也有天主教，猶太人，克羅忒族，色皮亞族，但是合之於我有利，我們就毫不遲疑把這些異族合併。老實說，假如印度沒有回教，英人也須捏造個回教出來。宗教這東西是上帝恩賜大英帝國的寶物，大英帝國和一神論不能兩立。多神論正有好處理。

但印度問題枝節雖不談，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類自由的問題，我要談，且非談不可。因我不帶獨眼眼鏡，又不和亞司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視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視挪威希臘波蘭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蘇聯而痛惡納粹，德國或俄國要消滅希臘波蘭的自由，我都要同樣反對。

這種態度有點難懂。有些美國人對於美國十三洲脫離英國獨立與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作兩種看法。配恩 (Tom Paine) [美國獨立戰爭中文字最動人的作者] 的話使奉為民主要典，同樣

的話出於甘地尼赫魯口中，便是異端邪說。我不是美國人，不能這樣分作兩種看法。由我看來，華盛頓跟甘地尼赫魯一樣的『排英』，一樣的固執己見。可見得雙眼眼鏡委實不便。我也知道邱吉爾在紐約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圓滑些，附和羣衆，稱頌在英國危傾時我所欽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帶雙眼眼鏡，或者只靠一雙天然眼。

慚愧的很，我對印度人爭取自由或法國人暗中組織爭取自由，看不出什麼分別，印度政府刊布白皮書，指明印度黨人的言論引起地方騷擾及破壞產業。東印度兩條鐵路被炸壞了，這白皮書大書而特書。如果巴黎通利爾及巴黎通里昂兩條鐵路被破壞，美國報界不知將如何褒揚這些解放人類的自由戰士！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話，證明精神不死，永不會爲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兩條鐵路炸壞，我也引以爲憾，因爲這有妨礙共同作戰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自從英國未經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對德宣戰之後，中間經過兩年半，印度黨人力主鎮靜，而英國方面不肯稍讓一步，改善局勢。等到日本打入緬甸，印度聲嘶力竭的呼籲自由，才臨時抱佛脚，派遣克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實權防衛國境；英人卻不肯交還實權。克爵士一行的實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國』的主張（Pakistan）〔此爲第一次承認〕，留爲將來印度分裂之禍機。爵士回國，印人要求重開談判，都不見效。須知印度之爭，卻是在美國分輸贏；英人在美國宣傳勝利了，所以認爲十分滿意。印度黨人及民衆日益激昂，懷恨英人日深，而民氣

日趨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動。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開談判的希望失敗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總督，說要開始和平不合作運動。英人不肯受人威脅。甘地要求見總督，而總督擺出撫台的威風不許他見。就此逮捕黨人入獄，這逮捕後來依英人法庭判定，認為違法。這沒有武裝的『叛變』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國報紙表示意見，說英人剿變之後，必繼以撫綏，重開談判。然而英人卻『強硬』到底？

過了恰恰半載，甘地聲明他要絕食，不是抗議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議他民族的受冤屈。他明知是向頑石乞憐，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無罪也好，他總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頑強，總督也是剛決。甘地已經快要死了，而此後英印合作之夢將擊個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七十六頁的白皮書，聲稱黨人有引起暴動的言行，據說，印度政府的職責是維持治安，而黨人正圖擾動秩序。『橫豎我們武力強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強調方法相同。況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們是為自由而戰。』

所謂佛法業緣一說之是非，就是看你認為此事之餘波就此結束，或是認為餘波會蕩漾下去，與其他潮流併合。

如果英國政府的動機，是要對一手無寸鐵的屬國豎立威信，這目的確已達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為後日英印合作的張本，那機會便永遠錯過了。武力征服叛變，無論有無武裝的叛變，也可以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國武力制人，威信復立之後，還是不許黨中與黨

外的領袖有機會聚頭，商討一個政治解決，雖然一九四二年十月間未入獄的領袖有這樣明確的要求。這種冥頑不靈的政策使無可原諒。英人所說『印度人自己不肯團結』這句話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獄中，似不是交換意見的理想環境。就是印度和尙〔Yogi 有仙術〕也做不來，而且甘地不是有仙術的印度和尙。『文思突破囹圄』還是文人一句說話，不適宜於拉查哥巴拉查利亞，或薩勃廬，或尼赫魯〔可以調解諸人〕。

英國這種作風，由一種假定看來才可以明白，而這假定卻是事實。這就是說同盟國武備充實之時，亞洲人什麼觀感好壞，都可不理。老實說，一九四二年整個作戰策略，都是基於一種心理習慣，說印度人，中國人，俄國人反感如何，儘可置諸度外。爲什麼呢，因爲英美將來有大量充實的空軍。

這一場印度問題的經過，只是指明我們未曾認清帝國與自由衝突的問題，只是指明我們精神上還未覺悟，相信『局勢有把握』時，猜疑畏忌痛恨仇惡都不足重輕。這所謂有把握的講法，就是說暴動可用武裝軍隊彈壓，而正與希特勒想法相同。我們可以斷定，戰後的印度局勢將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獨立的理由還要依然存在。東西政治哲學若有不同，便是關於武力淫威暫時成功後的久遠用處。亞洲人乖巧一點，認爲爲圖長久計，顧到民情要緊，衆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後天下可以太平。

今日這回大戰所爭只有一端——就是帝國與自由之衝突。有兩位世界領袖站在對方的兩極

——一邊是蔣介石，認爲『但知愛國，猶未可也』即須兼愛天下，（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紐約論壇報所登『中國戰後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戰時克維爾護士 Ethel Cavell 語。）另一邊是邱吉爾，認爲但知愛國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擇一而從。現代歐洲強權政治的標準和亞洲傳統倫理的標準正相背而馳。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說的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現在這帝國與自由衝突的問題，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戰爭一時未了結，我們須暫把這問題按下，至少不使妨礙我們共同作戰的努力，雖然我們在亞洲作戰的策略，也憑我們願見戰後怎樣一個亞洲而定。但是每個關心時務的作家都有職責，須告訴國民民事局的真相。並於必要時加以警告，無論如何，不得蒙蔽事實以欺大衆。同盟分裂的根芽已在，既然無法抹殺，只好把他揭曉，期弭禍患於未萌。因爲戰爭或者不足使我們分裂，和平卻可使我們分崩離析。夫欲和平必須集體安全，必然而無疑，欲求集體安全，必得美國合作，又必然而無疑。然而美國或進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憑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質。安琪兒爵士（在美的英國作者，見第一章）高調提倡集體安全，反對美國孤立。但他卻茫然不知這樣高調闊論，遇見一個激起美國人民悔恨的和平條約，便全然失效。高談闊論，勸美合作，雖是要緊，更要緊的是謀一個和平條約，值得美國的合作。美國人士也不必你來苦口婆心勸告。由心理上觀察，此刻的美國人預備放棄孤立態度比歐洲某國人預備放棄強權及帝國主義還要爽快。兩者都得同時放棄；不

然，歐洲請美國幫忙合作之時，只是請美國合作幫忙歐洲的帝國主義。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國國際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國民衆所能贊同的公平和議辦法一事爲轉移，倘使帝國主義的條約復見，必激起美國憤而孤立，那時仰首嗟歎，也無補於事了。安琪兒爵士忘記美國的孤立態度歷史上是怎樣發生的。孤立態度之發生，由於凡爾賽條約激起反感厭憎，由於『了結一切戰爭的戰爭』一轉變成爭奪分贓的戰爭，理想幻滅，民心失望。再來一個凡爾賽，美國國民又要慨嘆上了歐洲搗鬼政治家當的當，又要悔恨惆悵，退而獨善其身。在嚴重的犧牲之後，眼見理想消滅，而嗒然若喪，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國人民也不能免俗。因爲世界保安隊要美國加入的話，就是要美國共同捍護那和平條約所訂定的國際秩序，而這國際秩序須教美國民衆誠心相信是值得捍護的。假定說，這國際秩序只是恢復歐洲列強的亞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隊的職責便是要用武力來維護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擔保這制度者，乃美國人民的生命與金錢。可是，美國和中國一樣，自身一個殖民地也沒有。你教美國人不要爲幾條大義公理而戰，美國人便覺得殺身而不能成仁，師出無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我相信大西洋憲章，足爲世界長治久安的穩固基礎，恰如威爾遜的十四條件，如果不在和議時臨時捐棄，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礎。然而就是大西洋憲章那些主張，此刻已被憲章發動人之一斥爲『神話』（邱吉爾三月十八日演說首段），而關於怎樣去實行這些主張，他已經認爲此刻討論含『危險性』。

美國的立場，光明正大。這戰爭的宗旨是爲爭世界各國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憲章存意是要『普遍』適用於各地各民族。美國的民衆是贊同羅斯福的。美國的立場，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但是那兩位共同起草大西洋憲章的朋友，尙有公事未了，自從羅斯福說明該憲章的適用範圍至此已有一年多，而邱吉爾尙不肯與羅斯福同聲說這憲章是普遍適用於『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確定憲章的範圍，或是聲明一下，說美國的解釋是不誤的。他不肯適用這憲章於印度；他說這些主張條件『一點不限制，'bid not qualify in any way'』關於印度緬甸及大英帝國其他部分立憲發展的歷次聲明』。換言之，大西洋憲章的真諦妙道，人人都須實行，只有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可以特別寬免。況且應該注意，他自己相關的『歷次聲明』是如下：一九三〇年十月，他說，『我從不擬想在我們看得到的時期中，給印度與加拿大相同的憲法權利與政制』；一九三一年正月，他說：『除了在大戰期間印度代表得列席開會的純粹場面儀式上的意義 (purely ceremonial sense) 以外，誰也不會設想，在我們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間中，關於印度的原則與政策會實行起來。』〔按現時華府『聯合國會議』諸國列席，正合『場面儀式上的意義』〕

但是那話是一九三一年說的。大西洋憲章是一九四一年夏簽定的。那時美國還未加入戰爭。不確定憲章適用範圍，倒有好處。因爲倘使那時邱氏像他現在這樣清楚說法，也許美國不

會加入帝國之戰。但是一九四二，四三年這兩年中同盟國仗打得好，勝利已望得到，英國愈強愈自信，而美國也已加入戰爭，欲罷不能了。當時他不肯清楚聲明的現在卻聲明的很乾脆，毫不含糊。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工黨議員馬可文(J. Mc Govern)質問邱首相，他關於大英帝國的聲明的意思是否說，『德國於戰後須交還佔領的土地，而英國不必。』邱氏答道，『這樣比擬實屬侮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紐約論壇報登載聯美社電)。他又提防人家誤會，以爲他誤解大西洋憲章將適用於英國屬地與德國屬地相同，所以不憚辭費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國宣傳部長)轉達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誰『要走自招大禍的錯着，要毀滅或交出我們可觀的遺產，我想帝國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這種的意思……我們非捍衛我們的權利不可，』他對勃烈根聲明。『我們既是聯合國國家的基本會員之一，絕不對我們的百姓說，我們可以讓世界任何國欺負。聯合國國家的責任須大家聯合到底。』

誰也明白，美國肯定一個解放菲利賓的年限，使菲利賓人相信美國的誠意。同樣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國的誠意。那末，爲什麼期限未立，是誰反對呢？揮鐵格的書我們不能逃避歷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一九四三年出版)，告訴我們一段啓人聰明的軼事。「閣員中有一些人決定要用冷不妨手段迫他(邱氏)即刻進行。據那回席中人之一出來告訴人家，「愛慕利(守舊黨員現充倫敦政府的印度部長)正在說，打敗希特勒之後，我們應定個給印度聯邦地位的期限。話剛說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還未開口，忽聞

邱吉爾吼的一聲，正像獅子中擊一般。霎時間房中空氣頓然肅清，宛如真有一隻獅子步入室內。從此這題目就沒有人再提起了。」（第二四三頁）

所以現在大家糊裏糊塗，莫知適從，就爲這個緣故。帝國與自由衝突的難關我們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雖然邱首相專講『先打勝仗』，在戰局未轉以前盡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認得清楚，說得坦白，而羅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爭也不是，不和他爭也不是。羅斯福對這帝國與自由的問題一天不表示態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對大戰宗旨糊裏糊塗，莫名其妙。大家應該認清這員『老將』，不管他帶不帶圓頂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維也納（梅特涅親王，主持維也納和會）他便留個小髭。不要汲汲記住他是英國人，或是，如紐約時報所稱（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一週大事記』），『這二十多年來，他是守舊黨員之中堅』，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說，他是『吉卜寧詩人浪漫時代的帝國主義信徒』。今日的世界無所用乎吉卜寧時代的帝國主義者，也無需乎梅特涅。

因這緣故，我們今日不知大西洋憲章何時適用何時不適用，莫名其妙。依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紐約時報社論，這一討論，便會引起大英邱首相所認爲『危險』的爭端。但是依這篇社論：

『爭端卻已引起，而從這爭論中，可以看出兩種將來國際組織的粗略規模。一種是基於大西洋憲章的嚴確解釋，期望一種世界，無論大小國，大家平等相處，並爲集體安全及相互

利益，藉一種國際的機構在政治及經濟上同心合作。另一種是比較縮限於歐洲，期望一個由英俄二國共同保管的歐洲，而其他較小的國因疆界之遠近，或傾於英，或傾於俄。（按即三月二十一日邱氏重要演講所宣布）……

第一種主張也許似理想國烏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國（在國內）的道理推廣及於世界。美國現在對付局部的現有問題，還是本着這道理做去，還是承認波羅的海俄國邊境的小國國土的完整。那第二種主張，不似烏托邦，而是着重「現實」，以武力抗衡原則及強權政治為基礎。」

這篇社評結論有精警語：

「今日所見局面，可以看兩個不可稍缺的要點。將來美國對於國際合作最後決定的態度，大抵要憑戰後和議之性質而定。同時，這戰後和議的性質之形成，也要看我們（美國）有無表示，仗打完後，肯積極參加世界的政局。」

俗語說：有備無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國戰時及戰後國際上的合作，須肯出一個代價，而那代價就是人類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則，一點不許還價。據我私人觀察，此刻美人完全願意負戰時及戰後國際合作上極大的犧牲，如果有法使美國人相信這代價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見凡爾賽式和約復現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國不肯收拾往事，忘記前鑒，只顧收拾本利，乘勝打劫，集體安全便不可收拾（雙方關語）：『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a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談到一九四三年三月號『英國』月刊 (Britain, 紐約英國宣傳部發刊) 所摘載格立格爵士 (Sir Edward Grigg) 在倫敦星期日時報的一段話，就竦然而懼：

『英美兩國政府都已對法聲明，法國帝國可以完全恢復，並已對西班牙葡萄牙聲明，絕不割削他們兩個帝國的國境。且我們應當假定，聯合國中之兩位有殖民地的國，荷蘭與比利時，如有同樣的請求時，也必照樣的允許。那麼是否惟有大英帝國應該解散？』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雅 (Kenya) 總督，並在英國政府歷任要職。像凡爾賽和會所揭發的戰爭期中祕密條約已經開始密訂了。這回大戰的性質日益顯露出來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戲，教也無用。當代政治家的頭腦永不會學新意義的戰爭與和平。威爾遜十四條件之廢棄不用，以此也。大西洋憲章之主義原則，現已致疑，以後將復捐棄，也以此也。

同盟國分心作戰，便不能共同勝利，無論男女，人人早晚須靜心一想，各定主張，倒底這回是為自由而戰，或是為帝國而戰。二者之間，無法通融，二者之外，別無良策。我們須在羅斯福與邱吉爾之間，擇一而從，因為取此必捨彼。羅邱也者，兩種道理而已。

果報篇第六

此篇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伏機及引百年前詩人之懺語作證

今日大家正在討論方法，用綁帶繫起戰後世界的經濟爛瘡，然而對於所謂二十世紀文化人心道術上的毒瘤，卻動也不敢去動。毒瘤的附近皮膚最怕疼，所以我們的政治家時評家從不敢去觸動他的膚殼。所以同盟國的政府始終一貫服從『先打勝仗』的政策，目前一時，那些先打勝仗黨員可以恣所欲爲。一切戰爭的根苗，窮兵黷武，武力抗衡，貿易競爭，種族偏見，一件不缺，依然存在。希臘歷史的殷鑑，我們全然置之不理，一切戰爭的禍苗，在讀史的人顯而易見，而在計劃戰後世界的人茫然未覺。那些精通工程的建築師所建沙灘上的房屋非一日傾陷不可。

因爲如上文已經說過，此刻要勒住蘇聯與中國的脖頸，已經太遲。英美中俄無疑的將爲今後五十年間推移歷史的四大強國。據英人口稱，戰後將解放印度自由，那末還有一個亞洲民族四萬萬人的友誼或是仇惡，須算在上頭。現此英美獨霸戰時策略，明指英美也要獨霸戰後和平，依此看來，我們明白清楚已回到那歐洲幾百年傳下來的武力抗衡 (balance of power 亦作『均勢』) 的路上。這英美獨霸的方式，在此地可以暫稱爲 A A 式 (即 Anglo-American Pattern)。這 A A 式必遮拾『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西方政治科學以秦制楚遠交近

攻)的老套，讓A A世界與非A A世界一時相處於武裝的友誼及敵愾的親睦的一種世界。必有各種各式的『世界合作』及『世界警衛隊』出現，而善說辭令的人，必然大談起和衷共濟國際親睦的新時代。然權力之爲物，動而不靜，故決無所謂『武力均勢』這東西。時移境遷，有的伸張起來，有的衰弱下去，舊盟瓦解，新盟成立。那時勢均力敵的均衡便又推翻了，而世界又須大屠殺一次，等到後代的和平匠又以老規矩準繩替我們造一種新『均勢』。這『武力均勢』的學說，幾百年來迭次引起歐洲每三四十一年一次的戰禍。把這策略擴充到全世界去，就是要把世界變成一所幾十年一次大屠殺的戰場。強權政治及武力抗衡，總是激起一種緊張形勢，像走繩一般。這緊張形勢發生國際間互相猜疑畏忌，有些國家勢力伸張，猜忌便愈甚。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十年，大家看得見這形勢愈緊，猜忌愈甚，等到有一國看看情勢，只好先發制人。凡同樣的畏忌猜疑，必發生同樣的結果。這方式是永遠不易的。

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戰又要來了。我們決不爲未來戰爭之兇殘而畏怯，不爲犧牲之嚴重而止步，不爲堂上堂下父母妻兒的哀淚而短志，因爲後代的子弟，未曾親歷這次戰禍，還要踴躍從戎去拯人類於水火，爭取六七八種自由。但是第二次大戰爭的犧牲比起這次的流血來，就同一場惡夢而已。大自然向來不怕揮霍，生幾千萬殺幾千萬都不算一回事。倘是人類願意兄弟相殘大屠殺一下，上帝也願意。再五十萬年，上帝便再造成比較聰明比較良善講理的一種動物出來。那些專談強權政治的人也不能怪造物。強權政治家既然以『自然主義』及『自然物競』爲

護身符（說見血地第十七），他們也應願受物競天擇的果報。他們於政治戰爭以正視『現實』（放棄大義）沾沾自得，所以對於戰爭的結果，也應該注視『現實』，不應苛求。

而且再來什麼災祥妖異，我們也不怕了，加伯烈（首位天使）不會再下降塵凡來給人間傳達神旨。水變成酒無聊的神蹟騙不過科學的化驗。倘然大魚吐出了一個約拿（見聖經）來，也不足以欺我輩，經過記者盤問一下，必定把他送進瘋人院。詹威廉（心理學家）之神不肯降壇，保障我們必有來生（詹氏死前有此約，未能踐行）。天上不會再降流火，也不會夜間有火柱替我們照光，白天有雲柱替我們領路。禱告禁食誦經燒香盡都無益，至少於我們，那已是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了。一點辦法都沒有。

外交家當然莫不開口稱道邦交友善，背地裏卻莫不乖巧，把這些辭令打個折扣。各種各式的領管制度，關稅問題，警衛分區，及國際飛機場，都會經過一場討論定出辦法。也許會協定一個五十年的和平條約，那條約的價值，也正與尼西亚的五十年和約相等（Peace of Nicinus 公曆前四二一年希臘內戰時所定，不過六年便破壞）。出席和會的代表也必定都是嚴父賢夫愛國者。但他們所造的房屋要建在沙灘上。

這A A派既然確實存在，現在勢力甚大，且握有實權，他們對非A A世界所取武裝友誼政策的結果，不難推斷。他們怎樣離間非A A諸國，須看他們的政治手腕多少靈敏，現在中國外交政策是確定與A A合作攜手。這種武裝的友誼能否實現，要全憑英美迫中國上聯俄的做的

法能否成功。這一件又得看中國於下次大戰爭要計算一下，何種的同盟最可靠最忠實，而這一件又得看中國於此次大戰及戰後和會之經驗所得而定。中國今日國際上的聯合，雖然在民主思想立場上很相宜，而在種族及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卻顯然不合。中國自身既非實業發達而因此並非帝國主義的國家，到底他有否達到與帝國主義的國家平等同盟地位的可能，尙未證明或細加研究。但是我們所可確定者，中國必不肯長期屈服人下，受人不齒，也許會回心不敢高攀，還是左右找皮膚色素較重的人認他們做同盟妥當。不幸而言中，這便是世界史最可惜的事，特別是在印度的背景，還有人正在吹起仇英的灰燼，怕他不出火，這種惡孽真是所謂不能逃避歷史。

且須記住，這場鬪爭未爆發以前，早已生出一種局面，由新興勢力之抗衡，而成爲德國日本復興最自然合理的局面。雙方必各向德日討好，鼓勵他們重振旗鼓，正如我們於一九四〇年間那麼高興成功的做法。換一句話，雖然經過這次重大的犧牲，又要歸到原處，再從頭打起。丟個頭顱本來叫老母寡妻難受，惟頭顱白丟，叫人枉死，豈非大可哀乎？

也許以上推算各發展之趨勢及程序未必盡然。但是大家卻應該中夜深思，對於權力在歷史上的伸張發展，抗衡均勢之如何形成，如何傾覆，細細一想。大家須盤詰查究一下，強權政治原則是否可靠，藉武力均勢維持永久和平的基本原則可否信賴。對這問題大家討論，互相駁詰，尋個究竟。惟有如此，談論世界和平，才不至於隔靴搔癢。我們的思想習慣須根本改變，

才尋得活路出來。

天下本有陰陽消長之象可證，興亡離合之迹可尋，惟在一點靈犀鑒照出來。有時天賦詩人以這種先知先覺的聰明，不用星相，惟洞明歷史興亡之迹，便可預卜將來。在這些天才，這種消長倚伏之象，看得瞭如指掌，不啻神仙托夢，現身說法。海尼（Heinrich Heine，德國大詩人，猶太族，生於公歷一七九七至一八五六）便是這樣一位天才，見過這種神仙托夢，他深知熟識德國民族的精神，所以能夠預卜所謂『德國革命』及今日納粹精神之品質，斷得一點不差，又洞照歐洲思想萌芽發育之勢力，所以能夠預卜『歐洲或世界革命』，並且預言今日正在開演的幾幕戲，幻然有仙術。他說有個德國雷霆振作之一日，其來也漸，而其至也必：

『其時那轟轟雷鳴，霹靂而至——當心啊，法國人，你們這些鄰近的小孩兒……不要莞爾而笑我的話，以為痴人說夢，勸告你們仔細當心康德，斐希德及自然主義的信徒。不要莞爾而笑一個迂僻的預言家，算定在精神界已引起革命，在物質界也必有同樣的革命。』

海尼於一八三四年著『德國之宗教與哲學』一書，說到耶穌十字架那件脆弱的法寶將要打碎，而德國民族古代深山裏的神祇將復顯靈。他警告我們將要『聽見世界歷史上空前的霹靂一聲雷』。

『諸位切莫以為這德國的革命來勢較弱，因為革命之前有過康德的 critique（『人類理性的批評』理性哲學名著），有過麥希德的超物唯心論，甚至有過研究物界的自然哲學……

因爲康德信徒毀棄一切傳統思想，拳頭來得更硬；斐希德信徒超物唯心，一切靈空，不畏危難，更要勇往無忌；而自然哲學的信徒尤爲可怕，因爲他與宇宙風雲雷澤洪水猛獸聯繫起來，他由古代德國民族的汎神教可以降下夜叉魔將，到那時候，古代日耳曼族好勇鬪狠的野性將復萌，不爲攻城奪地而戰，只爲殺戮而殺戮。耶穌教稍微節制這殺戮的野性，其功固不可沒，然只能稍加節制，不足把他消滅。一旦十字架這件法寶打碎，那些古代戰士之狂性復發，那便是古代北日耳曼民族詩人所常歌誦的病狂。那件法寶是脆薄易破的，總有一天要擊個粉碎。那時斷瓦頽垣中的石像，將要活現起來，揉他千年長眠的眼睛，拂拭千年積穢的塵土。雷神 Thor 將復跳躍飛奔，拿起千斤鐵槌摧毀中古天主教堂……

『……那時你們聽見世界歷史上空前的霹靂一聲，便知德國的暴雷已經震作。這霹靂一聲，將教神鷹墜地，而非洲漠野上的獅子曳尾躲入洞中。這回演出的戲要使法國革命比較起來像一齣「小放牛」……

『當心啊！我是好意，所以盡情吐露這孽煞天機。解放了的德國比起聯合克羅忒族，嘎索族的天主教大同盟還要可怕。……』（見『海尼散文選集』Heinrich Heine: Works of Prose, ed. by Hermann Kesten 第五一至五七頁。）

恰恰一百零一年前，在一八四二年，他預言『世界革命』，這是一幕劇，我們已經看見其首端，而海尼不敢預卜其收場。他是馬克斯的朋友，明察革命思想之性質，兼有詩人的眼力，

能先卜這回戰爭中德法英俄的命運，毫釐不爽：

「共產主義就是這可怕的戰士之隱名，他將建立無產階級的政府，引起軒然大波，來反抗現在中產階級的轄統。這兩方決鬥兇很可怕。怎樣收場呢？除了神仙以外，沒人曉得！所可確知者，共產主義，此時雖然臥在亭子間的破草褥上，無人顧問，將來會成爲一位異出的英雄，在這現代的悲劇之短快一幕，扮演偉大的角色。……」

「這一來的戰爭，將成最殘酷爲禍最烈的戰爭，不幸將牽入歐洲最文明的兩國，德國與法國，而使結果兩敗俱傷。英國是一條大海蛇精，隨時可以潛躲海裏深處，而俄國也可以退伏於其茂柏深林寥原寒野上——這兩國在平常的政治戰爭，不管如何打敗仗，永遠殲滅不了。但在這樣的戰爭，德國處勢之危遠過他國，法國尤可於最可憐的狀態中亡國。

「這還不過是那場大劇的第一幕，就像開幕的道白而已。第二幕便是世界革命，這是有錢的貴族階級和窮民的大決鬥。在這決鬥中，也不分宗教國族，只有一個祖國——就是地球——而只有一種主義——就是人類的幸福。世界各國的傳統宗教會不會窮極而思出抵抗——而這會不會成爲第三幕？舊有的專制傳統會不會改裝換調重復登場？這齣戲如何下場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條大蛇精頭顱要被擊碎，而那隻北冰洋的狗熊（俄國）也得有人食其肉而寢其皮。也許結果只剩一羣馴畜，由一位宰牧看管——一位行所欲爲的宰牧；手持

一根鐵拐杖，看管一羣羊毛剪得一樣，啼聲哀鳴一樣的畜生！

『此去大難將至，如有先知要寫一本新的天書（指聖經新約『默示錄』），他得重新創造新的妖怪——比起來約翰所見的妖物就同馴鴿和小愛神一般。那時上下神祇正在掩面而哭，哀憐他們掌管這麼多年的凡間人類，也許也正爲自己數運將終，悲啼自憐。這未來世界聞來有一種臭味，和着俄國熟皮，腥血，不畏天命及許多響皮條的響聲（The future smells of Russian leather, blood, godlessness and many whippings）。我勸告後代人類的子孫，生下來背後的肉皮要頑厚堅韌些才好。』（上引書第一三六至一三八頁）

嗚呼，惟有詩人異士，高瞻遠矚，始可以知天。海尼既詳知德國的種族精神，又熟審歐洲人心道術之隆污，且身經革命與反動之兩大時期，與梅特涅同時，是以咨嗟而興嘆。故其言曰『當心啊，我是好意，所以盡情吐露這孽煞天機。』他已經見『在精神界上的革命』，所以也能預卜『物質界上同樣的革命』。

我輩生於海尼之後百年，此百年間人心道術之變，尤易撫尋，也可以聊試小技，研究此人心道術之去向。我輩也可用心明察當代文化之性質，解決道術隆污之難題，雖然同污者多而同隆者少。也許我輩也可預卜大難之將至，惟苟能毅然斬除科學定命論之桎梏，未敢預卜，始爲大賢。〔科學定命論，見『血地』，『亡道』，『當代』等篇，尤詳『化物篇』。〕

卷二 道術

排物篇第七

此篇原名『白種人之重負』言由物質主義觀點求世界和平之乖錯

今日天下騷動，人心苦矣。未有和平哲學，而欲謀一妥善和平計劃，必不可得。欲於世界政治求一根本改革，非先於人生處世及政治哲學與其思想方法起個革命不可。此十年間人心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降至低點，滅天理，窮人欲，為衆所公認。把我們當代的人與十八世紀的法國百科全書家相比，我們只算是那開明時代的不肖子孫。我們具有戰爭哲學，戰爭心理，戰爭政治，及戰爭武器，一切齊備，怎樣會逃得戰爭？今日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回流血犧牲以後，過了些時是否又得來重新混戰廝殺一下？

歸根結底，和平與戰爭的問題關鍵，全憑一代人心之信念為轉移。和平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人倫人性的信念問題。我相信這純是哲學的問題，是看時人所信仰崇奉者為何物。本書後段〔卷三卷四〕說明，這只是看我輩相信科學定命論或相信意志自由，確信暴力淫威的定命論，或確信精神道德。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頭無路。然而不幸，今日乃棄信悖道的天

下。

我們所最需要的，就是陰陽消長，禍福倚伏，萬物齊一，復歸本原的哲理。不知此道，武力至上之說攻不破。理想與實際今日〔在西洋〕分道揚鑣，須使復通於一，而產生一種無所不包的哲學，使天人相通，天理與人情得以復合。高談闊論聳入雲際的學術與腳踏實地的人事須得聯繫，相輔而行，商賈不復視道義爲『不合時務』，而功利之徒不復以『實際主義』爲飾詞。〔美國名作家李伯門 (Walter Lippmann) 嘗稱美國人『頭腦是理想，心胸是唯物』。〕凡人能深明消長倚伏萬物同宗之真諦，他的行事也就會循理做去。

西人精神達到這步，將見西方哲學通脫圓渾起來，心上練達，行事老成，而西人的巧妙心機，亦正如佳醴，將見老而彌醇。在這虞詐攻伐競爭磨礪的現代，人心如鋼鐵一般的芒利鏗薄，到時定見老成涵蓄，養晦韜光。今日『鋼鐵時代』，不僅船身是用鋼板造的，就是人心道術也是察察缺缺。老子稱至柔之道，言『柔者道之用』，而今日的人心卻是堅強的，蓋人心之幻變靡常，是以老子言勿撓人心：

『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見莊子在宥篇〕

今日看來，人心真若奪羈而奔的驕馬了。

西方思想使我最驚奇的一點，就是完全缺乏一種和平的哲學（和氣致祥）。所謂和平也者，非指日後烏托邦之理想和平，乃現此經常人生處世方法，適用於家國，並適用於世界。比如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術，就全未發展。西方的社會思想，不是經濟學，便是政治學。在我看來，酸澀乏味，猶不如食一顆大紅蘋果。

社會科學政治科學政治之術，不是財貨之給養，便是生產與消費之停勻，或出口與入口之相抵，再不然便是〔政治學〕以此制度彼之防範設備，或法庭衣冠之禮節，或是經過法定手續申誓而經律師簽證的一張廢紙所發生的權利與義務。所謂社會也者，乃各種不同而互相衝突的利益的集合，專賴法律去調劑，借以節防過度的自由；在較高明的說法，把範圍放廣些，並包括道德上之制裁，即習尚禮俗之制裁，是為儒教之所同意。但是普通西人的社會觀念是法律式的與數學式的，正如節制糧食，計分發票。除了宗教仁慈之道以外，這種法家苛刻對人的觀念以為一人只須謹守禁章，有點侮辱人類的尊嚴。依這看法，獨身的銀行家便成理想的國民，因為他又是獨身，又是銀行家，善逃女人及捐稅的圈套。

但法家觀念，猶非主要；西人之視人生之性質，宗旨及活動，九成五是經濟觀的。經過十九二十兩世紀，器用發明日多，而這種觀念益根深蒂固，到了現在，人類進化就只看為生活程度之提高，而生活提高，也便是人類進化。我們口中所談，筆下所書，夢中所見，唯此一端而已。

我在大學念書時代，就聽見『白種人的重負』這名詞，老想着，不知那白種人背在肩上漫遊世界那布袋中所裝爲何物。近來才發明，所裝的是罐頭而已。可憐的吉卜寧（詩人創設此名詞，以歌頌大英帝國代天宣德的使命），要是他僑居印度的時候，沒有罐頭牛肉及罐頭沙丁，他就活不了，不能晚年回國去當聖安得烈大學校長。固然，你不能否認，他能把牛肉沙丁吃進肚裏，化爲新詩妙詞，玲瓏可喜，歌頌武功及賦得盡善盡美的航運制度，使他僑居阿拉哈巴及拉合爾猶吃得到牛肉與沙丁。

每聞人言西人物質主義，這話卻不能看做一句口頭禪。近代思想整個骨子裏就是物質主義。這物質主義壟斷一切戰後的計慮，致使和平哲學無地置足於其間，今日一切關於世界和平之提案，豈非根據一種假定，謂欲矯正經濟進化之弊端，只須再求經濟進化；我們之所謂和平善後，豈非明指貿易之自由，物質之交換，及生意之『亨盛』？換句話說，和平便是罐頭，愈多愈妙。和平也者，我們得以大量傾銷利源開暢之謂也。『天堂』便是一座鋼骨水泥的棧房，罐頭裝得汗牛充棟。

蓋今日之天下，已成一種生意，政治的生意和經濟的生意。一個國家就是一家商店，政府公署便是這家商店的店櫃門面，外交公使就是商店派出走江湖的兜客，到處和別家兜客競爭拉攏生意，推廣銷場，而國中論壇權威思想巨擘便是這商店的核計專員。聽這些人大言不慚侈談和平辦法，就教我心悸。（按西洋現行社論家行文必列數字，若高加索產油幾咖噲，古巴產糖

在美國入口之百分額，阿比新尼亞棉質長短幾何米理米突，否則不足爲專家，而投稿雜誌報章，亦難邀青覽。」

經濟思想已取其他一切思想而代之，經濟問題已蒙蔽一切其他問題，這有誰能否認？我們所願慮者，只是如何用膏藥貼上經濟社會的爛瘡；我們精神上的最高期望，就是生意興隆，財貨充實，這有誰能否認？這功利強權的欲望本身含着未來戰爭的根苗，又有誰能否認？誰能駁斥此十年來爲人心道德破產，政治與倫理分道揚鑣時期？這物質主義，不但不是一句空談俗套，且成爲我們行事抉別十九之動機。事實上，已蔽塞我們的聰明了。

香皂是好的，這不必說。美國文明最動人之處，就是香皂的物美價廉。在美國旅館，香皂白送不花錢的。在美國盥洗，又方便，又雅致。美國人也許不自覺，但歐亞二洲的旅客卻深得這個印象。隨便買什麼香皂都是上等貨色。香皂已非奢侈品，上等異香馥郁的香皂五分錢就可買到。香皂已經平民化了。至少世上問題已經解決其一了。還有其他擦去衣服油垢，補漆桌案傷痕的問題也一併透徹的解決了；我們已有奇異靈敏的仙方了。

工業的進步與實業的考究，在今日已成雄厚的勢力，日益進展，莫之能禦。你把一切的科學家逮捕入獄，懲罰都旁 (Du Pont) 及通用電力 (General Electric) 公司的董事，而物質的進步的學然。你囚禁發光漆之發明家，褫奪室內涼氣制之考證家，而新的發明家將降生於阿桑拿省的沙漠，並得警察通同作弊，祕密送到紐約或底脫廬。科學已經登極，你不能把他從寶座拉下

來，且也不必。

香皂確已充實豐富了。這是美國民主政制之一大建樹。可怪的是，同時和平哲學完全缺乏，無跡可尋。把香皂賣給霍屯督野族，而使美國的香皂廠主得大發其財，並非取治之道。但是我們所能達到思想的最高峯至此而止。你提出一個計劃，可以賣香皂給四萬萬的印度人，大家無不樂從，且感興奮。要是提議交還印度人的自由，便有種種的爲難，疑問，藉口，搪塞，而不見一點熱誠。萬一同盟國如果有交還印度自由之一天，必定是一副哭喪臉，若曰『真可惜，但是此外也別無辦法。』在這樣情形之下，做個聖賢，像莎文那羅拉 (Savonarola) 大聲疾呼，痛斥現世之物質主義，並非難事。稍有普通知識的人都會。可怪的是，普通知識並不普通。何以故？我們都被經濟學家嚇壞，不敢作聲罷了。

世上如有一事引起我的殘酷野性，那便是養人如養豬一般見識的經濟學。此生唯一的宏願，就看見歐洲稱雄獨霸的經濟學家梟首示衆。我看見百分之幾的數字，便怒不可遏。如果經濟學家對於他的枝節數字，不那麼沾沾自喜，躊躇滿志，也不至於惹我這般懷恨。臉上是那副候補哲學博士之神情——迂腐乖僻，給條目數字，統計的平均及機械的公例灌醉了，此乃醫家所謂身上發毒，自己毒昏。拐子至少也會說會笑，但是經濟學家卻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他最怕的是感情作用，他整個大學教育就是教他如此〔說見亡道篇〕。他只求能客觀，求上帝保佑他排脫一切的情感。他確知無疑某物（不管何物），在一九四二年是百分之二十七又半，而

在一九四三年卻是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三。〔按荀子有好名詞，斥此輩爲「散儒」。荀子勸學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又曰：「不降禮，雖察辯，散儒也。」孔子對子夏警告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亦指此輩。子夏博聞強記，善說三百篇昆蟲草木之名，故夫子施以警告。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禮乃立身行世之大端，既博之又必約之，學有歸宿，斯不爲散矣。附此一笑。〕經濟學家對於數字分數之自矜，正如皮鞋匠之矜伐皮貨。傳說哥探城(Gotham)〔英國名城〕被攻時，有鞋匠建議，將城牆以牛皮封固以禦敵，而經濟學家也擬用他的統計平均分數來捍衛世界的和平。他想，只要施弄手術，把這些數字分配好，天下便太平了。他告訴你，這是科學，是實事求是客觀的科學。他有他專家的技術，一套的法寶，專門的名詞，教人望而生畏。這就是他的念咒經文；他所崇奉的佛爺就是物質主義，而他自身便是這教門的方丈法師。

據說，世界和平乃專家的本事，世界求治亦如製人造橡皮一樣而已。據說，和平的內容是關稅之減低，國際航空線及飛機場之成立，還有船運及保險之資源，國外投資之保證，戶口疏散之排比，及生活程度之提高。所謂和平也者，只是分發糧食的票號給世界。由是觀之，只消聘請一夥關稅專家，航空專家，船運專家，保險專家，橡皮專家，仙人掌專家，（共五十八種，各有專家，）及苜蓿專家（包括平葉及曲葉專家，一類照請，）而把這些專家分司分科，

組織一和平公署，天下便可太平了。

就是這一流的物質主義，令人髮指。我並無意為講經和尚，不過物質的崇拜有點過分罷。欲得正覺，第一着便須生起覺悟，知此迷信之非，而明這種和平觀念之不足恃。

明樂篇第八

此篇言中國哲學不顯顯於政治組織貨殖給養且治政治與倫理於一爐以禮樂刑政並舉爲政治之源國家齊治必基於道德習尙藉此益見經濟學見解之淺陋

但是什麼叫做和平哲學（致治之術）呢？平治乃現此人生所必不可缺之條件，並非幾百千年後的烏托邦理想。安者人之常，猶健康爲人之常。和平者：非消極的理想——戰禍平靜之謂；我們必須有積極的和平哲學。國泰民安，於是乎天地化育，萬物滋長，而芸芸衆生得托生於其間，各善其事，安居樂業，優遊以卒歲，豈非萬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經？故得治沖和乃得人情之常，人心之厭戰，亦猶耳之厭亂聲。且家齊國治天下平，其理本一，惟在人倫中和之道而已。欲得人倫之中和，必有其道。哲學的任務，應排斥一切，專一研求這人間倫常之道。

自然我常想，中國思想有何可以貢獻於世界和平問題。中國的社會，普通說起來，也不比西洋社會高明。也有貧苦無告，口角紛爭，貪污利己，貧富不均。中國的反動派比外國一樣多，只是高官厚祿之間，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來，真令人毛髮竦然。究竟和達爾蘭接洽的人，看到賴伐爾（法國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難免眼紅。兩者都是放棄道義，專言權變，但是究竟同小嘍囉接洽的人，看見他人能與賊王寨主接洽，總要眼紅。中國也講經講權，這是儒教所許的。但是無論如何，中國人還相信禮義廉恥的大端，認爲行事上不可須臾離之。

中國與西方絕對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師，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國治國四千年就用不着律師與巡警，而當兵向來爲人所鄙賤。中國生活乃不重數學的生活，由於不重數學的思想習慣所造成。

於此可見，中國對於治術觀法，顯有不同。中國人認爲法繁則無公理，警多則無自由（『擾民』），兵衆則無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簡刑輕，無爲而治的簡單要術。社會既有良莠不齊，總得有個官廳，把幾個流氓壞蛋押入牢獄，政府官廳之用處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結，若要和平，先不見兵，大家賣刀買牛，還里歸田，和平政治之術，最後皆賴禮樂化民成功。

我說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並非戲言。這確實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條。蓋儒家治政治與倫理於一爐。儒家素以着重實際明理見稱，然而偏有這以禮樂治國的迂僻結論。美國人向也着重實際，也許還可同意，對於以巡警治國，尤其是以特務隊治國，視爲可厭。他們也許並可同意，法律治國雖然可行，猶有遺憾，未臻美善。他們知道，普魯士式的嚴行禁令（Verboten），不足爲民主國民所心服，而僅一套『毋得擅犯，如違重罰』的禁令公文，未必便足產生好道樂道之人（所謂『民免而無恥』）。他們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謨克拉西，社會治安全靠社會各份子廉潔自好不屑爲非爲本。

我最喜歡美國人，莫如看見他們違犯禁章之時，看見在電影院，觀衆不同情於維護法律的

船主，而同情於不買票偷上船的船客，看見在華盛頓到紐約的火車上，在每輛貼告『不許吸煙』的車中，都有人公然吸煙。我對自己說，這些真是民主國的主人翁。如果犯禁太多，情形不堪之時，還不是查票委員及大人先生要給他禁止，是要由某君投稿紐約時報，告訴煙灰燒傷嬰孩手臂的危險，可望大家良心發現。如果公衆民意不反對，查票員也就不反對。但是別夢想普魯士人在『禁止吸煙』的車上會吸煙！這是萬不可能，所以惠馬的民主政府（Weimar Republic 德國戰後民主政府）非垮台不可。你教一個希忒勒去看管一些美國羣衆，禁他們『毋得』如此，『毋得』如彼，結果可以推知。不到三月，他的頭顱就得敲碎。美國也曾通令全國戒酒，而德謨克拉西對這禁令的答復，便是祕密酒店。祕密酒店的歷史，便可指明美國人肯否服從普魯士式的禁章，甚至肯否服從自己通過的法律。我惟有對這種美國人民免冠致敬，因為他們愛好自由，如中國人。你不能以法令空文禁戒美人，或是華人。法章愈禁，陽奉陰違者愈多。恭祝我們兩國主義相同！

話雖如此，着重實際的美國人士聽見孔子以音樂化民治國的道理，便對孔夫子頭腦清楚只求實際的令名要引起懷疑。惟沙嚴先生才會發這種迂論。（Saroyan，現代作家，有兒童的天真）。但我確認夫子並非咄咄書空，下文將詳論之。孔子正會天真，苦中作樂。（在陳絕糧，絃歌不衰）。孔子不但真說過以樂化民的話，並且重復申述之而不厭。他對爲政崇尚禮樂，闡說不厭其詳，以致有一位門人當真奉行起來。有一天孔子走到武城，言偃爲宰，他聽到街頭巷尾

弦歌的聲音：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我選儒家說禮說樂這方面來講，所以證明儒家之重精神文化，以與西洋反視，而益顯經濟學致治之術之陋。單憑財貨之安排布置以求治安那種思想之幼稚淺陋，就可不辯而知。我們急須改正觀念，不可以爲說禮樂中和的精神只是書獃，而暢談罐頭者始爲實際。若所謂只求實際者，係指專言飲食衣冠宮室器皿的物質條件，那絕非所以言儒道者。

孔子言爲國的條件如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子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和平之心理，既然於國家天下應用相同，我們此地可以研究這和平的要素。我們凡言政治，例必認爲純係政制機關的簡別問題，與倫理問題截然爲二。儒家以爲政治之道有四，「禮樂刑政」，而政事只居其一。實則儒家早就鄙夷純賴行政的解決方法爲不足憑。明乎此，始足以言以樂治國之異論。所謂致治，不僅是囚禁幾個流氓入獄，釋放幾個良民出獄的機械問題，

而是要移風易俗，使國家社會趨於禮義，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音樂便代表人民安居樂業歌舞昇平之自然氣象。據那說法，言詩言樂，幾乎成爲人生之意義，文化之終點所在。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和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禮記

禮運篇

由天下太平稱爲『大順』這種看法，可見和平非僅戰事平靜之謂，乃多種教化之力養育出來健全人類社會之結果。由此看來，欲求世治，單藉行政的解決辦法自然不足，治國不僅限於『治理』之治，於是乎必尙禮樂，禮樂刑政同爲社會致治之方，目的相同。樂記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樂記篇之說樂，乃用心理學說法。禮樂所以『教民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然後『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社會之不安，政治之紛亂，皆起於『血氣』心術

無所制防，未得其正。欲求世治，最後還是正人心，非外物所可強使之『治』，這種天下大亂追源於人的心術的道理，猶適用於今日。故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樂記）

〔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爲物欲所克，而成物質主義。『人化物』卽已失人道，故可譯爲“dehumanized”。又是爲物所化，故並不可譯爲“materialistic”。所以『物質主義』之形容詞見於古籍者，當以『人化物』一語爲最早。〕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行，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按王道卽治道，卽和平要術〕

至此而禮樂與治道之密切關係，可以明矣。政者正也，必先教民以正。故曰：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和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按樂記爲世界名作，常與西方學者言之，嘖嘖稱歎，謂「樂同禮異」，「樂內禮外」，哲學條理甚明。惜乎今日，若不翻爲白話文，不知其中味矣。〕

這節文以禮樂相對而言，稱爲治道之工具，含有深奧哲理，可以大開眼界，並可糾正普通誤謬，以爲孔教務求實際，只講杯盤鍋灶，或是眼光與經濟學相等，文明進化以飲食便泄二事了之。故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又曰，『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按此哲理，已入形而上學，而有玄學意味。〕

最後，我們可以明治道之本及反情和志爲強國之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和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反情和志，乃反人情之正，使意志相和，故譯爲「to create harmony by a rediscovery of human nature」。〕

我可斷言，孔子聽見西洋學者欲求撥亂反治於飲食便泄之間，就要不耐煩，與我相同。我

們如果以爲亞洲人對於白種的罐頭食物會覺滿意，便是大錯。亞洲人所寶貴者，乃空罐頭而已，因其光彩悅目，玲瓏悅耳，使得心靈快活，至於果腹問題，儘管有香蕉。

卜算篇第九

此篇原名『數學與和平』言和平非排比數字分發票號所可辦到大旨排斥機械心理可與簿書篇並讀

我們論事，眼光太窄，見識太板。上文已經提到中國之鄙夷數學式的思想。此爲中國文化之弱點，也正是中國文化之長處。人生要節，都是超乎規矩方圓數學範圍之外。因人之所以爲人，而非機器號碼，正在其心理叵測，心理叵測之處，也正是人事推移之所係。譬如靈魂使無法數分數點，上帝，自由，正義，誠信，自好，自尊等也都超乎數學之外，非在數學之內。在相反的方面，忿憤，嫉妬，仇恨，畏忌，殘酷，野心，也在數學之外，非在數學之內。所以使人生變卦者，就是這些出沒靡定喜怒哀樂之情，而我們所最懵懂不明者，亦正是這些。其來去出沒，無從預卜，但行事之間卻又不能不爲之提防。要計劃世界和平，最要就是這些成分，但是請教那些經濟數學專家，盡是徒然。

和平也者，非數學公式也，也非數學方程式所能解決。上章言儒家崇尚禮樂，可見中國思想精確不足，而玄通有餘。蓋天地之間，至大至微，莫不超逸數理。惟其科學到了測算天文及原子之行動時，才搖頭喪志，覺得數學的公例告窮。『今日科學在至大至微之間，數學公例走入窮途，因此兩端斷頭，科學家知之，常人獨未之知。依數學言之，原子盡應擊破，宇宙不存。愛因斯坦此刻正在搔首撚髭，欲合至大至微之道於一統系，而不可得，詳見齊物篇。』所

以今日討論戰後和平的圖案內容，還不如討論達到和平之入手方法，及我們對於求治程序的概念。我們對於求治程序的概念是數學式的，而亞洲對於建設和平思想上之貢獻，就是否認這數學入手方法之足爲憑恃。

數學是呆板的，人生是靈活的，是以數學決不足以解釋人生。把黃鐘大呂化爲每秒幾波的聲浪，並不足以解釋彭利利與蘇門女士 (Lily Pons, Elizabeth Schumann 歌劇明星)，所以解釋彭利利與蘇門女士者，乃其悠揚擊節之混成『泛音』，這混成泛音卻不即不離於可量與不可量之間。取精確者必捨玄妙，取玄妙者，亦必捨精確。惟和平既爲人生之一部，是以數學亦將無法解釋和平，理解和平，或創設和平。

換句話說，和平並非節制糧食計口發票的制度所可造成。是故疆界不明，鄰邦安寧。關稅不訂，貿易增進。戶口數字若模糊，和平解決即易圖。列強若不管小國，弱小民族便安樂。大砲口徑記不清，三次大戰便不成。

所以我會竊想，下次和平會議專派女人充當代表，和平便有希望，因爲普通女人數字糊裏糊塗，若必有男代表出席，只好先定規例，惟小學時數學曾經不及格者始有資格當選，以免破壞和平。事實上，連美國國務卿赫爾，也可懂得較精要的和平哲理問題，如果他左右沒有那位數學狂的巴斯弗羅斯基 (Pasvol'sky 經濟專家)。

且慎毋忘記，即在物質界上，科學說明事物之『然』(how)，卻永不曾說明『其所以然』

(why)，『何所爲而然』(wherefor)。科學的範圍是事物之過程，不是事物之本因，或是成績結果之意義。事物之過程屬於數學之內，其本因及意義位乎數學之外。科學說明原子如何行動，而不知其所以必如此行動。知道兩粒鈉碳分子結合，而不知道何以這兩分子必須如此結合。科學描寫酸類鹼類，而於酸類之所以爲酸爲鹼的究竟，一無所知。科學證明金雞納霜可醫瘧疾，而不知這藥怎樣殺死瘧菌。科學描寫地心吸力，而不敢冒充說知道地心吸力是何物，或者何以要有這地心吸力。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科學仍是止步，進不得去。科學知道橡實萌芽長成橡樹，而不知橡實成樹之所以然。科學視察證明『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適者』之所從來(arrival of the fittest)，無法解釋。他能解釋長頸鹿之長頸在生存競爭之價值(可食非洲高樹杪的嫩枝細葉)，而無法解釋第一條長頸出現所必有化學上及生理學上的變動經過。他告訴你金錢豹的斑點有隱伏草叢中的作用，而你問他這金錢斑點怎樣來的，科學便啞口無言。他解釋花香的存在價值，但是你問他丁香檸檬怎樣造出那奇香，他只低首赧然，無辭以對。他告訴你，蠶食桑葉生絲，蜂採花心釀蜜，牛吃青草生奶，除此以外，也沒有發明什麼新義。因爲歸根結蒂，還是蠶能生絲，蜂能釀蜜，牛能生奶這麼一句話，而丁香樹也能從一撮園土造出那無可倫比的奇香。且由這些草木昆蟲做起來，都極簡單易爲，一揮而就，準不出岔。

在物質界如此，在精神界及人事上，更加如此。耶穌教徒之崇尚物質及其唯物史觀唯物人

生觀，常令我非耶穌的人怒髮衝冠。我已說過，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頭無路。凡人生稍可寶貴之事，都非科學所能證驗，要信以爲真，惟賴信念。先舉一例，民主政治之中心思想，個人之尊嚴，絕對無法證明；科學決定無法證明個人有什麼尊嚴。主觀一入，客觀不存，而人生卻是十九係於主觀態度。一個女人要做閨媛，便是閨媛，要做婊子，便是婊子。霎時間婊子可以化成閨媛，惟在一轉念之間耳。這一轉念之幾，也正同宇宙間花香鳥語之神祕，叫科學無法解釋。同樣的，科學對於人類之安樂自由平等，一點沒有意見，因爲這些美惡妍醜本非科學的範圍，也無法收入科學的籠中。自由無法證驗。世界合作之可能性，也無法證驗。其可能與否，非科學所證驗，惟有證之於心，驗之於行，〔信而行之，斯足爲知。〕就是酒徒馱子狀元宰相的兒子，命裏是好是壞，都沒法子證驗或預卜。箇人總是逃出科學的圈套；惟有集合多數，像保險公司的統計，才可彷彿立出一條定命論（機械式）的公例。但是除非人類社會整個用定命論看法，人類社會的科學，連一個入手法門都辦不到。除非我們讓步，承認男女人類只聽某種機械力量隨意擺布，奈何不得，就不得不承認一切人類行動的科學（若歷史科學，詩詞科學）爲萬不可能。

以機械方法解決和平世治問題，危險就在此點。但是西人數學式的思想習慣已經固定不移。職是之故，大家莫知適從——戰後和平計劃成百，而一點出路都沒有。沒有一種計劃，叫我們有把握，安心相信世界和平可做得得到。西人思想之完全機械化，可由個人數種經驗舉例作

證？

我在大學唸書時代，最大刺激之一，就是聽到『臭味有體質論』。我原以為臭味就是臭味，就不屬於精神，至少也沒有什麼物質，根本就不去管他。這末一說，臭味是物體的細部，由某物播發出來，襲擊鼻官的神經尾端，也就得假定有這些細物時時刻刻由某物射發出來，充滿空間，理論可以看得見。這也許對，也許不對，我全不知道。也許樟腦丸裏的分發這些物體出來。但是又得假定無論何物何人，都是這樣射發細體，滿播空中。狗能聞見人類所不能聞的味，有的香甜，有的惡臭。狗有言語，必有許多形容恰當分味的名詞，不像我們只有『香』『臭』『酸』『辣』幾字而已。某味與某味相投，某味與某味不合；甚至可以聞到一種『臭味的交響曲』（語病），與音一樣。同時這些物體都得跳躍蕩漾乎空中。但是，大體說來，這說還說得過去。

至於光，這物體說已岌岌可危了，因為最有名教授至此不能同意。光是否物體，或是只是某種激動，某種波浪？如是波浪，是什麼波浪，激動什麼？此巷不通，我們已經碰壁。光係物體說，理論上有許多困難。假定光是細體，而深夜空谷中兩點燈光向各處射發這細體，我們就得假定，凡在任何可以並見這兩點光之處，必有兩件物體同時存在於同地（科學理論所不容）。到頭來，光是物體之說，由後世看來，必算為現此機械時代人之黑暗迷信。現今因為通行機械觀念，我們束手無策，因為無論世上什麼東西，想來非有物體不可，所以光為何質。已成為我

們的悶啞謎，只好稱之爲『量子』(quantum)，量子也者，蓋言某量(quantity)而已。什麼的
量呢？〔參見齊物篇〕

我還記得，上施維思教授 (Edouard Sievers 德國語言學專家) 的課，聽說詩詞的韻律，
不是兩音一拍，便是三音一拍。這個自然，因爲一音不能自成律，而四音必復析而爲一與三，
或二與二的分段。但這就不科學。另外有半科學的解釋，說人類韻律拍節的感覺，有個物質的
基礎。二音節是基於走路時左右兩腳的行動。那末三音節呢？三音節是基於呼吸——呼時一
拍，吸時二拍。這種話並非科學，乃科學界的茶餘酒後之談資 ("small talk" 即閒談)。外人
很少知道，文科教授常由科學轉入科學的『閒話』——如說羅馬帝國亡於蚊子 (即亡於瘧疾，
是即所謂歷史閒話)。科學閒話，正與社交的閒話一樣，叫人聽來又有趣又動聽。

最近有一位朋友私下告訴我他的時間論。這時間論認爲時間之長短久暫，本無絕對標準，
是憑獨斷的。比如一個早晨，由一隻夏蟲看來，未必和壽命七八十歲的人看來長短一樣。我說
莊子正正說過這話『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大年小年之喻。但是他說，他曾和一位醫
生談過，而那位醫生說，他所言不謬，但是這時間之感覺大抵和脈搏之快慢有關！我幾乎目瞪
口呆。常人不大知道，這種閒話，這類無從證驗的假定，如何佈滿文科的科學，如心理學；也
不會料到心理分析之學整個統系大半是揣度臆測的性質。〔比如說，小兒時大便寬，將來爲人
樂善好施，小兒時常祕結，將來爲人頑固吝嗇。勞治貝根的神靈保庇！Roger Bacon 首創歸

納方法論之一人」

我舉以上數例，所以指明今人思想方法之機械化，無可補救。因此，在討論和平問題上，也只顧談機械的國界，分區，限額，噸數，方里，人口等等，逃不出其範圍，而對於和平必不可少之其他較高尙無形的東西，只好置之不問。我們對於數字有一種迷信。克爾伯森（Culbertson）即勃立治——打牌的發明者，有戰後計劃，詳見簿書篇）將打勃立治牌的數學方法，移到國際警衛隊上面，以圖解決，便是一例。只要發一張國際上的『將牌』，認為公共的，大家可以召取，而同時依照某種分牌方法，他相信沒有一位牌手可以打贏其餘的人。他對於席上打牌者的『賭品』卻一字不提——有人手中牌壞而冒險性大，有人明明一副必勝的好牌，只因心神不定，與座旁美人談天，就將良機白白錯過。在他看法，這國際警衛隊的牌戲，如同一架自動機，誰來小試，定要輸錢。

上次大戰之後，美國參議院得了一次經驗，想出一個保險的機構，可使美國不再牽入漩渦中，就是定『現款交易自備船運』的原則，使美國物質上與戰區隔開。從前德國潛水艇打沉載運美國船客貨物的美國船艦，所以美國牽入漩渦，所以他們便想，要斷絕物質上的聯係，應該禁止美國船艦及美國貨物駛入戰區海上！再簡單沒有。他們忘記，還有一個人類心理問題，也許在某時，美國人將不願實行這現款交易自備船運的原則，甚至有時，實行這條禁律將竟為輿論所不容。所以紙牌造成的房屋，還是紙牌一樣穩固。不，亞刺伯號碼或是羅馬式字數不能給

我們和平。號頭數字於分發糧食票或彩票甚相宜，或是可做和平計劃的工具，但決不足爲和平的屏障。

所以我還是相信孔夫子，相信禮樂治國。孔子毫不思慮逸出數學的範圍，而求社會政治之治於道德人心之治。他甚至超出行政法律的範圍，以求反情和志。他並指出人心感於外物，生出好惡，若不加節防，便爲世亂之源。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

明禮篇第十

此篇言禮讓爲禮教之一部與強權政治之非奪相
反去爭奪惟有禮讓別無他道末復以近事證之

此地似應爲『以禮治國』作辯。禮卽禮貌與儀節。中文『禮』字包括此二義復引伸發揮爲以倫常秩序爲立治的基礎之精義，而社交（鄉飲酒，冠禮，射禮守）宗教（嘗類郊禘等）及宗廟（如賓軍大祀廟禮等）之儀節，成爲這倫常秩序之儀表法文。

禮者，乃儒家之中心思想，其哲學的目的，在由於心理建設好治惡亂之心造成社會間移風易俗的倫常秩序。孔教在中文卽稱爲『禮教』。姑棄其精義不講，單講通常所謂『禮貌』之禮，猶宛然易辨。華人自稱爲『禮讓之邦』，蓋言中國文明之所以別於蠻夷（往時鄰邦事實上確是蠻族）而得號稱文明者，正以其崇尚禮讓二字而已；南蠻北狄東夷西夷，惟解揮拳攘臂，不遜不悌，未識讓長者先行之禮法。（按禮字包括禮貌與禮俗，英文亦有同例，manners一字是也。西人亦將『禮』與『俗』併爲一談，故言manners and morals。）這禮貌就是我們所認爲文明禮教之象徵。對古代蠻夷言，惟有我們懂得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的規矩。據儒家說法，由於禮樂揖讓之推行，可以移風易俗，化人心而改造社會。國家大典要揖讓作樂，鄉間季節也要揖讓作樂，結婚儀上也要揖讓作樂。由這揖讓鼓樂，人心爲所感化，就如路易第十五宮庭的士女，溫文爾雅，進退作揖，大家覺得文明樣子。（按其時中國文化在歐洲影響極

大，故其男人梳辮子，穿緞褲，貴人坐轎子，陳列重磁器，惟辮子嫌短，不甚美觀。」孔子言射，君子猶爭，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由於廟禮社禮之訓練，大家學得尊卑長幼之序，謙和禮讓之心。由於宗廟拜祖之禮，大家養成孝敬長上不敢忘本的態度。有一次孔子陪魯君去看齊王，獻以周公禮樂，而齊王僅進東夷的野舞野樂，弄得齊王極窘，相較之下，自覺形穢。孔子曰：「看一國人的跳舞，就知道那國人的德性，」（「觀其舞知其德」，出樂記）。

孔子比旁人更明白羣衆心理學，禮節乃是一種儀表，而大衆非有看得見的儀表不可。季氏旅於泰山，不但是亂禮，並且表示其犯上作亂之心。季氏不遵大夫規矩，用四陣的舞女，而襲天子之禮，用八陣舞女（「八脩」）於宴會上，孔子便嘆道：「這個忍得住，什麼忍不住？」名詞本來也是表記之一種，所以孔子又立了「正名」的重要概念。孔子一生只作春秋一書，其用意即在正名，教人名詞不可濫用。推其用意，春秋把楚王書爲楚子，楚君便在心理上，道德上先輸了一陣，而或可起其痛悔亂禮之念，羞慚無所容身。是以孟子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儒家求治，專以心理學入手，甚足注意。誰要候考哲學博士，做篇博士論文，以「孔子之心理學」爲題，甚爲容易。篇中可飾以現代名詞，如「習慣心理」（「性相近，習相遠」）「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及小兒在家學孝敬爲立身之本，「做效心理」（「君子化民之道，其身

正，不令而行』『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等，『兒時修練的潛意識反應』（『父召無諾』長大了『君令召，不俟駕』）及『以象徵制約羣衆』（禮儀隆節）等時行名詞。我並非反對心理學，因人類行爲必基於心理，只要心理學家勿冒充『科學』盜取自然科學的招牌（說見化物篇），只要學孔子和詹威廉談話深刻，道得人情的竅竅便是。

禮貌與和平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常人也許意想不到。所謂『戰爭政治』，『強權政治』，我聞之已熟，但嘗窮思極慮，與此相對的和平政治是何物，百思而不可得。假定我們撇開強權政治，及惟靠法律制裁黨爭私鬪的觀念，剩下來不是空空如也嗎？儒家對於法家法治，深覺不滿。蓋法章之所許與禮教之所言，每差一級，人類美德最堪誇者每每超出法律義務以外。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僅免入獄而無廉恥之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教，禮俗）有恥且格』。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做法官折獄誰都會，乃鄙法律之意）。法律制裁也者，先假人心自私，爭逐名利，而後裁之以法。然法律抵不住鎗尾刀，到了國中或國際的強盜破壞法律，你怎麼辦呢？還不是又回到良心是非，憑那些非法律，非經濟的力量以爲抵抗。不，我們逃不了心理心術。國務卿赫爾稱：『循規蹈矩的交涉程序』，爲國際間協調的文明手續。但是那『循規蹈矩的程序』的精神何在？除了外交客套以外，豈不是以禮以讓的精神？文明人怎樣相處？文明國應怎樣相處？大家肯相推相讓嗎？所以禮讓的精神正與攘奪的精神相反，讓則不攘，攘則不讓。故禮讓實爲文明生活之大本，也是較

不野蠻的世界之唯一不二的法門。

我想卡沙勃郎卡會議之失敗，不僅在史達林不肯出席，雖然羅邱二氏遠涉重洋到非洲去，而不會議於華府或蒙特利歐（加拿大城）。卡沙勃郎卡之失敗，敗於失禮。據說，一九四三年中國應派何種工作，由他們討論過，決定過，交給中國去奉行。卡沙勃郎卡昭告天下，這戰爭要由英美二國包辦。英美出於無心，不知失禮，尤為可惜，因為和平會議上，他們的失禮，也要出於無心。這些看來不大像以禮讓相敬真誠合作達到世界和平的原則。民主之戰不能以獨裁方法贏來。

在相反方面，也是同樣道理。中國在外交上叩頭揖讓，正是他為同盟所誤解的原因。禮讓客氣的緘默，反被人誤認為弱國無能。美國運汽油爛鐵與日本，中國未敢抗議，被人誤解以為十分感激滿意。

據司得丁紐思（Stettinius 主持租賃案）報告，一九四三年正二兩月，租賃供應英國本部計美金四七〇、〇九八、〇〇〇元，供給俄國計美金二九三、三七〇、〇〇〇元，而供給中國計一、〇六七、〇〇〇元。這七百六十三與一之比例就是說，假如這貨物按日平分輪流分給這三國，中國須等二年一月又十三天才分到一天的物品。中國怎樣招來這種奇辱呢？叩頭叩頭又叩頭。善爭奪的女書記開口就要增薪，溫文爾雅的女書記不加薪也永遠不開口。

這由有禮的家庭出來的子弟與揮拳攘臂爭奪而始得的社會的不調整，就是中國戰爭六年以

來外交策道地失敗的原因。中國新入強國之列，就像大學一年級新生，選入學生會館（貴族子弟分居一室之 [fraternity]）伸出手來，見人招呼，逢人作揖。中國急須洗盡謙恭那一套，把誰揮拳一擊，就得這奇異會館同人的了解與敬重（按此語惟可向深懂西方社會者言之）。那些躊躇滿志的同盟國政治要到現在還在作夢，以為中國政府及人民對他們非常感激涕零，正像一條哈吧狗分到一塊淨骨頭，就舉頭斜望，仰慕主人，或者並且願意站在後腿扮個把戲叫人家取樂——此夢未完時候，應當有一兩個中國人告訴他們逆耳的實話。實話是，中國外貌非常客氣，心中卻是非常不滿某國政府之行動。中國老老實實對於同盟失望，且得一種印象，這些同盟完全自私自利，並不忠誠，而邱吉爾羅斯福兩人都未見了解亞洲問題的性質。不但此也，他們對於同盟國的作戰宗旨，正在將信將疑。

和平政治的理不過如下：文明人不打架，粗人非打架不可。社會上國際上打架，都是丟臉的事。文明人有時也動手，到了文明人動手，必是對方是個蠻貊，或是他所居的社會是蠻貊的社會，揖讓之術總不見效。孟子曰，人之所以別於畜生，有禮讓之心而已。

歐化篇第十一

此篇言歐洲爲衆禍之始世亂之源且探討歐洲化之內容可知世界歐化則世界必如歐洲連年戰亂永無已時

今日歐人的世界勢將瓦解，因其傳統破滅，道義蕩然，而此世界遂無所以與立乎天地之間。我們目觀國家思想，種族偏見，尙武主義（即相信武力強權爲社會之基礎），商業主義及機器之發展，各種潮流匯合衝擊，使這世界淪散崩潰，不可收拾。

因這些波瀾之勢力，及精神信仰之覆滅，人性觀念之物化，經濟人類觀（“the economic man”）起，精神人類觀（“the spiritual man”）滅，所以一切都在瓦解。什麼也不行，什麼都不足保障治安。國際聯盟也失敗。裁兵會議也失敗。白利安及凱洛格的非戰條約，曾經各國的總統皇帝鄭重簽字，也不見效。國際的條約，國際的盟誓，也都無效。馳騫財貨，角逐商場，攘奪物資之狂病依然。

是故歐洲破壞五大洲之和平。由於歐洲及歐洲之思潮與其帝國主義物質主義之榜樣，所以星加坡的女人須得喪命，緬甸的農村須得遭殃，而中國和高加索的農夫須得看見炸彈落在他們的田上。

但是歐洲自身本是一個屠場，現在正擬將亞非二洲也變爲屠場。歐洲還在想世界的人欠他一筆債。而世界的生活程度須要抬高與歐人一樣。我知道，歐洲還在想宰割這世界。你看看大

英帝國，大法帝國，荷蘭帝國，連葡萄牙也有個租界澳門在中國！謝天謝地，西班牙帝國早已崩潰，不然南美洲還有同樣的複雜問題。

今日亞非二洲還得做牛給歐洲人生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要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要訓養他們的自治能力。但他們何以喪失自由，自治之權，是誰剝奪？有誰敢說，印度受英國統治二百年，生活程度曾經提高，而不是降低？安琪兒爵士不敢否認，今日印度農民窮苦比七十年前更窮到底的事實，是由英人之剝削及摧殘本地工業。我書此時，耳際老是聞見在印度的英國吏曹揚揚得意說，『情勢絕有把握』。我看見一個帝國正在瓦解——卻不大甘心瓦解。但是帝國自身不瓦解，就會弄得同盟瓦解，和會瓦解，而使大家戰爭宗旨，一筆勾消，歸之徒然。

但是目前，所謂世界歐化，不僅是一個抽象理想而已。世界的民主領袖正將他們穢味彰聞教人爭奪的強權政治移到亞洲來。其必然結果，由一種計劃週詳的武力均勢，可讓亞洲今後三百年戰亂頻仍，互相屠殺，學到歐洲自己的好榜樣。歐洲者，世界之爛瘡也。其瘡毒傳播，流及五大洲。這烈禍何時才能終止呢？爲什麼歐洲必來管亞洲閒事？我們有何法可以對歐洲施行停船檢疫？換言之，有何法可以防禁這歐人強權政治的流傳？以下〔歧路篇十三〕我可以說明，如果歐洲不來干涉，亞洲之將來的問題十分簡單。參入英法荷蘭的帝國，亞洲問題之複雜就同歐洲自身一樣。

未發論之先，我得先把歐洲的馴羊除外，以與歐洲的虎狼分開。馴羊也者，挪威、瑞典、

丹麥、瑞士是也。這幾位都不管閒事，而自身社會保障法律最前進，文化教育水準最提高。荷蘭人、比利時人、英國人在本國時都很好。其國中風俗淳厚，所以你要令一位英國人復成君子，只消把他運到蘇彝士河以西。老實說，白種人也怪文雅的，只要把它肩上所負的『使命』拉下來。他甚至可以同你討論佩德 (Walter Pater) 的散文。

但是你要歐化世界，歐化什麼東西呢？維他命、衛生營養、保育兒童、看護產婦種種進步的知識，及婦女的襯裙內褲之改良。這些都不必着急。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國及非洲康戈的女人都會感激你們，稱頌歐洲文化無疑。但是你要歐化什麼東西呢？自然是歐化生活程度。也奇怪，並不說歐化道德。沒人敢倡說，東方或西方的道德程度須得提高。不，經濟時代的人所宣的聖道，不是『思想華麗，生活鄙樸』八個大字（十九世紀初葉詩人華姿華斯語），而是『生活華麗，思想鄙樸』——比如這種鄙頑樸陋思想，說貨物愈多，人類便愈樂，或是說實業時代的工人比手藝工人安樂。說提高生活程度的人的意思，清清楚楚是指洗衣較便利，洗碗掃地用電較輕快，也許還有一天四杯牛奶給霍屯督野人。是指較少用手足人力做事。是指有一架汽車，一禮拜看一回電影。清清楚楚是指這些。

所謂提高世界生活也者，乃要叫〔紐約〕東城區的人都搬到公園路去住。但是比方東城區的人不願意搬入公園路富宅，願意依然故我便如何？所失者何，關係多大？比如霍屯督野人不喜歡你的牛奶而特喜吃香蕉便如何？比方東方對於用人力手足做事的看法與你不同，而東方女人

以爲到溪畔搗衣一面同隣家談笑，比關在高樓大廈充滿水汽熱騰騰的地窖裏洗衣舒服便如何？比方東方人以爲在稻田赤足耕種，半膝污泥，或是兒子在前老父在後犁田倒很不錯便如何？也許他相信用手做事用腳走路於心身都有益。也許一個推小車的人住在一間茅屋而因此「生活程度」較低，不一定便如遊東方的旅客所設想，是過「豬羶」生活。也許他有他的禮俗文化懂得人情規矩。也許他相信搖划蕩船，而不喜歡坐輪船，坐輪船便覺得學西洋腐化。也許他主張老婆應當自己做布鞋，而不應穿城中富婦才買得起的高跟鞋。也許他主張女人應該給小孩喂奶，就是給人瞧也不妨。也許他相信喂奶給人看見，不一定如海司〔Will Hayes〕好萊塢的檢查處〕所定的條文，認爲邪穢不正，淫蕩無恥，因爲他心中對於女人奶奶的天經地義的作用還未走入邪道。（按西洋女人晚裝露奶戲台露奶皆高尚貞節，獨喂奶認爲無恥下流。留美半世，也難看得到一次西婦喂奶。蓋喂奶者，所謂「房事」一類東西，是闢起房門幹的。況喂奶則傷胸部之美，西婦不願生育大有理由在。）也許他悟到人身身的妙理，知道人身極善調劑環境，美衣美食慣了也就覺得平常，而勤苦生活也許比閒蕩生活快樂。也許「第七重天」〔電影名〕是巴黎亭子間，要拾黯淡的石級登上去。也許人生本有至理，街上賣報小孩的兒童時代生活，在身體上，心理上，精神上的快樂，勝過公園路富家子弟，由跟班詹姆士及司關查理一人一旁扶着教他學跑冰。換一句話，也許物質的程度不值得提高——如果同時要引起階級仇恨，集團主義趨勢，失去個人自由，及幾年一次須徵調十八歲青年入役死戰疆場。

說穿了，我相信歐洲人與亞洲人一樣的迷信。現代知識界最風行，衆人所公奉的迷信，便是科學定命論，說人根本是一隻動物，由物質環境掌管播弄改造，一點無可奈何。除了這定命論的最高神明以外，還有現代人所崇拜的偶像。凡所信非真，謂之迷信，凡崇奉過分謂之偶像。歐人的三位偶像，就是白薯，戶口與強權（‘the potato fetish, population fetish and power fetish’），因為這些委實爲現代人所崇拜。人類總是迷信的，你不讓他拜偶像，就得拜別的。蓋一人心中，不得不有了精神上的歸宿。一人什麼都不崇拜，其人就完了。就是無神論者，也得崇拜他小老婆的腳盤。

這三種偶像統制現代人求治的心理，而形成以下的信條。（一）人類生存專賴白薯，在玄學說來，人是一種覓食白薯的兩足動物，而人類文明乃此兩足動物因覓白薯而定去向的行動所形成的偉大歷史勢力〔經濟史觀〕。（二）白薯缺乏爲戰爭之原因，白薯充足乃和平的保障。白薯愈充實，世界愈文明，便可大書『財豐物阜，國泰民安。』（三）和平之道，首在求白薯與戶口之精確比例。（四）沒有強權武力的人須種白薯，而有強權武力的人可以運輸，飽食及以他種方法支配消耗別人所種的白薯。（五）依某條自然公例，有武力的人須令無武力的人種殖充足的白薯，否則人類就要餓死。所以白薯的資源必定自由採購的原則，且必有經濟計劃，也得有誰統治這世界。（六）有武力和無武力的人不會引起戰爭。種白薯的，或農業的一幫人，生性不求進步，不好侵伐；有武力的，或實業發達的一幫人，生性好攘奪，尙競爭，善侵伐。由是觀之，

種白薯的一部人，很乖巧可愛，有時高興可以擰他們的臉蛋兒，但可以置之不理。(七)但是戰爭可因有武力一幫人互相攘奪無武力的人所種的白薯分配不勻而起。(八)由此觀之，和平問題也者，僅是如何使有武力一幫人得平分白薯的資源者也。(九)只因有武力一幫人自己互相妒忌猜疑，而商業本性是好攘奪，尙競爭，善侵伐，所以解決之道，顯明在於維持一種極微妙極勻稱的均勢，叫兩方都不敢先放鎗，雖然也許某方要先放也屬可能。(十)惟力之爲物，動而非靜，故這均勢無法永遠維持，是故均勢須時時改造，陣綫須常變更。(十一)時刻防察新權力之起來而作新聯絡之術，謂之『政治』；背信棄盟，爾詐我虞，延至開槍第一聲之道，謂之『外交』；這均勢的總推翻謂之『戰爭』。(十二)這樣看來，似乎不大滿意，但也不想不出其他好法子。(十三)真正滿意的辦法，是教某一國或某些聯合的幾國養成充足兵力，可以在某種世界民主大同盟之中統霸其餘。其餘有武力的或種白薯的國，若不高興，看他有甚辦法？我們的兵又多，槍又好。(十四)管他媽的，我們只會說老實話。我們是『實際主義家』，不肯以『神話』欺騙民衆，而那些口談正誼公理的人，只是不合時務的『理想家』。

這便是耶穌降生以後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世界求治的國際思想之最高峯。這就是今日政治哲學之精華。這些信條嘗用於歐洲而引起幾百年的流血戰亂。但是我們相信用之於全世界，便可教天下太平。這是世界歐化的精義。

愚民篇第十二

此篇言民主基本信仰在於民並研究今日民主國官吏欺民之方術及真正民意與國策背道而馳之實情

書至此，便有人要發問：我是不是替今日的世界和近代文明繪一幅太陰沈黯淡的畫？是否忽略某方面，過於張揚某方面，專畫其窮形極相？答案當然是『是的』，但是我是在討論政治，而政治（西文 *Politics* 並指黨派傾軋）總是任何事物的醜態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的臀後。可是一個文化有其臀後，也有其光明的正面，也許我不過在踢人家的臀後——愚莫甚焉。

須知歐洲是一條牛，我不過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牛虻』。政府是一條聰明睿智的牛，明達的人，只須做一隻牛虻，刺釘大牛的屁股，功勞就不小了。因為老牛在青山綠茵上享受了一番，長得痴肥笨重，往往在危險的環境中茫然睡去。其筋肉日漸鬆弛，牛皮日漸頑厚。牛虻在四周嗡嗡低鳴，不予老牛安寧；老牛被牠叮了數口，感覺疼痛，不禁煩惱起來，或許豎起尾巴，橫掃一下，給那小東西知道些厲害。但是只要把智慧的老牛弄醒，目的達到，又何足惜？

不，我很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希望、理想、渴念、善性。這乃是我執筆著書的緣故。如果你有一個如鮮花般美麗的理想，而親眼看他被人摧殘，就不啻自己心中受創。千萬男女都感覺到那痛苦，甚或怨恨那下毒手的人。

因爲每一個戰爭都顯示人民的本色。敦扣爾克顯示了英國民衆的本色，史太林格勒顯示了俄國民衆的本色，巴潭一戰，顯示了美國民衆的本色，重慶顯示了中國民衆的本色。一個民族老百姓往往有若干特點永遠爲人忘却，只有在戰爭的烽火中方爲人重新覺察。這些老百姓與明爭暗鬪，心地不正的政客，和萎靡不振，賣弄花巧的文藝家，有霄壤之別。在一個鄉村醫生診所中所能看到人情之悲喜愛慕，克己犧牲，可歌可泣，以及生命之豐富深雋，豈是任何外交部內所能看到的？而人生就是這些悲喜愛慕，克己犧牲，可歌可泣之事所綴織而成。生命之源流得以繼續不息，亦惟是爲賴。

每在電影上看見俄國農婦協助軍隊捍衛國家，英國防空人員和女警看護執行職務，美國女人替軍隊趕製皮鞋，每見一般人民，志願軍，看護，工人，汽車夫，鋼鐵工人，機械匠，在機輪前，船塢中，俱樂部，工廠，渡輪內工作，便知道此乃人民意志的自然表現，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使我尊敬感動。他們不僅口說爲了建設較公正完美之新世界新社會而作戰，並且在心目中深信不疑。他們不僅需要新世界新社會，而且熱望其早臨，爲之犧牲精力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美國如此，在英國如此，在中國蘇聯也如此。民衆要和平，正義的和平，並希望大家和好。人民之間，不無友善之意。任何人民，尤其是不學無知的鄉民，都有若干經久的寶貴品德，能識別是非，明瞭責任。這次戰爭發現了中國的老百姓，蘇聯的鄉民，英國的平民，以及

美國的民衆，真正的民衆。他們不管你什麼帝國主義，祇囑咐望天下之安治，人間之太平。天下百姓都要太平。爲什麼不讓他們享太平？

所以我們碰到今日的民主政治的悶啞謎了。如果人民的胸懷既然不錯，祈望和平，而同時又在民主國，他們的願望爲什麼不能實現？有人在欺騙他們嗎？欺騙者是誰？他用了什麼方法，甚麼手腕，來欺騙今日民主社會中的人民？簡括說來，近來有一種傾向，把政府由人民手中交給少數吏曹和『專家』手中，他們說他們知道『全盤事實』，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真況，所以不必過問。鑒於現代問題之複雜，這不足爲怪，但是這也就是說我們對老百姓日漸失去信仰——一個不健全，不民主化的傾向。

所以我一定要替老百姓說話，今日世界上的平民，見了一般專家，至少有些畏懼，尤其是那些知道人民所不知道的『全盤事實』的吏曹專家。這是近世民主政治的一個怪現象；只須大叫一聲，『我知道全盤事實』，便能嚇倒老百姓，叫他們自封其口，不敢隨便說話。這些事實，雖與客觀的科學不相干，却借頂科學之名。官場吏曹自稱通悉『全盤事實』，便把科學的威嚴加在自己頭上，並在其頭上發一道靈光。除非我們把歷史中的『事實』仔細分析一下，分別清楚自然科學事實和社會事實的不同，近世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要永遠聽政治經濟專家所欺愚播弄，那末世事便不堪過問了。老百姓是建議某件事該如何辦理的人，專家是告訴你事情無法辦理的人。由此推論，和平專家便是告訴你天下無和平可言的人。所以若把和平問題交給他

們處理，世界便非永遠斷殺下去不可。

很明顯的，自然事實同社會事實或政治事實，性質迥異。氧與炭合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是無可置疑的自然事實。可是社會事實則不然。譬如說，法庭審判案子。姑謂一切有關的證據，已盡極人力收集在案，問題是犯人有罪無罪。前後經過已經審問，雙方辯論完畢，法官宣讀案情摘要，最後十二個陪審官圍坐討論，判決被告或則有罪，或則無罪。然此判決結果，不能與炭與氧混合結果相提並論。審判案件時，或許七個陪審官認為被告有罪，五個認為被告無罪，而一項化學物，則不能召集若干科學家於一室投票判定其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在嚴格的科學立場說來，被告之罪，不過是近情之猜度或假設而已，或則合理，或則無稽，不得而知。所以不同者，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某物或某現象，可以暫時存疑不論，而在人事上，一事却非於某月某日討一個取決不可。

再者，在人類關係中，某樁單獨的事實可用科學方法證實肯定，但是一樁社會事實始終不過是一個推論，如審判官之判決『有罪』或『無罪』。當然，一人如在紐約時報館附近行兇，而當場被捕，可說是一樁事實，甚至可說是科學事實。不幸得很，外交家與專家自稱在握的『事實』，並非此類事實，而實在是對複雜錯綜之社會局勢的臆測懸斷。這種局勢，都有許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加各種色彩，作各種不同的解釋。

可是我們的頭腦已弄昏了，我們不敢自信。誰敢非議專家處理印度或北菲問題的方法？甘

地是一個妥協主義者，抑或是一個聖哲？北菲的人民擁護達爾朗呢，還是擁護戴高樂？我們老百姓怎能知道呢？緘口不言，豈不是智慧的表示？不，人民的感覺總不會錯，因為人民最憑是非原則，而天下簡單明晰者，祇有原則。此外，歷史中之事實，決無人全盤領悟。試聽麥弗氏（Robert Murphy）之話，再看北菲通信記者之話，便能知道擁護達爾朗之『人民』，是有錢的皇族難民，抑或是真正的法國人民，無法斷定。政治家能發表日記回憶，新聞家能記錄訪問會談，但是你儘管放心，所謂社會事實——譬如說，北菲民情之向背，利用良好領袖發揮此情緒之方法，及兩種不同政策在法國國內所產生之心理反響——乃是憑斷，偏見，和雜零消息的混合物。一般外交家察看歷史事實，正如凡人肉眼仰視月球。一個人罰咒說月亮中有一只兔子，一個人說有一只猴子，再有一個人說有一只青蛙。外交家所知道的『全盤』事實，就是這種『事實』。事實是，那幾個坐井觀天的傢伙，爭論着月球中有兔子，有猴子，有青蛙，對於真相的糊塗，同我們不分伯仲，而因為仰首凝視太久的緣故，視線或許較我們更模糊。他們要說服你，對你說：『我告訴你，其中有一只兔子，』你固然懷疑不信，但也應該給他面子，在暗中對你自己說，『他們的眼睛已看花了』。你應該保持自己的正悟，知道月亮中有亮光，有幽影。達爾朗，畢魯東，維希官吏都是幽影，法國的人民乃是亮光。明白是非，鑒識正反，你便不會錯了。你知道你是老百姓的一份子，而老百姓總不會錯，儘可放心。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無需四大自由，一個自由便夠了——擺脫欺誑的自由。今日的大欺誑，

就是說只要通悉事實，便可丟開主義原則。但請記住一件事，專家們知道圖表事實，然而老百姓都能識別是非。這個信心不可動搖，因為一旦動搖，民主政治便會墮入專家手中，一經墮入專家手中，便壽終正寢。上帝的發言人是老百姓，獨此一家，別無分出。

個人覺得上帝行事，總由老百姓代表。歸根結底，老百姓有一種神聖的權利。我的靈感並不一定源於書經這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源於直覺的觀察以及研究歷史興亡之跡的結果。老百姓怨望，便是上帝怨望。老百姓動怒，便是上帝動怒。老百姓要暴動，發明斷頭台（法國革命），便是上帝認為暴動發明斷頭台的時機已到。老百姓猶豫未決，便是上帝猶豫未決。老百姓回家賣刀買牛，安居樂業，上帝便得意微笑。

所以如果人民排斥某項政策，其實是上帝在排斥。大眾反抗希特勒的霸道，其實是上帝在反抗。祇要記得，上帝借人民說話行事，魔鬼借專家說話行事，報告他們『全盤事實』，誰敢說美國官吏所知道關於北非的『事實』，不是魔鬼使用妖術，偷放在衣櫃內嚇人？我們都聽慣訓教禮貌的寓言：在商店內，顧客的話不可非議，在帝制國家，國王的話不可非議，在民主國家，外交部的話不可非議。原來老百姓相信光明行事，重視主義原則，而外交家在黑夜中偷偷摸摸，詭異莫測，有如貓頭鷹一般，在黑暗中最能顯弄本事。不論何地，人民與外交家的爭鬪，必是上帝與魔鬼，光明與黑暗之爭鬪。

冤殺西班牙政府軍，把他們捉到集中營去的，並不是英法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組織不

干涉委員會，縱任希墨兩魔公開動手干涉（西班牙）的，並不是英美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真正的『事實』，乃是英國的克萊夫登派和法國賴伐爾輩畏惡共產主義之心，遠深於畏惡希特勒之心。停止供給西班牙共和軍汽油的，並不是美國的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放任日本自由侵略滿洲，聽任墨索里尼自由侵略阿比西尼亞的，並不是英國人民，而是國聯的吏曹。遲遲不肯發表戰後人民自由之意義，而說『打了勝仗再說』的，並不是老百姓，而是他們的政府。

我決難相信，天下頑夫庸人都生在過去時代，而當代所見，都是聖明。歷史事蹟屢證政府措置之荒謬愚笨，人民意見之正確可靠，而如果以往的政府能犯錯致亂，今日的政府也能犯錯致亂。所以就做一個牛虻罷，把政府刺醒！

但是論世故人情，我們只能刺釘瞑目作古的政治家如張伯倫輩，卻不能用同樣方式對付今日活在的大人物。歲月消逝，孽禍已成陳跡，人民之痛苦悲哀已變成回憶後，指責抨擊，乃是態度鎮靜，感慨系之的歷史家的特權。然而今日目睹政治家走上歧路，重蹈覆轍，而昭告世人當前危機，熱血沸騰的愛國者必動怒而大興問罪之師。

雖然如此，在民主國內，總還有一線之望，因為在民主國內，做領袖者，祇須踏步走，隨人民之意志轉動。一個偉大的領袖，總是踏步走，向右一望，向左一瞧，四面機敏張顧。如果右邊把他推得夠重，他便偏到左面，左面的人把他推得夠重，他便斜倚右面。祇有這樣，才能領導人民。如果他老是順着我們的意思轉動，我們便稱他爲『大人物』。我喜愛民主政治，就因

爲我喜歡推拉我們的領袖；我厭惡暴君，因爲我不歡喜被人推拉。民主政治還有希望，因爲此次如果我們老百姓用力推他一下，或能有一個偉大的民主領袖應時而出，亦未可知。將來或許有一本白皮書發表，像老年健忘的演員埋怨提示者多嘴一樣，它會在好戲收場後對人民說：『你們這些多管閒事的傻瓜！我在幹些什麼，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人民會像後台的提示者那樣對他說：『不錯。好萊兄，你總是頂出色的。』

這就是我著本書的原因——做一些提示工作，學牛虻刺人家一下，把我們的領袖向他們的命運和青史上的牌位推去。等到勝利到手，他們會站在戲台上向我們得意微笑，我們會在台下拍手喝采，他們會揮帽致意。但是在喝他們采的時候，我們實在是喝自己的采；我們覺得他們順看我們的意思進退，心中自然高興。民主政治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那便是真正爲戰爭出力而取得勝利者，乃是我們人民——風頭可以讓才華蓋世的大人物出。

除了將一國政治交出給一個不出面的，無名無姓，享受特別權利的政治團體一弊病外，尚有一個完全政治性質的巧術，即使在一國民主國內，亦可以用來做違背民意躲避民意的事。在最新進的民主國家——美國——我注意到民意和國策的接觸，發覺少數一羣人，有的聞名全國，有的默默無名，竟能對人民隨便敷衍哄騙，丟開外交政策不談，甚或採用與民情完全背道而馳的外交政策，真是有趣。即使言論絕對自由，要大衆找出政府在幹什麼事，仍費時日，結果便是政府每落在民意後頭，或則六月，或則一年；如果手段高明，方法靈敏，這前後相差可

延長至數年。

國策與民意相差每趕不上，不僅是自然的，且已成爲今日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特色，所以我們不妨舉一個實例研究一下。有人覺得奇怪，美國人民援華之熱情，意能被人如此巧妙地攔起六年不理。祇要看其中方法，我們便會澈悟。美國人民要知道羅斯福在幹些什麼，不在幹些什麼，總得費上一年功夫，羅斯福總統要知道人民不能容忍什麼局勢，也得花上一年功夫。此處須說明，不佞客居美國，遵守客禮，無權批評他國政府的內政國策，但我相信，凡戰時同盟國的國民，都有責任與義務去批評同盟政府處理共同的戰爭的辦法，尤其是影響及其本國的事的辦法。我更覺得，這種的互相批評，不僅可行，而且斷然有益，比虛僞的客套好。我歡迎同盟國人士批評我國政府有關盟國作戰之措置，本此意義，我才敢批評盟國政府對於直接影響及我國抗戰事項之措置。老實說，如有盟國人士指出我國政府某項措置有損對日作戰力量，因而在勝利來臨之前得以減少萬千同胞生命的犧牲，我真要感激不盡了。我相信國際間真正的諒解的唯一基礎，乃是坦白誠摯地交換意見。

接濟日本鐵片汽油，用以轟炸中國婦孺，經過四年後，人民醒悟，輿論譁然，不得不用些腦筋了。於是發明一個『執照』辦法。大眾以爲禁止接濟侵略國之方法已經實施，便不出聲了。足足一年後，人民才恍然大悟，原來日本人請求執照，國務院有求必應，結果連往日本的汽油，非但未見減少，反而增加了三倍。人民不敢說話，因爲國務院『知道全盤事實』，祕而

不宜而已。後來事實揭穿，就停止接濟日本了。

後來滇緬路又聽他封閉。人民要繼續供應中國作戰物資，羅斯福總統乃說美國決計尋找替代滇緬路的工具。人民以爲政府已在採用，空運接濟方法至少已在計劃中，乃不出聲了，政府的宣傳說空運一旦準備完畢，可以及得上滇緬路的運輸量。一九四三年一月，羅總統爲了要安慰人民起見，聲言今日空運接濟之噸量，已與滇緬路不分上下。這句話有些像勞氏美容霜的廣告語：『她已訂婚，她搽用勞氏美容霜，』沒有一個人敢揭露空運輸入中國的噸量；可是我知道，昆明許多國人，印度許多通訊記者也知道。人民直到一二個月後，方明白羅總統的話是什麼一回事。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現在政府已承認局勢太不像話，非想辦法不可了。如果一架飛機能載一雙拖鞋，十架飛機便能載十雙，可是政府宣傳恰巧反過來了。羅總統以及其他一般人完全推翻了一年前他們自己的話。現在我們聽說喜馬拉雅山太高，每架飛機都得攜帶來回路程的汽油，風雨時至，困難甚多，只有陸路方能擔任此項任務。運輸機當然會多添幾架，藉以平息民意，並且可以說一聲，我們空運的貨物，『較已有詳細報告之最後一月增加』。但是我們必須等滇緬路重開。

大眾以爲反攻緬甸之計劃早已擬定，所以又沉默下去，何況魏菲爾將軍又單獨出兵阿恰布，把民衆要求動兵的呼聲壓住。現在政府與民意相差又尾追不及了，一年之後（本書著於一九四三年春）大眾才能發覺，在滇緬路斷絕足足一年後，盟方原來並無採取聯合策略，反攻緬

甸的計劃。大家都知道非聯合攻勢不足以成大事，反攻緬甸，非借重英國海軍出兵孟加拉灣不可。羅斯福總統說如果上帝開恩，我們可以馬上接濟中國。人民那知道，而羅斯福並未解釋，上帝姓邱名吉爾。總要等上一年，民衆才會覺察。

不論怎樣，美國人民對我國雖然熱情湧溢，愛護備至，美政府的政策行動，給與人一種印象，對於珍珠港事變前後的中國六年抗戰，不夠熱忱，有時甚至漠不相關。卡薩布蘭卡會議，仍以同樣之冷漠態度，判決中國再受四年苦刑。中國首先出戰法西斯國，單獨抵抗六年，對日須作戰十年，在此後四年中將受到更不可忍之磨難，通貨膨脹，營養不足，遭受敵人自東面封鎖，友邦在西南封鎖——這些事實，鑽不進西方民主政府的頭腦。但是，我在一九四〇年已向國內同胞說過，我們必須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分開評判，正如我們必須把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分開評判。

此處更須說明，那種對中國接濟敷衍拖延的方法，如果應用於日本，必可同樣成功，那麼日本今日用以對美國作戰的汽油，會減少幾千萬加倫，頭等廢鐵會減少七百萬噸。反之，供應中國之踴躍及速度，如祇及美國國務院供應日本汽油廢鐵之踴躍及速度之一半，而供應中國之機構，其工作如自一九三九年來即與供應日本之機構同樣爽快，中國今日的軍力，或許早已能把日軍逐至海內，不用犧牲美國男兒的性命了。

我要聲明，我並不是一個天生歡喜怪張怨李的人；人家援助我們，我未嘗不感激萬分，中

國抗戰初年，蘇聯接濟中國最爲踴躍，迅速，慷慨，德國接濟中國，亦稱踴躍，迅速，慷慨。該做的，都做得頭頭是道，特別是德國的接濟方式，完全是德國典型，什麼零件瑣碎，都準備得完妥無遺，所附零件軍火油類，足夠一年之用，圖樣說明，裝配專家，應有盡有。反之，美國 P-40 給與中國，却不配置無線電，祇好由一家中國公司另辦承裝。而如果你知道中國當局如何尋找一個裝配專家到印度去裝合一架飛機之困難，你真要流淚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後，中國沒有美國的許可，連一根頭髮針都不能向華盛頓借取，什麼東西的優先權都歸英國。

在作戰期間，另外有一個人造的國策與民意的相差。照我們的領袖們說來，除了東方日出，什麼都是『軍事秘密』。深長的走廊旁有森嚴的房間，裏面進行着鬼鬼祟祟，告不得人的事。大人們端莊沈默地居於其內，喃語談話。外交政策是像一個嬌弱多病的嬰孩一般，祇能用輕微的聲音談論它，若爲大眾稍聞風聲，必定夭折。可憐的孩子，緊裹於不適之襁褓內，四週空氣悶熱窒息。他的父親乃是一個手戴白套，足登革履，額流汗珠的外交家。哦，外交家父親，把孩子交人民，他的母親吧。拉起百頁窗，讓她看得清楚些。或許在黑黝黝的襁褓內，外交政策和軍事秘密所孕育出來的東西，乃是一頭吱吱不休的小老鼠或金花鼠！

威爾遜說得不錯：天下不應該有秘密外交。然而威爾遜錯了：天下不會有公開的外交。讓我們察看一下『事實』，好知道外交家如何在黑暗中不借『愚民』之幫助孕育外交政策。

且看外交家一日的日程。他安居在大樓頂層，不受人民之打擾，坐在一度屬於路易拿破崙姪子之大硬木高背椅上。室內一邊是一張西班牙阿拉釐大家遺下的光長大桌。四週垂掛的不僅是厚簾，且還是重重厚簾。空氣肅穆，祇聞祕書室傳來滴答之聲。與外界完全隔絕，但是未必盡然，室內緊張威武之空氣仍濃。一所特別建造的小木門內有一具無線電話，備他隨時同海外通話。

是這樣的：早晨九時半他大駕蒞臨。二十年前必具風姿的女祕書，一望便知信實可靠，封口如瓶；她躡足入內，抑低的聲音道：『巴西C君同大人有約，已在等候。』『請他到C室稍候，』外交家說。『主任祕書在那兒同教會會督商論梵蒂岡的來信』。『那麼請他到B室，』外交家說。『B室也有人。陸軍武官同索姆挪弗里的約翰上尉在密談』。『引他到A室』。那上了年紀的女祕書豎起眉毛，鉛筆放在口唇前，說：『大人真的要同他在A室談話？那間房坐東背西，晨光直射而入，祇有低級速記員在那裏見客，很不方便。』當天的第一大問題產生了，但是時間尚早，他不要找麻煩，便發下一道命令：『請他這裏來！』

女祕書躡足而出，巴西C君躡足而入。你能聽見鋼針落地的聲音，外交家聽見他自己的硬襯衫隨着呼吸與內衣磨擦而發出索索細聲。他們的談話以『天氣很好，是不是？』開始，結尾是：『啊，有趣，多有趣！』

第二第三次會客，結尾都是聲音更低的『有趣！』這個世界真是有趣。瑞典京城來一個長

途電話，把它弄得更有趣。現在是絕對驚人了，他搖長途電話到安哥拉。可不得了。他生平從沒有在一天之內得到這麼許多秘訊密息。他記起在那兒看到的一句中國古語：『秀才不出戶，能知天下事，』深深領會其中意義。他確信他已知道全盤事實——誠然，他知道得太多了。如何處理這些事實，乃是問題。

下午五時，他從荷京接到一個密電，秘書剛替他譯出。正在喃語：『多有趣！』他突被女秘書提醒，五點一刻須出席記者招待會，不禁蹙額。他該說些什麼呢？這真使他焦急。他不可洩漏秘密。『你不能對他們說有喉嚨痛嗎？』他正在問教於女秘書了。『那不行。哦，你這個大人，你知道該說些什麼？』桃樂賽愛慕地說。『我知道的事實太多了，頭腦有些糊塗了——不是，有些昏脹。』他仍不知所從。桃樂賽望着他光亮的頭髮說：『你頭腦的内部，似乎不及外部的整齊……大人，放些勇氣出來，應付那些傢伙。你也是老手了，說幾句不着邊際的漂亮話，總不礙事。有什麼難答的話，可以推說戰事秘密……』說到最後一字她的聲音也高些了。

懷了這軍事秘密當武器，他出去作戰了。舌戰羣雄，他決不會敗北。到了緊張關頭，他便竭聲急叫：『我知道全盤事實』。對方便啞口無言了。外交家知道全盤事實，報界却不知道，所以人民覺得在這場實力不均的角力中敗北了。外交家不能把事實宣告世人，只能在四年後發表白皮書，那時候報紙記者可以隨意抨擊……這樣日復一日的下去，心中總是在想：『啊！多

麼有趣！』

多年來便有如此多麼有趣事實。一九三一年東北事件發生，外交家知道全盤事實。西班牙內戰，他也知道全盤事實。阿比西尼亞被侵，他也知道全盤事實。希特勒進兵魯爾區，他也知道全盤事實。慕尼黑會議，他也知道全盤事實。潘奈號被炸，海南島被侵，日軍進犯安南，計劃襲擊珍珠港，他也知道全盤事實。天啊，沒有人懷疑你的事實。問題是，外交家知道了這些事實以後作何措置呢？

但是人民蒙在鼓裏，事情却一一接踵而至，外交家缺少老百姓所有的大義原則，所以每遇一件新事實，一樁新事情，就愈無法處理。我們且只管事實，莫談主義——打勝了仗再說。但是北非之戰，產生了有趣的問題，應付却缺乏根本原則。蘇軍自斯大林格勒逐退德軍，這是一個新問題。蘇軍收復庫爾斯克及卡爾科夫，蘇聯強大的黑影，愈來愈大了。蘇軍收復羅斯托夫及塞夫。問題更緊迫了。蘇軍會在邊陲停止作戰嗎？那還了得？蘇軍會直撲柏林嗎？更不得了！波蘭流亡政府同薛考雪基關係破裂。多麼有趣的事！捷克當局意見紛紛。又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史太林發表每日公告——這是一件事實，可是不太有趣，因為大家都已知道。巴本到土京，多麼有趣。史太林催促波蘭游擊隊開始出動，倫敦的流亡政府却命令游擊隊不必出動，以守實力，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小聲些，小聲些……於是事實留落在千變萬化的前進時勢的背後，外交家留落在事實的背後，民衆又留落在外交家背後，比時事總要遲個一年六月，而我們

的領袖仍舊說：『打了勝仗再說！且只管事實！』

事實總是複雜的，是非原則總是簡單的，若無是非原則，我們必爲事實所困住，直到盟國代表坐下和平會議的長桌時爲止。事實實不可明，我們所能明知確定者，乃是原則主義。這道理足以解釋沒有原則而行事的人，因何必墜入五里霧中。地心吸力之原則，解釋了天空星日之行動，相愛的原則，解釋了宇宙萬物之生長；而祇有誠心正義的原則，才能解決人間的政治問題。這時代需要道德上的領袖，以原則主義爲柱樑。這時代需要一個頭腦如林肯那般清純嚴正的人。可是我們都忙於砌磚起牆，建造二三層樓，情願把屋基置之不顧，回頭再說。但是看見昨日耗費多少精力堆起的牆，今日已傾斜欲倒，我們又詫異起來。

所以蘇聯的問題，把我們嚇倒了。波蘭的問題，把我們嚇倒了。印度和香港的問題，把我們嚇倒了。最後，應用大西洋憲章的方法，把我們嚇倒了。我們的意思是先打勝仗，再談和平。但是時間不肯等候，和平不肯等候。時間前進不等候人，民主國的領袖也不能例外。我們的外交家是一頭毛薄的小羊，我們祇能祈求上帝稍殺風勢。

歧路篇第十二

此篇言「亞洲之將來」之兩種看法一爲正義和平的看法一爲強權政治的看法以揭露亞洲政策之真相

事與願違，上帝不肯稍殺風勢。可憐的羊，趕快長你的毛罷。

在亞洲，我祇見饑饉，混亂，流血。我知道我們在亞洲的政策，在戰爭未結束之前，必更趨紊亂而終致產生悲劇。今日的同盟作戰會議中，有一點大家都茫茫無睹，那便是亞洲。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安諾德將軍在馬特遜公園演說中所顯出的對亞洲事件之記憶衰弱，亦將成爲盟國此後對亞洲政策的特徵。正像我們現在拒絕考慮戰後問題一樣，我們也拒絕討論亞洲的問題，到戰爭結束後再說。安諾德將軍說：「六星期前，在卡薩布蘭卡：我向遠東出發。動身前羅斯福總統對我簡括地說：「中國的口岸，已封鎖了，滇緬路又叫日軍佔住。我們怎樣才能增加空軍？怎樣建造一個較大的作戰力？」我原以爲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布蘭卡會議前一年，便知道中國的口岸已被敵人封鎖。這種有心，實在等於無心。我原以爲凡花過一分鐘研究中國對日作戰戰略的人，都明白這一點。遠東是地圖上最明顯的一角，怎會忘記？甚至對日作戰，爲什麼到現在尙無計劃把中國當做戰友的一份子，甚至尙無草擬計劃的本意？

安諾德將軍在同一演詞中，又說得十分明晰，空運難於增加，因若增強中印線空防，勢必削減其他戰區的實力。爲了平定民氣計，將多送幾架飛機到中國，但是基本策略，不能變更。

他們將對我們說，一切有待於滇緬路重開，但是抱歉得很，此刻不能調動英國海軍載運軍隊到仰光去登陸。困難的事現在幹，不可能的事且慢一會兒。接濟中國乃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們又敬仰中國。

但是颯風將起，羅斯福總統宣布擬用中國為對日反攻基地——唯一合理的基地；但是從宣布意思到實際擊割，中間又要相差數年。事情變幻莫測，複雜之局面，可能更趨複雜，但是我們却在說遠東什麼事都不成問題，打倒了希特勒再說。世人現在已經覺悟滇緬路陷敵，就等於隔絕中國，並已承認敦不早讓中國軍隊入緬甸，實是大錯。但是不到加爾各答或昆明失陷的這步田地，世人不會覺察繼續這因循猶豫，敷衍塞責的政策之愚笨。須知羅斯福總統宣布擬用中國作侵日基地的時候，日本亦在諦聽。其次，即使他人不諳遠東地圖，日本却知道得很周詳。

同時，盟國在亞洲聯合行動的機構何在？轟炸東京前，中國政府請求美方延遲轟炸一月，俾能鞏固金華機場外圍之陣地，但是杜立特將軍不顧中國之請求而往炸日本，亞洲最大的空軍基地，連帶地下鋼骨水泥的機庫，遂此作原可避免的犧牲。魏菲爾將軍不同重慶取得聯絡，便獨自出兵阿恰布。聯合行動的機構何在？中國在一九四三年之任務，為什麼要在沒有中國代表出席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中決定？我們不得不尋根問由，探一個清楚。

中國人民現在看明白了，封鎖中國的接濟路線，原由是政治的而非軍事的。中國人民如一

度有什麼懷疑，都叫邱吉爾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演詞說得煙消雲散了。局勢已趨明朗，英國是國力日強，安若泰山的了。三月十七日，發表演說的前四天，英相強調聲明：『處理英國屬地之政治問題』——包括印度，緬甸，馬來亞，星島，香港——『仍係英國一人之責任』。現在他說得更清楚，亞洲必須當做一個殖民地系統看待。擊敗希特勒，乃是『戰爭的光榮峯頂』，過後乃開始『新任務』——對日作戰，收復亞洲，到那時候，只有到那時候——或許是一九四五年之後，中國已被封鎖了多年——方才能開始『拯救中國』，把中國拉出由於倫敦政府故意按照計劃任憑滇緬路二次封鎖而產生的水深火熱的局面。『拯救出來的中國』不能成爲『勝利的領導國』。誠然，戰爭結束後，亞洲不可有『領導』或『勝利』的大國，這樣白色帝國主義才能安棲樂窩。一個『亞洲會議』必將成立，有『我們的荷屬盟友』參加，也可能有法國盟友。我們可以放膽相信，在此『亞洲會議』中，爲了維持『法律，正義，人道』，擁有最多亞洲屬地的統治者，必有最大的發言權。（上所引爲邱首相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演詞，即兩次連稱戰後有『三大列強』之名篇也。）

由此看來，什麼都清楚了。一九三九年以後的封鎖中國可以了解。封閉滇緬路，削弱中國實力，可以了解。不容中國建立自己的空軍，也可以完全了解。站在帝國主義的戰略立場看來，真是精彩絕倫，令人拍案稱妙。論手腕，論氣魄，論眼光，論天才，維多利亞女皇也沒有更出色的首相，更忠心的老僕。

爲什麼這樣畏懼中國，亞洲呢？亞洲把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嚇壞了。論正義原則，她不會威脅人家，但是論強權政治原則，她確實把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嚇壞了。據不佞看來，如果採取正義原則，那麼戰後和平會議席上的亞洲問題，實在簡單得令人難信。反之，如果採用強權政治原則，其複雜的程度，就不亞於中歐問題了，甚至可使中國在同盟國作戰會議中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夥伴。若處置不得其法，亞洲政治之複雜，非但可能類似一場夢魘，簡直真的可以轉爲夢魘。

據說畏懼乃是人類最大原動力之一。閨婦怕老鼠，外交家怕小鳥，而我怕外交家。所以外交家爲什麼不能怕一個興隆昌盛的亞洲呢？譬如說，耶魯大學的巴哥拉·約翰·史班克孟教授十分怕中國統一強盛，及怕歐洲各國和好團結，我十分怕尼哥拉·約翰·史班克孟教授。

試一遠眺亞洲將來，我們可看見的是什麼？日本是搗亂乾坤的罪魁，但是戰爭結束後，日本的威脅便可消除。那麼我們在亞洲有什麼問題要顧慮？有中國——一個愛好和平的大國，飽受人道，民主，和平等主義的薰陶，與美國的民族性最近。還有印度，決心從事於自由運動，非他人所應干涉，其政黨組織之嚴密，範圍之廣遍，不亞於中國國民黨，領袖之熱心愛國，賢明精幹，高瞻遠矚，足爲楷模，及民主性格，不亞於我們的蔣主席。中國與印度毗隣四千年，未嘗開戰過一次。

種族間的仇恨，猜疑，戰爭，在亞洲不見得有如歐洲所見的國家間的舊恨深仇那種的背

景。而大致說來，亞洲的人民，又沒有歐洲一半那麼好戰。蘇聯不會打中國，中國也不會打蘇聯。在中美二國人民看來，亞洲之將來，甚爲簡單。美國不致有問題，因爲美國肯讓菲律賓獨立。心中若無貪念，人家的珠寶便不會使你輾轉不寐。諸基督教國家如肯讓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泰國，安南，緬甸，印度各走其路，問題莫不可迎刃而解。她們都希望獨立自治，不會擾亂他人秩序。如果你不讓他們做主子而要她們做奴才，就會生出麻煩。你一旦覬覦人家的土地，錫礦，橡皮，必受良心驅使，而出兵防衛，以期避免內亂戰鬪流血，而你的大小麻煩，也便肇端。但是流誰的血？爪哇人，印度人，緬甸人，可會威脅英美？流血豈不是因爲西洋人要爭取他們的錫，橡皮？

在這等簡單的立場上看來，當然可以即刻拿中國當做平等的戰友，共同籌劃大計，共同努力作戰，共同做夢，夢想一個戰後較好的世界。美國人要打日本人，中國人也要打日本人。美國沒有香港荷屬印度來操她的心，中國也不爲安南，暹羅，緬甸費心思。中國只要收復失地，並不要人家的領土，美國也不要人家的領土，連我的幼年故里鼓浪嶼都不要。所以何不攜手一致，儘快打敗日軍，不必計較怕把日軍打得太快，或把東條先希特勒打敗？有些人主張轟炸東京皇宮，有些人反對。這都是細枝小節，無足重輕，不會使我們臨上床前先俯身向床底窺望一下。

這是一個簡單的看法，依這看法，在亞洲樹立人間正義和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其可能的

程度，決不亞於西葡二帝國瓦解後南美的情形。原來和平在亞洲可能，在南美北美可能，在非洲也可能。

和平只有在歐洲才不可能。亞洲如抄襲歐洲抗衡勢力的式樣，那便無法和平了。世界五大洲中，祇有歐洲尙未學會如何相安無事。歐洲乃是世界傳染病的中心，帝國主義乃是傳染疾病的毒菌，餘毒所至，把整個世界都纏得通身是病，病！

現在且看一看依照若干盟國領袖看法所見的一篇糊塗賬。你如果知道其中全盤真況，一定要食不能下咽，睡難合眼。一人如果必須在每次臨睡前向床底下窺望一下，生活還有什麼意味？但是有些人的頭腦組織特別。外交家牀底下陪伏的刺客，不止一個，可能有三四個。有大妖魔作祟，大妖魔又生小妖魔。如果我們相信外交家的話，他們將在我們左右攪纏不休，直到我們的頭腦也進化到外交家的田地爲止。

前面說過，事實總複雜難明，唯是非原則有定。現在且放棄是非，專談「事實」。

第一個感覺，是極度的彷徨不安，因爲有一件事，我們不能確定。蘇聯心懷何意？中國心懷何意？在外交家的立場上看來，我們應該預防不測。中國如果走上自立強盛之道，豈不給印度下一個壞榜樣？你敢斷言中國沒有帝國野心？日本武力消滅，中國建立了空軍以後，你便不

能擔保了。所以到了和平時期，連雛形的空軍都不能讓她建立。或許不讓日本完全潰敗，也是一計。白色權力應該在亞洲採取什麼措置，不讓白種人被逐出亞洲大陸？其次，如果我們在無意中把日本先希特勒而擊敗，那時候歐洲問題仍未解決，可能有什麼事發生？美國的勢力可不要在亞洲稱雄，正像目前在北非稱雄一樣？我們同希特勒算賬的時候，荷屬東印度和緬甸豈不能像脫籠鳥般自由行動，甚至明目張膽起來？日軍撤退以後，星加坡與香港將怎樣？……

殖民地的問題，煞是複雜。英國難道一定在此刻就得決定應否守住印度，緬甸，馬來亞，香港？答案不論是否，皆極令人難堪。如果英國守住屬地，怎能叫荷蘭放棄她的屬地？如果我們把屬地問題遷延到戰後再談，對這次自由之戰中的民氣，豈不較為有益，因為仗打完了，便無需乎民氣。

在事實上，中英二國的意見已漸趨不合。邱吉爾說得特別清楚肯定，他並不在『低首下心』，而『處理英國殖民地』，乃英國『單獨之責任』。這就是叫美國莫管閑事。反之，蔣主席也說得同樣的清楚肯定，中國並不要人家的領土，而要收回全部失地。這二個政策，必在香港問題上發生衝突。中國願意為九龍租界——像上海天津租界同一性質的租借地——同英方開談判。英國拒絕談判。人家以為拖延下去，乃是處理難題最好的方法，直到它自己爆發時再

說。我深信英國如不肯歸還香港，和平會議必因之不歡而散。……中國人民早就說得爽直，五百萬士兵之死，並不是爲了替英國保守香港——鴉片之戰的戰利品，英皇冕上第二顆最亮的珍珠。

但是〔依外交家看法〕事實的真相，較你所想像的更複雜。想想看蘇聯，那西方民主國家所最猜疑懼怕的對象。今日什麼問題都含有世界性，我們凡事也得有世界眼光。蘇聯拒絕向日本宣戰，她知道她在幹的是什麼。日本是她的制勝牌，她不要打出去，而要留在手中。蘇聯如果同希特勒日本聯手，那怎麼辦？是不是蘇聯的意思讓日本在一面作戰，她可以在歐洲隨心所欲？我們覺得蘇聯如同日本聯手，別的盟友爲什麼不能依樣葫蘆呢？到底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希特勒……其次，如果蘇聯要留日本打倒我們，我們爲什麼不留日本打倒蘇聯呢？日本的軍力消滅後，蘇聯在遠東的努力，豈不會因此膨脹……中國會不會來一場惡作劇，同日本媾和；不，感謝蒼天，這一點絕對不會，可以放心！中國是誠實可靠的，所以不必理她……我們高興給她什麼，他就消受什麼……但願蘇聯開一聲口——她弄得人家太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其次，蘇聯可能同中國印度聯合起來，操縱地略政治家所說的歐亞『心地』以及全球一半的人口。那真是地略政治家的夢魘實現了！哦，蘇聯爲什麼不開一聲口呢？

於是像漫遊奇境的亞麗絲，

恐懼愈來愈大，聲音

愈來愈低，最後

實力

恐懼竟形成了

蘇聯

多強，

放走

一條鼠尾巴——

且看，

中國

你不能

印度啊……

那醜陋，

樣，

也要

大國，

可怕

不管怎

成爲

的東西。

但是歸根結底，更大的問題，還是中國。察看強權政治思想的基本趨勢，或根據強權政治家的遠見，不可解決的難題，已經產生。史班克孟教授警告我們，『一個前進昌盛，軍備充實，人口達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不僅將威脅日本，並將威脅西方列強在亞洲地中海（指南洋一帶）的地位。』『所以不僅因為我們在戰略原料（橡皮與錫）方面的利益關係，且有鑒於勢力不平衡對世界大局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必須保持平衡勢力。』（註）因此，照史班克孟教授

（註）見尼哥拉·約翰·史班克孟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四六頁。

說來，爲在遠東維持適合時宜的均衡勢力計，『美國須對日本採取保護政策』，像她現在對英國所採取的政策一樣。可是現在我們都在顛倒乾坤，協助我們的遠東大敵中國向我們遠東畏友日本作戰。這真是荒謬透頂，令人匪解的鬼話。我們必須救濟中國，不讓她爲人擊倒，但是也不可讓她強得在戰後可以自立門戶，同人爭分高低；同時，我們必須擊敗日本，取得勝利，但是不可擊得太兇，不給她一個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的機會。

要說得更天花亂墜一些也不難。史班克孟教授所建議的半弱半強的中國和半弱半強的日本，並不能保證絕對安全，所以必須以精明手腕操縱局面，實行挑撥離間，叫這兩國永遠互相殘殺，以致兩敗俱傷，好讓西方安心。可是十年之後，日本同中國或許會忽然醒悟，察破這位耶魯大學教授的狡計，而大叫上當。兩個仇敵共同覺察他們都做了一個不懷好意的第三者的犧牲品，那不是促成她們重歸和好的最大因素？等到史班克孟教授的政治高論通行於戰後天下之時，大小諸國都要失望呻吟，忘盡真正世界合作的道理，而拿經濟政治利慾主義做國家基本政策了。可是二個半強的國家，可能拼成一個十足有力的國家。在事實上，主張英美操縱太平洋區的作家，已領會此點。他們必須張開眼睛，不可讓中日和好，要達到此目的，祇能採取軍事監視中國的方法。反之，中國亦可要求對英國採取軍事監視方法，因爲英德重歸和好的可能性，遠較中日重歸和好的可能性爲大。不讓英德攜手，乃是中國的責任，因爲每次英德攜手，德國的黷武政策便復活囂興，立下世界大戰的殺機。中國有權要求歐洲安全，正像英國有權要求遠

東安全一樣……中國人好禮，可是並不是傻瓜。他們不玩強權政治的槍花，可是人家在玩的時
候，他們也懂得。

這些乃是細察我們強權政治家的話而推得的必然形勢。他們賣弄他們的『現實主義』，洋洋得意，而把我們這班對亞洲之將來簡單看法的人民，稱爲不識時務的傻子，說夢囈的人。依強權政治思想推論亞洲的將來，就成上文所說這一副形勢。

以上所說也許是外交家所指他們『知道』的事實，也許不是。有一點可以確定，上面所說這些『事實』，都是人所不知，並不得而知的。在黑暗中，什麼蠕動的東西，都可能是老鼠尾巴。不論如何，這些『事實』，都是我們自己行動召取的結果，可有可無，與自然科學中的客觀事實不同，所以不該有科學之威嚴。但是外交家思想所依據者在此，所防患恐懼者在此，所焦心煩惱者亦在此。中國不能參加任何同盟國作戰會議，中國不可自建空軍，日本不可擊敗得太早，珍珠港事變迄今已二年有餘，而尙可不必擬定聯合對日作戰的戰略——這類政策就是根據那些人所不知亦不可得知的事實。我們未能並肩協力作戰，共商戰後建設大計，就是因爲那些畏懼。

二千年前在小亞細亞，鄉野牧童聽人說『人間友意』與『地上和平』有關，但是二十世紀的人在科學上前進得太遠，反而看不出其中真諦，而日趨於混亂。孔子豈不會說過：『民無信不立？』世界亦然。

卷二 徵象

強權篇第十四

此篇舉美國論戰後世界新書
數種證明強權思想之未泯滅

此後我們將撇開亞洲前程的問題，專談戰後世界。或許我們撇不開亞洲，因為世界是一個，到處都避不掉亞洲。我們將先在表面上針探人家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漸漸深入人類思想的爛瘡，直到發現內部精神的潰爛為止，看見當代人心何以如此頹喪不振，蒙蔽聰明，然後如用愛克司光透視一般，察看破毀這時代精神相貌的癩菌。

說到底，和平的問題原是人類本性的問題。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全在下面這二個人道問題上：（一）借用霍金教授的話，人類已把人類如何改變？（二）人類可以如何改進人類？（註）

容我先解釋一番，否則人家要說我憑空捏造，與流行此時的戰後思想不生關係。

實證之多，見了令人心慌。克拉斯·斯屈脫和諾門·安琪爾輩，與其說他們擁護世界合作政策，倒不如說他們反對美國孤立。安全，合作，自由等漂亮名詞，都被拖進來作英美霸權的

（註）見威廉·霍金 (William Hoeking) 著。What Man Can Make of Man (Harper)。

幌子。來諾·格爾貝 (Lionel Gelber) 和史蒂芬·金霍爾 (Stephen King-Hall) 更明目張膽，或則公開稱道此次戰爭乃『奪取權力之戰爭』，或則主張國際警察必須由『英美和平軍』組成，其中第三國籍之警士，必須向司令宣誓效忠，換句話說，即須向英皇和美總統宣誓效忠。伊黎·克爾柏森 (Fily Culbertson) 大事發揮國際打勃立治牌戲的數學。史蒂芬·金霍爾步其後塵，拿數學應用到『英美和平軍』上。大家都在惋惜承認英美必須爲非英語民族留些餘地，以符合『國際』秩序之名，但是其中施恩扶濟，無可奈何的口吻，都昭然若揭，掩遮不住。

我佩服哈佛系關於戰後的意見，佩服霍金教授貝來教授和康諾校長的高見議論。我仰慕華萊士副總統和威爾基的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是真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個人建議以真正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精神建造戰後世界，至少有兩人出而提倡強權政治，發揮英美武力，統治全球之必然性。

此時正有一個關於和平的戰事在進行。美國及其盟友正站在兩條交叉路口：一條通至安全穩固的世界秩序，以各國平等合作爲基礎；另一條通至英美以武力統治世界的局面。這兩種趨勢是基本的，互不相容，但是在表面上統治世界的政策，必張着世界合作或世界聯邦的旗幟，所以兩者勢必會合，爲人類謀福利！

祇有難得一次，有一個萊諾，格爾貝出來乾脆地擁護『奪取權力的戰爭』：『論事實，這

次戰爭乃是奪取權力的戰爭——爲民主強國奪取權力爲第一義，爲民主主義奪取權力才是第二義。」（註）格爾貝先生擁護凡爾賽條約——『不要新凡爾賽嗎？先要問是那一方勝利定的新凡爾賽？』他贊成維持現狀，認爲威爾斯（前外交次長）也不滿現狀，實是憾事。他甚至贊成世界人類全部之將來隸屬於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人類前程的問題，乃是它隸屬於誰，受到何種待遇的問題。在西方手中，即使偶有差錯，權力之使用，自成一格；在德國手中，則另成一格。』這個比較把他自己也說得太得意忘形了，所以他又道：『……只有一般浮薄的人，才仍在懷疑這次戰爭是什麼一回事。』最後格爾貝先生假裝不懂那個『啞謎』，他認爲非常『怪誕』，這謎就是『今日友敵皆共同默認，稱此次戰爭爲帝國主義之競爭，即渺視盟國之作戰主義……全看你所說的是那一個的帝國主義，』他大叫，同時又溫和地提醒他的讀者，義大利帝國主義『令人憎惡，但是加強美國的帝國主義……必爲各地頭腦清楚的自由人所嘉許。』我以為『頭腦清楚』這四個字，就足以推荐他的觀點；再添上『自由人』三字，便有畫蛇添足之弊，因爲根據定義，『各地的自由人』一定是嘉許帝國主義的！

格爾貝先生，我想，年事尙輕，不然必是觸動什麼靈機；其他閱歷較深的人，說話謹慎多了。在世界政府的組織，除了英美之外，他們給別國也留下了餘地——但是總脫不了那付委屈俯就的口氣。史蒂芬·金霍爾先生解釋英美『和平軍』，語調緩和多了：

（註）此句子以後所引各句，見萊諾格爾貝著『權力和平』第十頁，六十頁，一三〇頁，一四〇頁。

「英美政府不欲拒絕任何懷有友意的國家分享驅逐侵略者的權利。他們全部希望，即自己負責建立一枝軍力，須在任何情形下，不論有無他人之助，應付重任。」（註一）

談及英美的領袖地位，史班克孟教授在措詞上，如不在思想上，頗有學者風度：

「在英美兩國內，今日已有人談起一種世界聯邦，以英美當領袖為基礎，建議多起，所提方式不同，如斯突來脫先生主英美聯邦，他人則擁護組織較鬆之同盟協約。主張英美聯邦者，認為英美聯邦，乃建立世界聯邦之初步，至於其他各國，如行為經證明確實可嘉，日後自可參加。然在此時，英美聯邦須居領袖地位，是為事實。」（註二）

史班克孟教授並不是第一個開明的摩登人，想出這「借聯邦之名，行獨霸之實」的妙計；希臘王波里克里斯統治下的德里聯邦二千年前就實行，結果是促成希臘的滅亡。

這些話都是不着邊際的辯論，頭腦清楚的人不歡喜。來一些奇妙的數字罷。數字能澄清我們的頭腦，因為據說數字能使我們的思想數學化，正確，這也就是大學教育之用。聞名的金霍爾「新聞紀事」編輯不憚煩勞，替我們算出了一些明晰嚴正的數字。據他看來，美總統和英皇須發表「英美告世界人類書」，其第三款謂：

「美大總統與英皇決定建立英美聯合海空軍。海軍之實力，自各方面視之，須較不論何時

（註一）見史蒂芬·金霍爾：全勝利，二一九頁。

（註二）尼哥拉·約翰·史班克孟：世界政治中之美國戰略，四五八——四五九頁。

何地最大之艦隊超出三倍，須較任何三國海軍之總力超出兩倍。」

第四款謂：

「空軍之實力，自各方視之，須超出全球最大之空軍四倍，超出任何兩國空軍之總力兩倍。」

第七款謂：

「英美聯合海空軍之人員，其百分之八十須由英美籍之人民充任。外籍志士，有權入伍；其總數不得超出各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志願服役和平軍者，須各向其所服役之和平軍總司令宣誓效忠。」（註）

又是波里克里斯的靈魂！

如果今日的斯巴達不答應呢？金霍爾先生早想好答案，其簡單有如希特勒之數字。

「如果英美政府明白昭告世人，不論別國作何打算，英語民族決定「倍加他人所想到的數字」，我懷疑他國有否勇氣應戰，發動終必失敗的軍火生產競賽。」

去說給美國國會聽；去說給鬼聽？

將世界分割成「英語民族」和「非英語民族」，現在再清楚沒有了。上帝每借兩種相反的力量工作，電子與質子便是一例。不將世界分成二個大軍營，怎能把世界人類完全消滅？可是

（註）史蒂芬·金霍爾：全勝利，二一五頁。

不巧，德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瑞典人，捷克人，俄國人，中國人，印度人，土耳其人，都不說英語。這是什麼話！多麼下流的頭腦！

我們逃不出歷史，也學不會歷史的教訓。

不爭篇第十五

此篇申明老子不爭
哲理以破強權思想

衣冠齊楚，知書識理的大人，出此幼稚的荒論，實在令人驚奇。或許上帝限短動植物的生命，原要永遠保持這世界萬物的青春；產育不過是上帝實施新陳代謝的方法。我年紀雖已不小，赤子之心未忘——誰能替我解答這個疑題：一包乾火藥，一根接妥的導火線，同一盒正在燃燒的火柴放在一起，怎會不爆炸？其實是一個人頭獅身的 Sphinx 妖精在問話，如有人回答，她便跳下大海。我情願替他做保證人……

我們必須以新的不爭哲學來一次澈底解決這不能不解決的問題：武力足恃嗎？天下男女都應該想一想這個問題。武力如果用得澈底，那麼被逼的人，必懷怨望，因此使用武力的人，必得變本加厲，欲罷不能，終必殘酷虐暴而後止。納粹德國便是一例。武力如用得不澈底，那麼根據武力原理，豈不馬上露出弱點，而產生綏撫，欺哄，屈服，妥協，貪安等政策，收買討好中立國——換句話說，那不是說產生不剛不柔的政策？但是用這個政策扶養戰敗國家，也同樣危險，凡爾賽後德國之東山再起，便是一例。你兇到底，是自殺，不兇到底，也是自殺。德日之敗，敗於第一種武力政策，國聯和古希臘的滅亡，乃亡於第二種武力政策。

誰能給世人解釋歷史興亡之跡，說明暴力必生強迫，壓迫必生恐懼，恐懼必生仇恨，其必

然性及反動作用，正如兩牙球在球床上相撞，第二球必順勢滾到某向某距離，毫釐不爽？誰肯寫一篇文章專論武力哲學及其心理，闡明其反響及特徵？誰肯做一個道地的命運論者；用簡潔有力的字句說給世人聽，行動產生感情，感情又產生行動，武力之結果是畏懼仇恨，澈底的武力產生畏懼和仇恨，不澈底的武力祇產生仇恨而無畏懼？誰肯學物理教員那麼說，武力愈大，仇恨亦愈深，最大的武力引起最大的憎恨？誰肯學氣象學家說，正如雷鳴之後，必起風雨一般，武力之後，必起畏懼，畏懼之後，必起報仇？因仇恨必生分裂，而權力之結構，遲早必崩潰瓦解。

因為不明這些淺易明晰的道德因果律，波里克里斯對待其他希臘諸國，時用武力威嚇，時用甘言哄騙。波氏之後，皮商克里翁（Cleon），繩販歐克萊衣斯（Euclates），燈匠海波波拉司（Hyperbolus），先後粉墨登場。他們都不失為好民主領袖，克利翁還是一個好將軍。到了驕橫一時，恣意妄動的阿羅司皮帝斯（Alcibiades）手中，就完成希臘之自殺。

但是這種道理乃是天理，在樸實的平民看來，昭然若揭，無待證明。所以若要內心強固，須戒用權力，這樣則內可不弊，外可不挫。不弊不挫，方能永久堅強。老子說得好：『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所以他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愛護英美，願他們永遠昌盛的人，須三讀老子，因爲在道德經內，他們能學到內不弊外不挫力量的祕密。美國應當成就其偉大，正如江河川流不息的偉大：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持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國不成爲世界第一軍權國家，倒不足慮；可慮的是她變成世界第一軍權國家。我願見美國成爲世界的道德領袖，以謙和先，爲各國所愛戴推讓。如同『萬物恃之而生』的河流，她的豐富燦爛的生命，將造福人羣。她將居衆人之上，但是人家不會覺得她的壓力；她走在衆人之前，人家不會去陰害她。因爲她將以仁義克己爲天下勸，而運用豁光養晦的玄祕力量，開闢世界大同的新紀元。因爲她有力量行善，所以能不傾覆；因爲她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所以不敗。因爲她不爭，所以天下莫能與爭；因爲他不居功，所以其功不可奪。這是我夢想中的美國。可能實現嗎？

有人會做到這步。林肯做到過，華盛頓做到過。在亂世時代，曾有偉人挺身而出，以正心誠意昭告世人謂善能克惡，並親自以身作則立功證明。歷史中有正氣盛行之時，有邪氣逞兇之時。有時正氣在空中蕩漾，人民咸殺自私之心，並覺新天地已露曙光；那時信心充實了他們的憧憬，給他們添上溫暖之氣和新的力量，黃金色的天邊便顯現了。於是人類的善性乃光揚一時。有時也有混亂頹廢沮喪的時期，奸刁驕橫之邪氣蔽天欲黑，信心消失，理想主義生不逢時，低頭含羞退出。這就是某政朝某文化將傾覆的先兆。人的道德素養為膚淺之頹喪論說所侵襲，於是精神渙散，意志銷沉，無力發奮自強，不敢作勝過先人的努力。於是黑暗降臨。這兩種時代之別，即在信念與絕望之分。

這時代的人的頭腦，都是生鋼模型中打出來的，所以非用精神溶爐轉化它不可。我們必須溶其硬質，清其雜澱，而鍊成成熟之思想理智。『山頂傳道』之感化力，柔和了基督教社會之生活，無論在城市在農村，有柔化尙武人類的力量，成為西方社會的綱維。有時候一本聖經，仍能制服一個兇手。但是基督教的力量，不足以影響世界政治。基督教是像一團麵粉，雖加上耶穌的酵素，調拌了二千年之久，仍有硬塊在內，沒有調勻，一個好管家婆必加些老子的調和粉進去，以期速成。

須知今日的人，神經緊張到達極點，血管硬結症已起。世界時局的邁進，引起強權之鬭爭，其力若蒸汽爆發之可怕。溶爐怒吼，金色熱白，燦爛的鋼液潺潺滾流，機聲軋軋，鐵鉗叮

璫，大鐵桶在半空中懸行往返，左右的人，一不留神，便有斷臂折足或生命之虞。鋼鐵，鋼鐵，鋼鐵——液流的，閃爍的，凝固的；變黑的鋼鐵。在吼聲隆隆的溶爐前，人們體溫增高，火氣盛旺，雖想用腦思索，但是思想已染有鋼鐵色彩；不禁又怕自己，又怕自己所發展的威力。念一念老子，會對他有益，可以清散他胸中的肝火，涼退他慌張的神色。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簿書篇第十六

此篇論古爾柏森的世界聯邦計劃藉以證明數學之不能避開心理及數學機械方法之不足恃

現在我們來討論數字怪物伊黎·古爾柏森(Ely Colbertson)的建議。或許歐克里特(Euclid)和拜柴果拉斯(Pythagoras)也能助我們一臂之力，以數字指示我們建立和平的方法。古爾柏森計劃勝人之處，乃是他的精確的數字推論，和應付大問題的明晰頭腦。問題乃是純粹的數學，『分配和平的制度』，有多大用處。

爲示公道起見，先得請讀者別把古爾柏森先生同強權政治家混在一起看待。他曾研究大眾心理，但是他不是心理學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他是像你我一樣的平平實實肯用腦子的人。其次，他賦稟不凡，思路清明。如果歐克里特和拜柴果拉斯能救我們，古爾柏森也能。不寧唯是，古爾柏森還富於常識。他看得出，國際警察之存在，有如一陣煙幕，祇掩護住操縱局勢的行爲——這是國際警察組織最大的危險——必引起國際間的壓迫和仇隙。而且他打定主意，盡力要消除這種危險。我們覺得他的用意實在可嘉。他評解今日的問題和補救方法，說得頭頭是道，條理不紊，我認爲是看來最有趣味的世界合作建議。其次，玩一場國際勃立治牌戲也很有趣，可以操練腦子。

我們不擬在此詳細檢討『世界聯邦計劃』。這計劃包括一個『世界軍備董事會』，一個

『世界主席』，『世界董事會』，『世界法官』，以及『世界議員』。此外，有『世界憲法』和『三個時期』：『戰爭時期』，『停戰時期』和『戰後時期』，第一、二兩時期歸於『臨時政府』之下。其他尚有『世界領土表』，把地球劃成十一『地方聯邦』，包括『獨立兩道國』（如瑞士、但澤），以及『自治地方聯邦』（如印度及馬來亞）。

但是古氏建議最特殊的一點，乃『軍力分配原則』。這是數學。按照古氏建議，每個地方聯邦可設『國防軍』，此外尚須定立『集團分配軍』，設『活動部隊』，由地方聯邦之全體會員指揮，彷彿撲克戲中一張『聽用牌』（Joker）一樣，更可說彷彿撲克戲中之『寡婦』，大家可以認取召用。

古爾柏森氏想解決的難題是，如何使『世界警團』，不妨害各國國家的主權。他的辦法，是在戰爭時期各國國防軍參加『世界警團』共同作戰，而在和平時期，則各守自己門戶，外國軍隊不能開入一步。其次，各國『國防軍』合力則成『國際警團』，分散則力各足以守土，而不足以攻人。

世界警團分配原則表

分配率	警團之國籍	駐紮地	所代表之地方聯邦
二〇%	美國	美國、西半球之租界根據地；馬來亞聯邦	美國

一五%	英國（以及英語自治領）	大英帝國：印度聯邦之租借根據地	英國
一五%	俄國	蘇聯	俄國
四%	法國	法國	拉丁歐洲（拉丁）
四%	德國	德國	北歐（日耳曼）
四%	波蘭	波蘭	中歐
四%	土耳其	土耳其	中東
四%	中國	中國	中國
四%	印度（暫時歸於英國指揮之下）	印度	印度
二%	馬來亞（暫時歸於美國指揮之下）	馬來亞聯邦	馬來亞
二%	日本	日本	日本
二二%	流動部隊（右面以外諸國之陸隊）	兩通國家以及世界聯邦之戰略島嶼	各地方聯邦（集團分配軍）

軍力分配原則之例表

國	名	分配率	國	防	軍	飛	機	坦	克	戰艦和航空母艦
美	國	二%	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二〇				

下：

牌已經發出，我們且坐下玩這場國際橋戲。據古氏說來，這個數學化分配軍力的利益如

總共	流動部隊 (集體分配軍)	日本	馬來亞	印度	中國	土耳其	波蘭	法國	德國	蘇聯	英國
一〇〇%	二二%	二%	二%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五%	一五%
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七、五〇〇	七、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	二二	二	二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五	一五

「這個分配方法，不僅能消除軍事獨裁及三兩國間的戰爭，並能消除集團戰爭。根據軍力分配原則，沒有一個在政治上可能的集團，能向其他世界聯邦國家發動侵略戰而不歸敗北。」

「假使——雖然最不可能——世界聯邦組織後數年，產生了一個最強大的集團，英美德決定推翻世界聯邦而征服世界。若不定軍力分配原則，這個集團必能逞凶得志。根據軍力分配原則，這三國的分配總額，不過總數百分之三十九。反看對方，飛機坦克戰艦達總分配額之百分之六十一，其中百分之二十二係流動部隊，充任衝鋒軍，在英德兩國（百分之十九）尚未將工業生產機構轉成軍火生產機構時，優勢早已爲人佔去，美國之百分之二十額量，也獨木難撐大廈了。」

「反過情形來說，假使爲共產黨操縱的歐亞，企圖推翻世界聯邦以及英美國家，若不立世界聯邦，那末共產化的日本、中國、波蘭、蘇聯、德國、法國、聯合對抗英美，勢必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若立世界聯邦，反叛國之分額比率，則僅達百分之三十三，對方實力，計流動部隊，英美本國軍隊，及世界警團之其它部隊，總共達百分之六十七。」

換句話說，沒有人能「吃通盤」。老實說，這手牌分配方法，叫沒人敢開盤。如果數字能給我們和平，這個計劃一定也能。如果繫鈴有術，如果蘇聯肯接受人家發給他的牌，如果玩牌的人都不打盹，如果大家技術一樣高明，或玩法一樣魯莽，或一樣小心，或一樣老實，或作弊

通風的手段一樣高明；最後，如果玩牌的人彼此間都友愛信任，大家都不開口，那麼牌也玩不成了（即無大戰）。如果沒有旁的條件，沒有各國民族心不同，沒有國際野心不同，沒有文化傳統不同；如果能夠大家始終警惕；如果『世界政府』能當機立斷，遇事即刻調動『流動部隊』；如果不再組織一個李頓爵士考察團去花一年功夫交一個報告備案參考；如果『侵略』與『防守』的意義容易規限；如果沒有工業生產力改變軍事生產力的問題；如果沒有民航事業問題；如果大家同樣的尙武或同樣滿足現狀；如果無人祕密擴充軍備或公開否認軍力分配制度；如果沒有重洋海陸運輸問題；如果各『國防軍』及『流動部隊』距離衝突地點的遠近相等；如果各軍隊於頃刻之間都能集中作戰；如果到緊張關頭責任臨身，無人猶豫不決或保持中立；如果，比方蘇聯或德國反抗時，捷克內部能一致，或捷克和波蘭能一致；如果，最重要的，沒有一個國家操縱『世界政府』；如果『世界法官』不為大國所左右；如果『世界議會』無法指揮；如果大國不操縱『世界政府』，不再把它當做國際聯盟般的私人機關；如果諸大國不致忘記道義，熱誠消散，彼此分裂，改變初衷，推翻原議；如果『流動部隊』不致為私人之利害奔波勞役；如果重要作戰物資，不致為人暗中操縱；如果化學工業沒有新的進步；如果沒有祕密武器發明；如果有人能保證各國民意不致改變；如果沒有自私和孤立政策；如果經濟霸道不致在任何一國崛起；如果天下真有公道可言，無種族歧視——那麼這個計劃還可能給我們和平。換句話說，如果這真是一場橋戲，紙牌實是紙牌，而非三心兩意，性好爭吵，隨時變動的人

類，那麼，謝謝蒼天，無人玩牌，紙牌維持初發出時的原狀，我們便可避免戰爭了！

我們不妨研究一下這分配表，察看簡單的數字背後，隱伏着多少複雜的心理因素。美國海陸軍專家自然樂於接受古氏建議，英國專家也不致反對。但是幅員較大，人口較多的蘇聯爲什麼要接受較美國更低的分配，尤其是鑒於英美素來攜手一致，印度聯邦及馬來亞聯邦又歸英美分別管轄？誰敢冒險去繫鈴在蘇聯這隻貓的身上？

很明顯的，增加國際『流動部隊』的公共『集團分配軍』，而減少『大國』的國防軍，便能實現古爾柏森先生的一切願望。較之減低『集團分配軍』，增加若干國家的分配比率，而形成顯明的強弱之分，總要高明百倍。平均地方聯邦分配率均等，而提高公共集團分配率，似乎即能代表國際公道安全之原則，而引起人民的信仰，很簡單的，若是公共集團軍爲百分之五十，那麼不論『反叛』之『國防軍』聲勢如何，其實力總不及順服『世界政府』的軍隊，除非整個世界羣起而反叛世界政府——那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公共集團分配率定於百分之三十二或三十四，亦可比較容易受各國接納，方式如下：

(甲) 集團分配軍 百分之三十四

十一國防軍（平均各單位得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十六

(乙) 集團分配軍

百分之三十二

中蘇英美（各單位百分之十）

百分之四十

七國防軍（各單位百分之四）

百分之二十八

依照（乙）項方式，美英聯軍或中蘇聯軍的軍力，祇達百分之二十，而集團分配軍力則達百分之三十二，國際警團全部更達百分之八十。

爲什麼不如此建議呢？這裏就是根本癥結所在了。其性質是心理方面的。這個原則，對英美須徵其同意，對蘇聯則可強迫使其接受。『也許再減低英美的比率，較爲妥當，但如此，英國議院便難予以通過，而美國也不致有三分之二議員投票贊成這個危險的方案。』但是有什麼『危險』呢？何況把集團分配軍提高，更無危險。但由蘇聯看法的危險，如何辦理呢？

『蘇聯有鑒於戰前週旋資本國家之經驗，而懷疑資本國家在戰後之存心，可能採取絕對孤立之政策，等到他學察世界聯邦確是爲了蘇聯以及大家的利害而設……如果世界聯邦爲維持軍力分配比例計，蘇聯軍力增加多少，聯邦也增加多少，蘇聯當不致反對。』

說來說去還是回到軍備上的競爭，這已夠危險，兼又回到政治上的壓迫，那更加危險！這裏安琪兒爵士給了我們一個清楚肯定的提示：英美在戰時及戰後將採取『單獨行動』。斯屈來脫先生及其他贊成英美聯邦統治世界的一般人，意思也完全一致。其他諸國，隨他們贊

成與否，世界政府決不以全球之同意為基礎。安琪兒爵士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紐約市廳發表演說詞謂：

「記住，美國前輩的政治家採取門羅主義時，並未先草擬完美的「汎美洲憲法」。他們連拉丁美洲諸共和國，都未與磋商。宣言是單獨發表的，在我看來，這足以為今日吾人作參考。」

安琪兒爵士的火氣，真愈來愈大了。

但是大國的分配率為什麼高，小國的分配率為什麼低？我們看見一番顛倒乾坤的理論，因為，古爾柏森先生說，小國會聯合起來攻打大國？歷史中幾曾有小國聯合起來防衛國土的事，不要說聯合進攻大國？歷史的事跡，豈不正恰相反？威脅世界和平的，可是挪威瑞士丹麥？且聽他的話：

「分配世界警察最理想的方法，似乎是給十一地方聯邦平均之軍力。但是這就是脫離現實了。計算分配率時，我們不僅須記住領土與生產力等因素，並須記住政治心理因素。如果各地方聯邦皆得相等的武裝軍隊分配率，較為貧窮的聯邦（佔大多數）必起而進攻少數富裕的聯邦。」

這又是芬蘭威魯蘇聯安全的舊調。為什麼不建議較大的「集團分配軍」而求安全，或多信託「世界政府」一點，依我看來，若研究政治心理的因素，倒不能為歷史上侵伐人國孽跡昭彰

的大國說話，反而應替愛好和平的小國說話。

拿中國的例子來說，此說之不合理，更爲明顯。我知道古爾柏森氏對中國的感情不壞，他所應用的逆情悖理邏輯——加於中國的是一套，加於英美的又是一套——全非出於故意，也人情所難免。英美蘇三國需要縱橫大陸的生存空間，所以必須予以較高的分配率；爲了同一的理由中國却不可得高分配率。爲什麼？因爲中國要『威脅』其他國家，且看：

『論將來的局勢，爲世界和平計，最好由美英蘇三國分得最大的分配率，各得一縱橫大陸之生存空間。這三國的經濟生命向內而非向外發展。（原文如此，不必懷疑！）此三國各遇有強大競爭國的威脅——如缺少生存空間之剩餘大國德意志威脅他們，或工業落後在胚胎形中的大國中國威脅他們。』

原來如此，工業（即軍火工業）落後的中國，在威脅工業已發達的蘇聯或美國！

古爾柏森先生說得很清楚，中國因爲人口甚多，領土易守，民族純粹，所以祇能得百分之四的分配率，而根據同那些理由，卻須給蘇聯美國百分之十五及二十之比率。古爾柏森先生也承認這『表面上的不公』，而作如下『解釋』：

『論中國，這擁有五萬萬人口的英雄國家應得的分配率，似乎該在百分之四之上。其實她人口之衆多，就是分配率較低的緣故。中國不僅工業生產力低弱，領土比較易守，並且她的人口也衆多，種族也純粹。她可能訓練多於美國四倍的軍隊巡防內部。這巡防警隊雖然

缺乏重兵器，在事實上，可成助戰的步兵。所以她的分配率，祇有百分之四。（註）

古爾柏森先生，我不懂你的話。

心理方面的理由，還不止於此。古爾柏森其實不要中國被人猜疑爲帝國主義國家，不要中國激起全球的猜忌。後來論到不立『軍力分配原則』的世界時，我們方看出其中真正的原因。

『此外，世界聯邦能給中國機會發展工業，而不招引其他國家的疑懼。若無世界聯邦，強權政治可能促使其它各國進攻中國，不讓她五萬萬人口因振興工業而招兵買馬到太強盛的田地。』

但是即使在世界聯邦之內，同一的難題仍然存在：要勒緊中國的工業頸喉呢？抑或聽她發展，直到她要求與人平等，重訂軍力分配率爲止，那時候再用槍尖把她壓倒，或操縱『世界政府』把她鎮住呢？這必成變相的『五、五、三』舊戲——此次日本挑戰的根原。這種複雜問題之產生，全因爲我們太重『事實』，而忘卻平等原則。

中國或不得已而接受此分配原則，或拒絕不納，是另一回事。如果她接受百分之四的分配率，那不是出於被迫無法，而是出於老子的大智若愚，以柔勝剛，居下不跌，不願招人疑忌的哲學。我對這點確信不疑。我所怕的，乃是歷史未久之國，睥睨古人智慧，不肯戒驕戒滿而弭

（註）最後一句『所以她的分配比率祇有百分之四，』出現於油印第一版。在印成本及再版書，則已被刪去。這很有趣。這句話原來是用以加強語調的，但是古爾柏森先生後來一定覺察非但不能加強語調，反而把它減弱。

猜懼，仇恨，傾覆於未萌。『裝做傻瓜』是一句道地的中國成語，有時候我竟忘記 to pretend to be a damn fool 並非英文成語。除了一個中國學者誰會稱他自己『守愚』『抱拙』。但是我知道，世界合作最後必因白種人的驕橫而致失敗。

不，和平問題，並不是數字問題，而是強國的心理問題。世界和平問題，不祇是數字問題，正如率師作戰，不祇是佈兵立陣，察看地理兩件事一般；往往軍隊坦克俱全，問題全在率師將領之人格，頭腦，勇氣，機智，應付下屬軍官的方法，及對待長官，同事及敵人的態度。

喪師折兵有時因為主將在想念俘在敵營中的情婦。和平破產，固為賴伐爾輩迭次往來柏林羅馬之間。如強權政治之觀念不變，大政治家仍沾沾自喜，昏迷不醒，既不知戰事因何發生，更不知戰爭目的何在——除了保守屬地，維持原狀——和平永遠要成泡影，而我們的子子孫孫，還得流血。

可否容我建議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可否容我證明和平是可能的事？可否容我借歷史說明在世界上若干地帶和平不僅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案可查的歷史事實？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既無條約，又無分配原則，都相處甚安。可否容我再說一聲，白種人未到亞洲前，亞洲已過了數百年國泰民安的日子？大溪第，巴利，沙摩亞（太平洋島名）也曾度過太平日子，格林蘭，冰島也曾經見過和平。

可否容我說出其中理由？南美及加利比海得以安享太平，因為西班牙葡萄牙帝國業已崩潰。南美內戰是有的，但是我們不是談內戰，我們談的是世界史中的大波動，今日世界若要和平，英、法、荷帝國必須拆散。這次戰爭，我知道還不足以引起反動，破壞這些帝國，我祇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能竟其功。如果帝國政府不為菲律賓，爪哇，印度，緬甸等人民的『自治能力』過分耽心，那麼菲律賓，爪哇，印度，緬甸便有和平可言了。如果他們繼續為各屬地的『自治能力』過分耽心，戰爭將永遠在他們自己國內繼續下去。

國內若無平衡，就必須內戰。侵略者若不退，就必須反抗帝國主義。世界唯一穩固的平衡，乃是平等。平衡立穩，方可望和平。小國家或許爲了邊境爭執問題，有權利作戰；大國家不論如何，無權利作戰，因為大國作戰，勢必牽累全球。小國作戰，總是爲了他們自己的事；大國作戰，多半因為他們要干涉人家的事。小國安寧，因為他們有足用的領土；大國作戰，因為他們永遠不能滿足——他們需要『生存空間』。最後，國不論大小，並非因知足而作戰；國不論大小，不知足便作戰。老子說得好：『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這樣看來，古爾柏森先生置數學於心理學之前，不啻西人所謂拴馬於事後。在全球五六十個國家中，推翻世界和平者，祇有三四個強國。這些強國驕橫傲慢，縱橫全球，踢倒人家的籬牆，剝奪人家的自由主權，攫取人家的財產——最後爲了分贓不均而互拼死活。他們先自己相

打，後來還叫世界各國幫他們打在一起。這已經不像話。但是說和平之道，僅在解除小國的軍備，增強大國之權力，以防小國聯合起來進攻大國，那豈非更不像話！

奉告大國，你們至少也得裝個並不害怕的模樣罷！但是我們突然聽見說須來巡防世界了。彷彿格林蘭人，沙摩亞人，台灣人，緬甸人，都在威脅世界的治安，而諸大國卻全副警服，雄糾糾地高視闊步，手持木棍，小國一不聽話，隨時準備棒擊小國的頭額。其實我們應該輪換一下，叫小國來巡防制止大國擾亂治安，而任憑沙摩亞人，巴利人，愛斯基摩人，自由自在。可是不，我們不能解除大國的武裝，因為他們英勇作戰取得勝利後，不肯讓人解除武裝。好，那末，讓戰爭永遠繼續下去。頭一樣，你就要看見警察先生們先自開槍，互相對打起來，把我們這些可憐的弱小隣居嚇得魂飛魄散。

血地篇第十七

此篇專攻『地略政治家』而推究此類自然主義戰爭哲學所由來以明自然主義之深入西方學界

不戰爭的根源，還在深一層。我們不能把古爾柏森先生同強權政治家相提並論。他是站在我們一面的。站在對面的人數目衆多，他們瘡口的感覺極靈。醫生，落手輕一些，因為病人怕痛；請施出最精巧的開刀手術來。俗語道：『諱疾忌醫』。癩瘋症象業已蔓延週身，因為強權政治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沉疴。診治方法，唯在施行手術，割除分泌毒汁之自然主義，定數論，以及失望論諸毒瘤。

討論地略政治這一門假科學時，我們須記住，地略政治把國家稱做『有機體』，其實疾病也是一個有機體。病菌之爲生存奮鬥，與生命無異。它吸食病人脂血，奮力衛護自己的地盤。它埋伏在人體中，建造一個堡壘，然後反攻。強權政治的疾病也同樣建造了一所莊麗的大廈，名曰『地略政治學院』。門口放了一座由自然博物院偷來的裸體石像，名科學夫人。簷下邊沿四週冒充培根 (Bacon)，李奈斯 (Linnaeus)，萊布尼茲 (Leibnitz)，赫姆波脫 (Humboldt)，黑格爾 (Hegel)，華格納 (Wagner)，達爾文 (Darwin) 名字。裏面有堂皇的走廊，明亮的圖書室；編排分號的文件案宗，推積如山；更有一間整潔的白磁磚廁所。原來凡是夠得上稱爲科學的機關，都有整潔白磁磚廁所。達爾文，李奈斯，赫姆波脫等，如何能不備

這種廁所而能作科學上發明，仍是近代科學史中沒法解決的大謎。

現在可以略過美英聯邦的贊助人不談，因為要找此種材料，到處都是。一片沙漠，只要看到一角，便可知其全部。我們倒應該加緊脚步專心一致的檢查今日人心道術的根本癥結，直到發現毒源之所在為止。我們可以把地略政治當做人心道術一個病症，而反復細察，現代人何以有這種思想。

因為地略政治到底還是一種哲學，德人所謂 *Welanschauung* 是一種思想的產物。在地略政治境內，納粹學者和反納粹學者都在揖手行禮，互相敬慕。由這種頭腦，這種學術態度，才產生了近代的強權政治，使其滋長暢茂。史班克孟教授是今日美國的最享盛名的地略政治家，所以他雖不能代表一切學人的思想，卻能代表一部學人的思想。在他心中，學術不近人情之趨勢已到極點，而科學與良心是非，已經分家，背道而行。

史班克孟教授，可算是強權政治的發言人。『世界政治中之美國戰略』一書的副名是『美國及武力均衡』。他深信強權政治，並表現出來強權政治的各種徵象。他說：

『在基本上，新秩序與舊秩序將無大分別，國際社會仍將隨權力為轉移中心。新世界必為強權政治之世界，美國為本身利害計，仍須堅持歐亞武力均衡。』(註)

所以他贊成美英日三國聯合統霸世界，他反對歐洲統一，不管是在聯邦組織下或由一大國統

(註)見『世界政治中之美國戰略』四六一頁，此後引用各句，見四六〇，四六六及四七〇頁。

領，因爲：

『歐洲聯邦可能成爲一團結的軍力，把我們〔美國〕在大西洋的權威全部改變，並削弱我們在西歐的地位。美國的和平目的，如係建設統一的歐洲，我們便已挑錯了敵人。出動全力幫助希特勒，乃是建設統一的大西洋區最簡便的方法。』

換句話說，我們作戰，原來是要維持歐洲分歧的局面。我們現在的立場不錯，因爲我們在毀滅歐洲的統一聯合；我們幫助英國人，原因不過是要置歐洲於水深火熱之中，俾使美國成爲一個重要的大西洋權威。所以史班克孟教授主張美國須把持歐美亞三洲的領袖地位。爲達到此目的，美國在擊敗德日之後，仍須繼續奮鬥，直到消滅中蘇軍力爲止。（註）欲達到此最大目的，必須恢復德日的軍力，以對付中蘇。『華盛頓也許將信服英國的論調，要求強盛的德國繼續存在。』『如欲維持遠東勢力之均衡，美國須對日本（如對英國一般）採取同樣的保護政策。』『幅員自烏拉山（Ural）至北海之蘇聯，與幅員自北海至烏拉之德國，難分軒輊。』『一個前進昌盛，軍備充實，人口達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不僅將威脅日本，並將威脅西方諸強在亞洲地中海（南洋）的地位。』

史班克孟教授這本書最後十五頁內所蘊含的國際毒液，比希特勒『我的奮鬥』全書更劇烈。史班克孟教授真的神經錯亂了嗎？沒有，他所講的是科學，與人生價值無關的科學。他保

（註）見四六〇——四六一頁。請參考第三篇中之引句。

持完全超脫的客觀態度，頭腦用消毒密封方法封住，人類感情已全部肅清。如果有人說得出史班克孟教授與霍斯何弗（Haushofer，德國地略政治第一大家，見下）或希特勒在宇宙觀上有什麼分別，我倒願意聽聽。史班克孟的頭腦實是納粹頭腦，但是科學化的標籤，在科學界內，當然不能算是侮辱。對一頭臭鼬與對一頭松鼠的分別好惡，完全是我們俗人的偏見。除非我們能學到自然科學的嚴肅客觀境界（不復分別好惡美醜），我們不能懂得史班克孟教授。

去年美國人搓眼醒來，發現『地略政治』（Geopolitics）這個新名詞，即德人所謂（Geopolitik）。與此名詞相聯的，有霍斯何弗教授（Prof. Doktor Karl Haushofer 生於一八六九年），地略政治的大師；傳說他對希特勒，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拉斯布丁（Rasputin）影響最後一個俄國皇帝一般。不論傳說如何，『我的奮鬥』第二卷十四章，人家說是由霍斯何弗代筆，不然便是根據霍氏的意思而作。他對世界二次大戰的關係，頗似突來茨基（Treitschke）對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美國人民遲遲開眼，才發覺在霍斯何弗之前，還有一個英國人名麥肯德（Sir Harold Mackinder），早在一九〇四年，便發表地略政治的中心理論，倡歐亞『中心地』之說；一九一八年著書名『民主理想與現實』，原已為人遺忘，一九四二年又再版復活。我們更發覺整個背離人道的生物概念——倡論『國家有機體』及『有機慾望』之說，申言國家在『生存空間』之爭奪中，如植物般生長死滅——原來早已為一個瑞典教授吉倫（Rudolf Kjellén，死於一九二二年），

立下梗概，而吉倫氏則在一八九〇年間宗德人拉塞爾 (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 的師說。這門歐洲科學的國際共同的來源的重要性，在下面還要談到。

地略政治之所以危險，因為它是一門「科學」，而假借科學之名，已有過多少孽跡。須知道，德國地略政治與政治地理之不同，乃在地略政治實是「政治行爲的引導」。政治地理，根本上是地理，目的在描述與分析，而地略政治，根本上是政治，就是征服世界的政治，至少是世界爭鬪的政治，以戰略的地理概念爲基礎。德國地略政治家毛爾 (Otto Maull) 說得很清楚：

「地略政治所研究的國家，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地略政治與其母家科學政治地理不同，並不研究自然之現象——如地勢，領土，外形，疆界等等。地略政治……：佐衡某一地勢，然後以其結論引導實際政治。」(註)

由此看來，地略政治是具有應用科學的性質了。此科學的唯一應用方式，乃是爲操縱世界，爭取地球面積作國際鬪爭，所以地略政治就不僅是一種毫無害處，專論國家機體與「地面」之關係的政治科學，而必然是「血」與「地」合一的科學了。並不是地略政治家計較到人類的流血。那是在這項「精確的科學」的「範圍」以外。但是每聽到他們講起「地球」或「世界島」，我就覺得它已爲人血染紅。地略政治並不是研究「土地」「地片」(Land Mass)「核心地」(Heartland)「邊沿地」(Rimland)，生存空間，以及伸張空間的科學，而是「血地的科

(註) Andreas Dorpalaw『霍斯何弗的世界』，第二十四、二十五頁。

學』。它與政治科學之分別，有如溶化的雪漿與白雪的分別。它唯一的科學面目，乃是日積月累的實際材料，對『政治空間有機體』的純生物化觀念——把國家當做一顆得土既生，失土即死的大樹——以及對人道天理的神鬼不怕的漠視睥睨態度——這態度我們稱爲完全的『客觀』科學。人口可以如蘿蔔般移植他地，『世界島』可以如破瓜般任意割裂，作最利於強國的分配。爲了此事，要炸斃幾十個兒童，或消滅百萬生靈，不值得麻煩這些世界屠夫的心事。地略政治之所以成爲科學，就是由於這種漠視人類價值的態度，認爲物質勢力決定人類歷史的機械觀念，以及把世界當作深山荒林野獸世界的『自然』觀念。

不幸得很，地略政治不僅僭取自然科學之形式及術語，並被人認爲是德國科學。我不敢說美國人遇到德國科學，便生『自卑錯綜』。美國照相機，大約與德國照相機難分軒輊，美國轟炸機的瞄準器，正巧較德國轟炸機的瞄準器，高明許多。雖然如此，德國科學總居至尊地位，美國學界也萬分景仰。在美國大學內，某幾門學課，譬如說文學，德國影響實堪惋惜，而其惡勢力猶把持住高等研究院。地略政治既稱爲一門德國科學，立即爲若干美國教授所重視，信徒源源而至。

生活雜誌在一九四二年底載文云：『本年內美國各大學開設地略政治課程，不下一千五百餘。一般教地理的冬烘學究，都搖身一變而爲新進的地略政治學家。』但是美國也有第一流的地略政治家，如霍普金斯大學的鮑門校長 (Tsalah Downman)，喬治城的華緒神父 (Father

Walsh)，耶魯的史班克孟，哈佛的威德時(Derwent Whittlesey)，普林斯登的雅爾(Jedward Mead Parlo)及史普老(Harold Sprout)。他們把地略政治稱爲『科學』，所以它就要保存爲一門科學了。美國人民的常識理性將如何改正羅斯何弗主義，還得等着看，但是美國教授不會舍棄其科學銜頭。我們不能一笑了之，把它當做一種一旦深入美國土地，便能自解其毒的德國毒藥。

這個德國的宇宙觀以及達爾文自然物競之說，影響美國地略政治家到何程度，且看史班克孟教授便可知道。他的著作最能完全反射出這『強權政治之自然科學』的德國風味，絲毫不容人道觀念插足其間。這種話讀者看後作何感想？

『決定外交政策的政治家，考慮正義，公道，寬容的價值，祇能在有益於權力目標的範圍下進行，不可使它有礙權力目標。正義，公道，寬容可以利用作爲攫取權力的藉口托辭，但是實行時若可致弱，便須即刻放棄。攫取權力之目的，不在建立道德公理，道德公理之用途，乃便利權力之攫取。』

讀者中十九必以爲這是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話。不，這是史班克孟教授所著『世界政治與美國戰略』第十八頁上的話。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浦門氏稱此書道：『這本書至少須在一百萬個美國家庭中爲人閱讀。每個政府負責人在此後二十年中至少須每年讀一遍。』

學人的這種寡廉喪恥，還有實證可舉。威格博士(Dr. Hans W. Weigert)著新書論地略

政治，書名『將軍與地理學家』。在最後一章內，威氏痛心疾首向世人呼籲，請求恢復人道的觀念。紐約時報刊一書評說：『此書最後十五頁論「地略政治與人道」，作者不應該寫。』寫書評的人說此書：『結尾的論說……與霍斯何弗之著作同樣晦澀混亂』。其所以『晦澀混亂』，據我看來，全因為作者把人類的是非判斷，引進了客觀科學的森嚴境界。想起美國學界對威格博士的呼籲，竟毫無反響，就不寒而慄。

反之，最近史突老斯胡伯(Strausz-Hupé)，威德時(Derwent Whitesey)，陶柏倫(Andreas Dorpalen)等所著論地略政治的書，(註一)以及威格那本著作，(註二)對霍斯何弗主義都有正確的批判。德國的地略政治思想，值得仔細研究，正如『我的奮鬥』值得仔細研究一般。(陶柏倫之『霍斯何弗將軍之世界』一書所備載的資料，多半非美國讀者所能搜得者。)

可是在我看來，地略政治，不論是霍斯何弗派或其它派，百分之五十是集合而成的客觀材料，百分之三十是冒牌科學，百分之二十是德國玄學，或可說是『浮士德的懸望』。地略政治定義太多，有的故意戴上客觀科學的高帽子，看了反令人糊塗，不如聽霍斯何弗自己的話：

(註一)史突老斯胡伯著：『地略政治——空間與權力之爭奪』(Putman 版)；威德時：『德國征服世界之戰略』(Parvar & Rinehart 版)，附有趣的地略政治地圖；陶柏倫：『霍斯何弗將軍之世界』(Parvar & Rinehart 版)。(註二)爲威格在『將軍與地理學家』第十四頁所引(牛津版)，參閱陶柏倫書中之『正式』及『非正式』定義，目

二三至二五頁。

『地略政治，乃是國家機體在爭取生存空間的生死戰中所採取的政治行動的科學基礎。』試刪去『生死戰』『國家機體』。『生存空間』這種殺氣騰騰的名詞，地略政治便不能引導政治行動了。刪去以亞洲『核心地』爲基礎，建立歐亞大陸大集團這種動力的意念，地略政治便成爲連霍斯何弗希特勒都不屑看它一眼的東西了。

很明顯的，地略政治也有它的貢獻。第一，它告訴我們，不論爲世界戰爭或世界和平作政治計劃，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地理，正如草擬戰略需用精確的地圖一般。華萊士副總統建議空中航道，顧及北極地帶，便顯出優良的地略政治頭腦。其實，不論是誰，凡考慮到巴拿馬運河或蘇彝士運河的政治重要，都是在運用地略政治思想。第二點，地略政治教人戰爭與和平的世界觀，最爲中肯。德日兩國精悉此中道理，而西方民主國家則落後得可嘆。納粹戰爭『罪狀』最好的證據，如果需要證據的話，乃是他們的充分準備，以及民主國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後對亞洲政策之糊塗。德國人和日本人計劃世界政治戰略，實在頭頭是道，詳盡無遺，而英美人應付亞洲問題，昔日今日，始終如在混水中摸魚。此處順便可以提起，繪地圖，看地圖的藝術，也可從地略政治中學得不少進益。霍斯何弗創辦慕尼黑黑學院時，最大的不滿，便是說德國軍官不知道如何閱讀地圖。

我們都同意，羅森柏 (Rosenberg) 的亞利安 (Aryan) 優秀民族之說，乃是冒牌科學。這種問題大家心中明白，無須多費口舌去排斥。地略政治之爲冒牌科學，就不怎樣明顯了，因爲

地略政治家口上總掛着『地片』(Land Mass)和『世界島』這種名詞。然地略政治之爲冒牌科學，實因其中心對象是世界政治，而世界政治，因其性質關係，決不能像礦學般以純客觀的眼光來研究。人事關係中根本無客觀可言，有時我們因某事必須作一選擇，在選擇的時候，主觀的成分便滲透入內。主觀成分一入，地略政治便缺乏客觀性，不亞於亞利安民族之怪論。在這種地方，道德觀念之顛倒，一般見解之不可靠，即時可以看得出來。

李南教授(Prof. George T. Renner 哥倫比亞地理教授)的建議，便是一個有趣的例。他說，由地略政治的觀點看來，瑞士民國應該消滅。這建議非但有欠公允，簡直是倒行逆施，因爲瑞士民國憑靠李南教授目力所看不到的民主精神，並違反地略政治學的『伸張空間公例』，在七百年來，竟能異族雜處，國泰民安。又如史班克孟教授對英日在地勢上的酷似點，甚感興趣，於是主張美國應以同樣的方式，與英日兩國合作。然而英國國民性根本上非惡戰，而日本國民性根本上好戰，這條不同，便置之不理。我所反對的乃是這種荒誕的論說，對世界政治現實茫茫無睹的見解，都要借科學的名義做幌子。須知逆情悖理，並不一定便是科學。

地略政治之爲冒牌科學，不易察覺，因爲它的根源較深，且與十九世紀自然主義的論調吻合，這自然主義就是將達爾文文物競論移來適用於人事。這自然主義乃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思想的一個特徵。前面已經說過地略政治在歐洲的國際共同的來源。拉塞爾先倡『國家有機體』，把國家當做一個爲生存競爭的有機體，克介倫繼倡『國家是活物』(書名)之說。自然主

義，明明發端於達爾文物競原理，並頂了科學的冠冕，要把這自然物競公例應用到人類的關係上去。在『生存空間生物地理之研究』（一九〇一年）這篇論文內，拉塞爾借用達爾文應用於動物世界的名詞術語，光明坦白，毫不隱諱。

危險性乃在除非你否認人類意志的自由，專談物質勢力，『伸張空間律』，『有機體』，把地理當做決定國家生死之天神，否則你不能排出『科學家』的身分。此外，科學要預言未來，而祇有定數論，方能幫我們預言。在地略政治的思想，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霍斯何弗所絕對信仰稱引的一個人，他最清楚代表一種看法，把植物學應用及人類文化，當它是根生在『土』中，生由土死亦由土的東西。他的悲觀主義完全出於定數論，而定數論又出於自然主義。因為地略政治已在歐洲思想界及歐洲權力政治圈中根深蒂固，所以我們不能再把霍斯何弗的論說，當做德國一地獨出的畸形怪物。

因此，我們也不能說地略政治毫無道理；它自有一套自然主義的道理——強權政治或深山荒林野獸相殘的道理。如果我們接受自然主義，結果必陷於史本格勒式的悲觀主義中，無法掙脫。除非我們情願與強權政治和此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一刀兩斷，根絕關係，史本格勒的悲觀主義是不無理由的了，或許西方文明將永遠陷於戰爭中。

自然主義的毛病，乃在自然的東西太多了。深山野林，弱肉強食，在我們學者看來是很自然的。屠殺已成爲科學上自然的事。轟炸小學生也成爲自然的事。我們的自然主義已夠了

罷。不近人情，裝出科學的面孔，已不爲我們所不許了。

我們必須懸崖勒馬。除非我們對於許多人事起立信心，拆下假充科學的招牌，這個時代的文明必陷於不可收拾的田地。除非我們排斥造成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三九年洪禍的意識標準，把自然科學與人的範圍分別清楚，自然科學歸自然科學，人歸人，否則我看不出西方文明如何能免滅亡。有許多許多事情我們無法『科學的』處置，因爲我們絕對無法『證明』它，甚至於連衡量都不能。人類的平等就不能證明。世界合作的可能性也不能證明。我們只能信而行之。我們必須樹立人道信義，來替代自然主義的觀念。我們的真理觀真理標準都須改變。孔子的標準並不太錯，『道不遠人。人以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這是孔教給自然主義的回答。

地略政治家自稱爲『現實家』，這就是說他們不耐煩理想主義，我們當代許多人屬於頹喪派的時代，而慕尼黑好漢和其他妥協大家却被認爲『現實家』。替印度自由運動說話的人被人譏笑。呼籲肅清強權政治的人，被人譏笑。誰相信如果我們心正意誠，大家出力，蘇聯與西方民主國間一定能友誼合作，也被人譏笑，但是教導世人走上互相猜疑，均衡武力的血路的人，却自稱爲『現實家』。

歸根結底，這不過是自由意志與定數論問題，以及善意友誼能否改造我們人類世界的問題。人間和平，容我再說一次，祇能由信而行之。信心消失，我們便無法自拔。說到最後不過是這句話：耶穌『和平之主』，是不是一個大撒謊家，我們必須打定主意。

亡道篇第十八

此篇歸結上篇所引證指出科學客觀不加好惡的態度施於人事關係必發生危險及論人事研究上客觀之不可能

我們似乎承繼了近代思想的頹喪，末世的傳統，這些地略政治學的大教授們墮入其中，不能自拔。我們祇見地略政治及其信徒表示出來根深蒂固的冷酷態度，憑信強力與爭鬪的必然性，全然忽略道德觀點，最後，以驕威嚇人，主張為世界利益計，以龐大海空軍巡防天下各地。

如果教授的主張壓倒平民的主張而被採用——在西方民主國中，若干有權勢的社會及官場內，的確大有如此傾向的證象——那麼千萬美國男兒，又要在下次戰爭中流血。地略政治家自己也不敢說，劃一統霸世界後，世界便可和平。不過是說，英美必須磨利尖刀，永遠在世人頭上揮舞，以期鎮壓反叛。換句話說，在希特勒手中，武力不能成功，在英美手中，却可成功。如果這便是引導人類政治動作的明燈，前途正是黑暗，因為這就是說，戰後英美必以五萬架飛機二十萬飛行員來威嚇全球。可是如果中國人不怕，蘇聯不怕，整個世界不怕，那怎麼辦？出動飛機去轟炸他們？說得容易！

要流了多少美國男兒的血，才能壓倒中國和蘇聯，這問題從未鑽入飽覽羣書的教授的頭腦中。如果他們曾考慮過這問題的話，他們便不會再裝做科學家，而將不顧尊嚴，發洩明別是

非，深惡屠殺的感情。史班克孟教授已忘記上帝。他的回答是他所研究的是純粹的地略政治，而地略政治與上帝是風牛馬不相及的。我的回答是地略政治與上帝不應該風牛馬不相及，否則我們便是借了科學的名辱貶人類的心知。我知道我是一個異教徒，史班克孟教授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一個異教徒仍能相信上帝。我願意同這位基督教教授辯論此點。（按史班克孟教授於此書出版前三星期逝世）

這難題到處發生，須迅速予以解決。近代學界的啞謎——說若要『科學的』，必須排斥道德判斷，並且無法較量人情——換句話說，實行廢道忘義的學院式的觀點——這個啞謎，西方思想界須趕緊設法解決，否則影響所及，國際間大家亦必廢道忘義。天良喪沒，並不自下層開始，却肇端於上層；並非源於不學無術的低級社會，而是源於教育有素的智識階級。由此說來，我們如果希望有個太平天下，必須依靠紐約汽車夫的看法，而不可妄信這位耶魯大學的國際問題教授。

因為我們已漸漸迫近近代知識界的怪病。我責難西方學界廢道忘義。在自然科學中這種客觀評察，不加好惡的態度的確可嘉，但是應用於人文的研究上，便是簡直頹喪污邪的態度。我說這種背離憐愍蒼生之感的學府觀點，如在大學課堂中提倡，必生危險。我說這個近代思想趨勢，已產生了一個希特勒，而凡此種青樓道德傳播之處，將產生更多的希特勒。不但此也，我說這純粹的客觀態度，在自然科學範圍中很有價值，但在人文科學中，却危險難靠。我說在人

類的關係中，客觀的思想決不可能，而且根本沒有此事。因此，我說，除了生理學以及相聯的醫學人種學以外，如依真正自然科學的狹義講，人文科學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所謂人文科學中，科學的技術應用有限，須輔之以慧心靈眼，否則我們必遇大禍。世界問題，尤其是如此。此點下面〔說見化物篇二十〕還要解釋清楚。

我說這些話的原因是第一，事實彙集到手，在最後較量結論時，其取決去捨，是一種主觀的程序，須將種種非數字事實所能形容的心理精神因素估計起來。比爾德（Charles A. Beard）〔美國有名經濟史觀的權威〕的孤立政策，便是客觀方法失敗的一個證明。在最後衡量五花八門的事實時，決定你要採取孤立政策或反軸心立場，不但可以，而且必須放入感情好惡，否則我們便是污辱了上帝賜給我們的心智天良。

第二，在人事的圈圍內，心理的因素，決不能像電流或音波那麼用科學的儀器作準確的測量。蘇聯和中國的民氣，便是一個明證。如果有人收集事實不辭煩勞的話，德國當然是其中的一個。日本也是。當時形勢似乎對他們絕對有利；現在則不同了。德國人能弄錯的話，我們也能。

第三，我們對世事的估計，隨人而異，所以客觀決不可能。日本之為好戰民族，英國之為愛好和平的民族，在我看來非常有意義，但是在史班克孟教授看來，却毫無意義。日本民族窮兵黷武，性好侵伐，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和民主精神，這點分別，就應該作為我們在戰後決擇友

敵的憑準；但是史班克孟教授不以爲然，他祇打開地圖，察看地勢，注意英日兩國在地形上的酷似之點，而引起精神上的莫大興趣。誰是真正的客觀，誰敢說惟有他一人是不會錯的——而且惟有他一人高明？

第四，誰自稱能排脫偏見，便是自欺。私人的好惡，不能避免，史班克孟教授說中國與亞洲地中海（南洋一帶）的關係，彷彿美國與美洲地中海（加利比海）的關係。雖然如此，他覺察有建立強大的日本以制止中國的需要，却絕對不會提議建立強大的墨西哥以制止美國。這最後決定完全是感情上的偏見。

第五，這種法西斯蒂思想背後，潛伏着近代摩登學界的定數論。定數論時常產生不負責任的態度，似乎建立新世界，我們絕對無能爲力，無須白費心思。汽車夫有勇氣說：『這個世界永遠戰爭真不好，讓我們改它一下。』定數論的信徒沒有勇氣說這種話，祇能說：『世界不好，將來還是不好。』這種邪氣的預言，含蘊着智識階級的風味，但是於改造世界，並無裨益。西方學術與排斥是非良心，已經過分了。

第六，這個世界並不如冒牌科學家想得那麼簡單。英美如以龐大的軍方霸治世界，將產生什麼結果，最優秀的地略政治家也說不出。只有一點我們可以說得肯定：最大的壓力，產生最大的仇恨。人民反抗武力的威脅，權力產生腐敗（西方名言：『All power corrupts』）『凡有權力必腐化』；腐敗產生良心的責備；莫明其妙遣送美國男兒到新德里，加爾各塔去協助英軍鎮

壓叛變，中印蘇誓願爲炸彈炸成灰燼而必繼續抵抗；以非武力政策應付武力（這該把基督教國的臉頰羞紅，但是在事實上並不）；人民因繳納戰稅而不勝負擔，痛苦呻吟；甘薩斯省一個農民最後顯示出靈敏的直覺，說道，『什麼鬼道理，我爲什麼要替人家去巡防世界；』——這一切都是英美統霸世界後的必然現象，匯合而產出前次凡爾賽條約後反動局面。

倡導武力統霸政策的人，連這些道理因緣都看不出。不論怎樣，擴充軍備以壓制中蘇，美國必受良心的譴責，而精神上自覺理曲的弱勢，必遠在種族戰鬪的烽火燒及全世界之前，肇其端倪。

卷四 治道

當代篇第十九

此篇原名『當代之品質』言世事之變起於人性觀念之變並陳敘自由人權觀念之退步及經濟安全觀念之崛起

爲什麼這樣沮喪？很明顯的，人類的思想已經變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變了。人對自己的看法已經變了。我們對人類本性的看法，也變了，這一變，整個世界便陷於紊亂之中。讓我們用歷史來證明。

世界慘劇演在我們眼前，這時候我們似乎應該衡量時代的特徵，估計我們精神貨物價格的貶漲。我們已經覺得不敢再爲歐洲文明自鳴得意了。每次想到歐洲，我總想到德人吊死三個波蘭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掛了三根繩子，繩子一端縛住了波蘭人的頸上，身體懸空，較平時爲細長。我不管是德國人在吊波蘭人，或是波蘭人在吊德國人，我只知道歐洲人在吊歐洲人。那張相片乃是歐洲文明的批評，一個很深刻的批評。

你如果細察今古史開始一來四百多年的經過，若干名稱爲『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貨幣），價格或漲或貶，一定會使你驚異。不要忘記這次戰爭以前社會經濟的不安——民主觀念

之崩潰破產，大家只討個安全，尋覓生計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集團主義的興起。我們可立表解釋這歷史背景。

英	法	德	蘇	
國	國	國	聯	上
徵減	減	消滅	減	帝靈
徵減	減	原狀	原狀	魂自
原狀	減	消滅	減	由教
增	增	增	增	育
增	增	增	增	工業財富
增	?	增	增	社會福利
原狀	減	消滅	減	人
增	?	原狀	增	權
				經濟權

大致說來，上帝和自由的運氣最壞，教育和工業的運氣最好。此處值得注意，靈魂觀念在德國，一點沒有貶價，反之，還是德國戰爭機構內的一支原動力（即德國浪漫主義及玄秘主義之影響）。『自由』與強迫相對，代表人權，所以與『人權』相同，此處再爲人權劃立一行，不過是便於同『經濟權』襯托罷了。我們日甚一日的喜談職業的權利，收入的權利，保障老年失業安全的權利，皮弗利基計劃書內所述的權利，軍士回來工作的權利……而忘記自由之權，國家自主之權，個人之權。『工業財富』代表國家的生產力，而非指財富的分配。有財富而沒有分配的方法，對社會個人並無意義，不能算是進步，祇能當做一國的作戰力。老實說，生產力過大，往往引起市場的競爭，結果必因市場糾紛而作戰；所以大生產力對於和平有貢獻，抑

或有損害，還是一個大問題。興戰的人，總是工業國家，而非農業國家——日本和中國便是一例。生產力之大小與社會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關係，但是如果生產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會的不安。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老人家，連經濟學的原理，都說得中肯。

上面這張表，並不能代表整個歐洲的進步，因為大多數前進的國家，如丹麥、荷蘭，都沒有計算在內。在天主教國內，上帝總還有能保持地位的傾向；我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認此點。可是大致說來，這是一篇生意不穩固的結賬單，情形不可樂觀。上帝和自由已漸漸失去地位。因為如此，所以德義的人民都聽任法西斯蒂消滅自由，而連今日美國的通達之士，鼓吹經濟安全主義，遠較鼓吹十八世紀的自由觀念為熱心。

這有什麼意義？人的頭腦自然集中在這時代較急迫的問題上。一個人生了胃潰瘍，腦中祇有想到胃；我就從來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紀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所以十九世紀的人都談經濟，正像十八世紀的人都談理智，十七世紀的人都談神意一般。二十世紀的人只談安全，這豈不是一個惡兆？

經濟安全，儘管提倡；皮弗利基計劃，也儘管提倡。經濟的不安已在威脅資本社會；盟國現在作戰，我想，就是要保護資本社會。此次戰鬥的開端，實在是歐洲社會和經濟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潰；所以戰爭完畢後，我們當然要從那崩潰動蕩不安一階段，重復收拾起來，

並且現在就得替它計劃——這就是所謂「戰後計劃」，要點是保障職業，社會保險等。這些方案，把我們頭腦全部佔住，別的問題我們都想不到來了。我們從國內經濟一步跨到國際經濟，而把國際和平與出入相抵的國際貿易清結單，混為一談，分不清楚。赫爾一派的人似乎以為維持世界和平，不過是重訂關稅表的事，年終結算，如大家賺錢，友意，公道，自由，大同，都會一併源源而至。

數年來僑居美國，我祇遇見一個真正有頭腦的人——至少是只有一個人的和平觀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個黑人。數月前我在華盛頓聯合車站同一個黑人脚伕講話。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愴之色，他說他在中學內念過三年書。他每月賺一百五十元錢，要養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說話，因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說際此作戰時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壞。他說生活艱苦，他的妻和兒女都得出去做事。後來我們講起戰事。他黯然說道：「戰後情形也許可變好一點。但是我所不滿的，倒不是錢，錢少我不計較。我們要人家把我們當做人看待。」這兩句誠懇坦直的話，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種美國的皮弗利基計劃來安慰他嗎？但是社會待黑人的心理態度這一點，是我們所不能用數學解決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戰後計劃中完全忽略的一點。他們為了他的經濟權絞盡腦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權利稍費心思。他們以為經濟權有保障，他便能快樂了。

反之，他們都叫我們放棄更多的自由。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氣。經濟方策可以醫治

經濟病，可不是萬能藥。經濟進步產出病證的醫法，並非再求經濟進步使罷。人類總要繼續生存，要過合理安樂的生活。如果我們取得了勝利，而失落了靈魂，那怎麼辦？文明到底還須有個內容。

但是問題的究竟，還要深一層，直達我們思想的纖維，且與這時代的精神有關。我敢說這句話：依我們這種思想方式，我們決不能建立或計劃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趨機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詞已經變更。我們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簡單的舊名詞。用當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說，一個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句話，馬上就有人說他思路不清，說老生常談。這個時代，至少高級社會的人，簡直不相信這套東西。拿法國字 Fraternelle [博愛] 來看：有一個時期 [法國革命前後]，這字竟能在智識階級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們相信這個字；我們今日不相信它。這個時代摒絕了一切老生常談，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過久的小銅元。我們造了悅耳的新名字來頂它們。一個女孩子如仍用維多利亞式的名字若 Faith (信念)，Prudence (謹慎)，Patience (忍耐)，一定會被同學當做笑柄。教育家，傳教士，演說家往往都避用這些名詞，而代之以摩登名詞，如『精神價值』 ('spiritual values')，或『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s')。可是『價值』這兩個字，就用得奇怪，因為它的來源是經濟學。這兩字與賬簿有關，所以聽來悅耳，令人想起主婦買價廉物美的貨物 (稱爲『好價值』 'good values')。別的名詞的來源是社會科學。教育家稱娼妓爲『反

社會者』，稱賣淫爲『反社會行爲』。這些名詞有些怪味在內，似乎已經加過人造工夫把水份吸乾的味，而使我們覺得道德觀念已經剝的干干淨淨了。我們不再『感化』一個酒鬼了，我們使他『調整』使合乎社會，正像我們重新調整手錶機器一樣，甚或使他『適合』(“accommodate”)一個新環境都可以。一個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個『完整』或『分裂』或『不調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詞真愈來愈機械化了。一個政黨和一部汽車，都可稱爲『機器』(machine)。大衆的情緒是『反應』或『反響』，外交往來關係是『壓力』，流行的態度是『習慣的集體形態』。驕傲是『膨脹的自我』，誇張是『自衛機構』，批評是『發洩』，還有什麼(凡洩氣防險作用的)東西是『安全門』，而一個失業的人是一個『脫節』的單位。

以上所舉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詞，與個人的筆調無關。我故意不舉其他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用的學院式怪話，如『平均滿足價值的過程』，『情感的反應』，『意念作用的改造』，『聯繫的回憶反應』。事實很簡單：我們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斷，並且怕正常的感情。我們的道德倫理已有點像人造化學品，先抽出水份，製成精粉，才拿出來問世。可是如果有人對我說專談『聯繫的回憶反應』的心理學家能教育子弟，或專談『平均滿足價值的』的社會學教授能造福人羣，我便不相信。『美國學人』(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這種『教育法』，作者引了許多教員令人捧腹的佳話，而這班教員的任務，據說是教育青年子弟，啓發他們求學興趣。在美國學術研究會的心理學部門，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論文，題目

說：“The Reduction of Data Showing Non-Linear Regression for Correlation by the Ordinary Product-Moment Formula;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rror Due to Curvilinear Regression.” 一個學童對學習史地的興趣或天才的發展，有科學方法可以得知，祇要看 “An extension of the Kelley-Wood and the Kondo-Jilderton Tables of Abscissae of the Unit Normal Curve for Areas ($\frac{1}{2}a$) between .4500 and .49999 99999” 便一切明白了。遇見這種教書先生，我焉得不學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機器已替代了人；只須看這些機械式的名詞，我們便可知道，人類的頭腦已經改變；我們的血管內，已有人造血替代鮮血。我們必須先進科學的殞儀館，把人血取出，用人造血打進血管去，才可以做這時代的大學教授及教師。人的頭腦是一條『軌道』，或『單軌』或『雙軌』（“single-track mind”，“double-track mind”）。上帝是一個『重心』。只有一塊錢仍是一塊錢，除非它是五毛九分錢。

所以，在未瞭解我們自己和這個時代之前，必須先瞭解我們思想的根蒂，並研究我們如何養成了這二十世紀的思想方式。往昔的標準，為什麼變了？我們對人的觀念，為什麼變了？生命為什麼失去了意義？為什麼即使在衛護民主政治的戰爭中，我們仍變成犬儒，悲觀者，和硬到底的『現實家』？物質主義的信徒，必作戰到天地末日。物質主義的信徒，既不能結束戰爭，也不能建立和平。他們的頭腦不行。所以要問，我們為什麼變成物質主義家呢？讓我們先看自由的基礎如何動搖。我們將看到自由性質的改變，因為人的『權利』的觀念

已改變，而自由的基礎卽是人權。

但是我得先解釋清楚，四大自由中的兩大自由，並不是自由。其中一項，在我看來根本竟無意義。仔細研究一下，你便可知道，四大自由中有一項是混在隊裏爲僞裝自由，出自經濟的鬼戲。‘Freedom from fear’不是自由，而是治安安全。‘Freedom from want’不是自由，而是經濟安全。要實現這兩種安全，或許要犧牲人類的自由；而我們如果太重視軀體的安全，犧牲人類的自由〔人權〕，是必然的事了。最能給狗以‘Freedom from fear’及‘Freedom from want’之感者，乃是一條頸套。它的第二頓飯，是必有着落的了。籠中的鳥犧牲了翱翔天空的自由，而避免了遇見老鷹以及雪中挨餓的危險（用英文說是 Freedom from preying hawk and freedom from starvation in the show）。但是一頭故意飛入籠中的鳥，〔以求安全保障〕除非你施出詭辯絕技，不能說它是爲自由奮鬥。這都是英國文字的玩意兒（Freedom from 卽指『避免』，或指『消除』，與『自由』原義無關），‘Freedom from want’，‘freedom from fear’都不能譯成法文或中文。用法文說，‘liberté de misere’或‘liberté de peur’成什麼話？在英語同樣的名詞，還可以多加幾個。健康可以稱爲‘freedom from disease’，清潔可以稱爲‘freedom from dirt’，和平與平安可以稱爲‘freedom from telephone’……印度人或許會加上一個‘Freedom from England’——這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政治自由。所以談起自由的時候，我們必須拘守這兩字的原義，不加什麼‘of’，也不加‘from’。

——就是簡簡單單貨真價實的自由——人類的自由。人類可能擁有四大自由的全部——自由言語思想，安全吃飯睡覺——而仍做一個奴隸。

信仰自由對美國人有十七世紀性質的特別意義，同為十三州的人民，都是宗教難民，他們到美國去原是要爭得自由敬拜其所信的上帝。但是宗教的自由，在中國並無這種弦外之音；由中國人看來，宗教自由根本沒有意義，並不是中國作戰的目標。因為中國自古並無宗教戰爭或宗教壓迫等事（即偶有之，亦不及西洋之宗教壓迫），所以宗教的自由，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向來認為是當然的事；為宗教自由作戰，不啻宣誓為青天白雲作戰，要捍衛天之青，雲之白。言論的自由，曾數度被禁，中外一律，所以還有些意義。但是言論的自由，範圍不夠廣大，不及人類的自由遠甚。我不願因為衛護言論自由而同任何人作戰；我可以沈默，或用迂迴的方法說出心中的話，而可不致於落獄。我認為此次作戰唯一的目標，乃是維護大好的老自由，世上各民族的自由。這一點不容含糊。至於維護個人的自由，也不容含糊。

雖然如此，『自由』這兩個字在美國和世上魅力尚存。這就是說人民還信仰這東西——簡單的老大自由。它是一枚用得略嫌過舊的銅元，但是還不失為一枚好銅元。你不但能使美國人，並且也能使印度人，中國人，希臘人，黑人，芬蘭人鼓着熱情衝鋒陷陣，為它作戰。今日世界上大多數人就是為了這自由作戰。在我看來，下面這句話有些侮辱我們的戰士，並有些滑稽，幽默的美國兵一定也有同感。『殺日本鬼！殺德國鬼！早些回來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時，賺

七十五元錢，還有醫藥保險，加工工作，可給多一倍半工錢！』我的血溫並不因此增加。可見人類的經濟觀念一定有毛病。

但是『自由』的觀念是如何產生的？人類的權利是如何產生的？『自由』這兩個字從那裏取得這等動人的革命力量？須知這兩個字乃是由壓迫的而起反抗的呼聲。政治壓迫過重，『自由』兩字便添上激人的革命力量。巴得利亨利 (Patrick Henry) 大呼『不自由毋寧死』，呼聲直入美國人民的心坎，因為美國人民當時受到壓迫。尼赫魯大叫：『不自由，毋寧死，』羅素和安琪兒一班人漠不關心，因為他們自己並沒有受到壓迫。即使在美國人看來，這件事也無燃眉之急，倒不如外交禮節重要；寧可緘口不言，不可妨害兩國的邦交。為印度自由出而說話，犯了外交禮節，野蠻程度，不啻在華盛頓外交宴會上，請英國大使夫人坐於巴西公使夫人之下。……二十世紀人類思想中『自由』的觀念，已墮落到什麼田地，於此可見一斑。

十八世紀自由的觀念與『人權』的觀念同時問世。論理講，『人權』和『經濟權』在哲學立場看來，都是神話。這些本來都只是往昔與今日人類深信的東西。像上帝和靈魂一樣，這些『權利』是不能證明的。我們要到迫切時，便創設名詞，托之上帝，說是受之於天。這人權與『國王的神權』一樣，只是直捷了當不待證明的一句話而已。海尼稱國王的神權為『削髮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權也有個宗教根基，傑弗遜 (Thomas Jefferson) 認為人權是『不言自明』的東西，而且我們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這些權利『不可剝奪的』，所以在玄學上

說來，國王上帝都不能剝奪我們的這些權利。可是我們怎樣知道我們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們不過是相信如此罷了。可是盧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說法，早已爲科學所駁倒（盧梭言自然人本極自由，今日社會學否認之）。所謂人類「出世自由」，不過是出於熱情的信仰的一種說法，像「國王的神權」一樣，並無科學或邏輯的根據；人們如果預備棄掉它，祇消去其神道學的根據。翻閱歷史，便可知若干國家曾說起它們在別國的「經商權」，「貿易權」，同時主張別國在自己國內並無貿易或工作之權。征服國說起「擴張權」或「取得生存空間之權」；有人更進一步，發現自己有統治某地之「天命」。漁業國家則談起「捕捉沙門魚之權」。

同樣的，到了需要職業實在急迫的時候，我們將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權」，或取得薪水或養老金之權，甚或主張人類「出世便該有職業」，而有時候「出世便該有職業」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還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們將發明「出世便有一張購物券之權利」，「天賦有取得購物券不可剝奪之權」，並謂在玄學上，無人能奪我此權。根本上，這是我們放棄人權而覓取經濟權的原因。

於是精神的「價值」都消聲匿跡，剩下了一個真空。自由，平等，博愛，已失去了它們的救世意義。平等的原則已爲人懷疑。民主價值，經濟價值，安全價值，都攪作一團落在女巫的大鍋中，蒸出來一股帶着濃厚的獨裁味兒的臭蒸氣。鑽入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門的政治觀

念，而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都在黑暗中揮拳交鋒，打作一團，到底也不知道誰在打誰。史太林稱蘇維埃聯邦政府爲『民主國』，同時紐約『美國人』日報（N. Y. Journal-American）可能稱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爲『赤化』黨徒。至於貝當，他的政府無需政治觀念，既非法西斯主義，又非社會主義，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獨裁者，更不是總統。他就喘着氣說：『工作，家，國！』不，歐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舊道德，舊觀念，已經消失了。

正在討論自由之性質以及觀察人類自由的觀念已否改變的時候，我們驚覺一個更嚴重更基本的局勢，這局勢來的神不知鬼不覺。這就是，原來意志的自由已失蹤了。除非我們能恢復意志的自由，就沒有力量恢復人類的自由。除非我們能恢復人類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爲什麼失蹤了？

化物篇第二十一

此篇言明現代機械心理之所由來推論人文科學變用自然科學之結果及指陳自由意志人生意義爲唯物觀所消滅

我們姑且這樣說：強權政治是火藥政治，火藥政治結果必定出於爆炸。強權政治與勢力的均衡，有如兩支炭精，漸漸自兩端湊合。機器前進，蓄力漸增，最後的爆炸力必大。現在這個時期，強權政治之爆炸，必遍達全球。玩弄強權政治，就像玩火，同時，我們道德發展却落在背後；我們的思想是國家化而不是世界化的。現在我們認識，世界政治乃是強權政治，這是我們唯一所知、唯一能實行的政治；毫無疑問，不管權力的集合如何變化，我們總在向更大的戰爭衝突邁進。我們對此形勢所恃的態度，祇是說命運如此，無可奈何。我們須承認，我們的政治家都是強權政治家，我們的戰爭行爲與和平觀念都是以武力原則爲根據。我們相信武力仍將橫行天下。史班克孟教授大概說得不錯，戰爭結束之後，我們要繼續舊工作，世界政治仍將以武力爲基礎。如果我們接受這話，必促成更大的戰爭，直到最後一個暴君出而竊持天下爲止。或許未到這個田地，歐洲文明便早已瓦解。

但是如果你問，強權政治之結果既已昭然若揭，爲什麼還要繼續玩弄強權政治，答案是我們的人生觀已趨機械化——我們的生活觀念已含有機械的必然性，雖想阻止它，却是無可奈何，只好聽之。我們吸收之自然主義，相信國家生存競爭之說；我們跳不出物質主義的背景，

我們在無意之中借取了受機械公例所統制的物理世界的定數論，移用成爲人事上的定數論。這些觀點都帶着『科學』的氣味，所以自有其尊嚴。於是強權政治不托庇於神權論，而托庇於科學的門下了。如此一來，政治的『現實主義』，便是明晰的科學思想；帶有感情的理想主義，便被人說是『低能兒』的見識。這種機械化的人生觀，結束當然是絕望：說來說去，人的社會原是一座荒林，大家爲了生存戰鬪，這不啻是說：『我們情願爲國家爭取權力，而作生死之鬪，開着眼步入地獄，決不願做夢想和平天堂的傻瓜——人自爲戰罷！』

今代人的思想，怎會弄到這個田地？心理分析家叫病人回想童年的事，在靈魂的陰處尋出挫折，凝固，和錯綜的起源，俾能了解自己。回憶過去的事，容易維持客觀的立場，並了解個中真況，瞭解個中真況，則能自我解放。我們且回顧過去數百年的事，這對我們一定有益，而今日的世界，亦可藉此瞭解自己。我們怎樣變成自然主義，定數論，和物質主義的信徒。

科學的摧命手抓住了西方，科學或客觀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進了自然主義，定數論，和物質主義。所以說，科學已毀滅了人道。自然主義（信仰競爭）已毀滅了行善與合作的信仰。物質主義已毀滅了玄通知遠的見識及超物境的認識信仰。定數論已毀滅了一切希望。

我敢說我不會觸犯自然科學家；反之，他們一定同意我的話，而大聲抗議說人家偷了他們

的觀點方法應用在錯誤的地方，他們不能負責。自然科學與人的問題，其中界線應該重劃，兩邊的真理標準亦該重定。科學的對象是實況，人類問題的對象是是非，雙方不必彼此抄襲技術。科學依其定義處理『精確的，分立部門的智識，』而有一大部的人類知識無法精確，難立部門。如果科學及其玻璃管化學材料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爲什麼歡喜你』，人類關係的問題，又怎能解決？

可是我們却把自然問題和人的問題混在一起了，結果產了一個危險的局面。自然科學家僅僅說道：『上帝，自由，善性，並不是精確的問題，不在我研究範圍之內。』但是非自然科學家的人文教授說：『上帝，自由，善性，都在我的範圍之內，但是不能以科學方法研究，而我是一個科學家，又必要做科學家，所以我祇能置之不理，另外尋取機械律。只有這樣我才能夠得上前進的標準而保持我的飯碗。其次，科學既然不能發現上帝，靈魂，和人類的善性，或許它們並不存在。』由此愈來愈亂了。自然科學家說：『我的興趣，只在事實上。』只有被迫研究人的價值問題，而企圖模仿科學技術的不自然科學家才說：『我的興趣也在事實上，上帝，自由，靈魂，都不是可以證明的事實。我們沒有方法應付它們，所以只能置之不理，除非它們有一個物體。』自然科學家說：『我測量電流，音波，並畫圖線。』非自然科學家說：『我也要測量，也要畫圖線。我要測量希望，理想，意念，上帝，自由，可是不能。但是我測量人口，生產率，糧食的供給，刺激的機械反應，詩句中的子音母音，進出口貨物的數字，以及物

質環境的影響。我成爲科學家，希望全在這條路上。」

人事的研究既非成爲『科學』不可，我們祇能專談科學技術所能解釋的物質因素；而科學也祇能在物質世界內周旋。十九二十世紀學界最顯著的貢獻，都是關於物質因素的影響，譬如說，亨定頓 (Huntington) 論氣候與歷史關係，馬克斯 (Marx) 論職業與觀點關係，倫波洛索 (Lombroso) 論遺傳與性格關係，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論民族與歷史關係，威斯特瑪 (Westermarck) 論環境與倫理關係，還有德國某醫生論目力與天才關係，而將來如有歷史家證明非洲蘿蔔根與拿破倫戰爭的關係，或有先知證明營養與道德之關係，或 Ribotarin (維他命 B) 與樂觀思想的關係，我們不會覺得奇怪。這是多麼摩登，多麼淵博的發明！上面諸人對人類思想貢獻不可謂小，有的很具卓見，有的也可嘉納，但是他們的靈眼都似乎患斜視偏視的毛病。

所以在過去一世紀內，智識界的動向一直照着襲用自然科學的技術，不難明白。但技術一變，宇宙觀也必變，結果是產生了對人、對歷史、對控制人生力量的唯物觀念。每個學術上貢獻造成這偏視斜視的局面，個別的影響雖小，但是匯合在一起，却有移山倒海之力，我們現在便看得出。

因此便產生尼布爾 (Niebuhr) 及蘭克 (Ranke) 的搜尋及考核史實的方法，比爾德 (Charles A. Beard) 的經濟史觀，翁脫 (Wundt) 的生理心理，華生 (J. B. Watson) 的行爲心理學，

左拉 (Zola) 的『實驗小說』，特拉塞 (Dreiser) 及法雷耳 (Farrrell) 的驗屍態度的『現實主義』，藤恩 (Taine) 的文學批評，里南 (Renan) 的『原始』研究，孔德 (Comte) 的『社會物理』，馬克斯的『唯物辯證法』，某學派的詩學『本體批評』，研究院中的比較文學的『比較』和『研究』，弗洛依德的亂倫錯綜，心理分析學的在小腹部下搜尋靈魂。我們的種子如果沒有屁股座位，整個心理分析的組織便要破滅。而且代表這全部瓦解的象徵，有愛略特 (T. S. Eliot) 的私人辭典，喬易士 (James Joyce) 的自剖和展覽主義，史突文斯基 (Stravinsky) 的逃避和諧，畢加索 (Picasso) 的逃避美觀，達理 (Dali) 的逃避邏輯理性，史泰恩 (Gertrude Stein) 的逃避文法。在世界政治內，有史本格勒 (Spengler) 的『文化形體』，霍斯何弗的地略政治，赫爾的經濟萬靈說。其在這次戰事，我們可見應付北菲和亞洲的問題，缺乏道義原則。這每一種趨勢，都含有『科學』的氣味。但是斯文掃地，而人生意義，除了保吃一頓飯，已等於零了。我們所能得唯一的呻吟聲乃是：『不安全，毋寧死！送我到監獄去，不成問題，祇要給我一張飯票！一張養老保證券！』這在革命家看來是多大的退步，同十八世紀人的勇往直前精神比起來，差別多大！

原來人研究物質太成功，自己也變成了物質的一部分。人性的觀念，已經變了。『思想』的力量已為歷史所否認。瓦片的研究，已替代了歷史上愛憎仇恨人情幻變的研究。我們量了特洛國時代的破磚石的尺寸，便覺得增進瞭解或考核荷馬的程度。歷史家研究埃及女皇的宮房夜

壺，興趣大於研究她們的宮闈祕史。收集事實，考核事實，這兩項工作一直繼續下去。一個歷史學教授可以一手拿了一只破古鐘，得意忘形叫道：『我們懂得歷史了』。

搜尋考證事實的工作繼續不斷。歷史家測量瓦片，教育家測量人的智力，犯罪學家測量人類的腦殼，心理學家測量我們的感情反應，地理學家測量雨水的吋數，地略政治學家測量高加索的油量。如果瓦片能夠解釋，歷史亦可立足，如果知識的單位仔細的測量，教育便成功；如果腦殼，下顎，耳朵，測量過，犯人便可像一架洗衣機般為我們瞭解；如果感情反應研究得法，人類的靈魂，智力，想像力，意念，慾望，癖好，都可明白；如果雨量算出，文明之盛衰便有解釋；如果油源在握，勝利必屬吾人！

人呢？他已變成旋轉不息的機器中之一原子，為某爆發過宇宙的隕石餘灰所造成。腺，血管，流質，組成了我們的身體，機械化的阻抑，交替反應，錯綜，組成了我們的心機。內體的飢餓，我們知道得很詳細，精神的飢餓，我們一無所知。慾望乃是體中衝動，我們對它無法節制，正如我們沒有力量改造我們自己腦殼的形式。人是一個化學混合物，由身內的分泌物和身外的環境勢力所變化而成。那飄渺莫測的靈魂，無形無色，無法研究，受人冷落，已鼓翼而飛，不知去向。彩虹已經解剖得乾乾淨淨，孩童時期的好奇心與幻想已經逝去，世界已同我們一起轉變灰色。

霍金教授有一段文，可算為現代文章內最玄通知遠的一段，說得甚好：

「不足爲怪，科學在全勝利之後，已射過了它的目標。科學家現在不說：「在我們的實驗室中，無閒談論世事的目的與價值。」而實際上等於說「我們已把目的和價值推出宇宙之外。」這樣大刀闊斧的手段，倒也覺得爽快：虔誠信教說道的人不敢再妄談上帝的旨意。只要科學專事研究星球與原子的話，這人道價值的幻滅，並不會使人衷心不安。

「但是有一個時候，科學必須把自己訓練有素的目光移轉到有生命的東西和人的身上。心理學家和社會學的學科，應運而起，如熱帶的太陽一般高昇，繼承科學衣鉢真傳的方術，富有新生初期的猛勢。心理學變成感情思想的物理學；人變成了事實與公例的現象。這樣一來，自由有些立不住受不住了，因爲它們把人體不多不少整個的配合在數學上完美而可計算的物質定數的範型中。但是到底我們必須承認事實與方法的聯合勢力；人雖未能真正擺脫自然的公例，卻仍可保持自由的感覺。大家總是如此假定。

「起初沒有人注意到：人已變得毫無意義。人變成了宇宙大機器的一部份，這部機器已經整頓修理重配過，而把原有潛伏的舊價值已丟在塵堆內。宇宙並不向什麼地方走去，只是在走罷了！如果整場戲沒有意義，那麼人這一部份——在它自己看來如何？姑且不論——也不過是一樁事實，雖是一件複雜有趣的事實；卻也不過是一個曇花一現的事實——連人類的各種文明建樹，都不過如此。人生這幕戲在扮演時，也許能自覺得活靈活現。但是真

歸還得打個算盤總算一下，而總算結果，人生意義等於零。」(註)

始終沒有人充份指出，希特勒的倫理和政治與這一世紀半以來的歐洲發展有關。也沒有指出希特勒頌揚離常（壓制理智，頌揚原始觀念），同史突文斯基（Stavinsky），史泰因（Gertrude Stein），達理（Dali），愛白史坦（Einstein）的頌揚離常（即反對理性）巧合。老實說，這趨勢可以追溯到浪漫運動的反理智呼聲，尼采的蠻意復位運動，諾兜（Max Nothay）用剖屍方法所描寫的十九世紀狀況。任何分析，如把純粹思想的來源看做只限於德國，而不把西歐文化普遍衰落的因素算在裏頭，便是自欺。人生意義的零點已經抵達：一輩科學家已把知識空氣中的古道古風肅清；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倫理夕陽返照的紅光已經消逝；在歐洲的心中，人已變成一個機械式的動物，在盲目的物質勢力所指使的盲目的原子混沌中作個困鬥。希特勒不過是信步走入這人道蕩滅的空野罷了。不然，「希特勒從何而來？」這問題永遠不能解答。

我曾說過：

「我們可以證明，天下騷動是科學的物質主義侵入了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的直接結果。人文學科的大教授們已降低到尋求機械律以解釋人類行動的田地。愈證明「自然律」之精嚴，及自由意志論之荒謬，教授先生也愈自鳴得意……科學的物質主義必產生定數論，定數論必產生失望。所以悲觀者成爲今日最受人崇拜的人——並非最偉大，而是最負盛名的人

(註) William Ernest Hocking: What Man Can Make of Man (Harper) pp. 31—32.

——實不足爲怪。今日國際間的紊亂，是發源於哲理上的悲觀。」(註)

也許強權政治的世界，借用佛家語說，不過是『夢幻泡影』。也許人事的定數論不過是海市蜃樓，我們造來自欺的。也許權力衝突和敗滅的必然性，也不過是這種夢幻泡影，我們在機械律創立了不到一百年後，暫時迷失在其中。也許我們能改造這世界。這是不是佈道？不，這是祈禱。

不然呢，也許在這世界上，權力將進而爲集團的權力，衝突將進而爲規模更大的衝突。民主政治，貴族政治，君主立憲的政治，政治學已爲人所知；世界政府的政治學尚未出而問世〔參見窮理篇二十一〕。世界民主的基本學理，尙未建立，此學理原則應該與一國的民主政治原則相同，以民意爲基礎。現此的世界聯邦勢必成爲富戶政治或富國的寡頭政治 (plutoeracy or oligarchy of the rich)，其不穩固亦不亞於一國中的寡頭政治，受治的人民必被分成兩級，一級是公民，一級是奴隸。這種政府必以武力強迫，不以受治者的同意爲基礎；天下將有大規模的反叛流血；寡頭政治的強國，自相拚命並與受治者爭鬪後，精疲力盡，那時候必有一個暴君起而代之，獨霸全局。歷史上每逢革命混亂的時期，總有一個暴君出現。寡頭政治的國家在戰爭中弄得精疲力盡後，必有一個世界暴君出而討好大眾，統霸世界。這是不是預言？不，這是警告。

(註)拙著『中國與印度之哲理』，五七四頁。

但是我們的若干領袖，誤解了世界衝突與這次世界革命的性質。最大的問題——帝國主義對抗世界的自由——仍爲人所忽略，未得解決。有人以爲他們能同時替帝國和替自由作戰。邱吉爾在步着波里克里斯的後塵。站在帝國立場上看來，英國再也尋不出更出色的首相。他一人兼有克萊夫勳爵 (Lord Olive) 和海斯丁 (Warren Hastings) 的堅決果毅，威廉庇得氏 (William Pitt) 的意志集中，狄斯雷里 (Disraeli) 的圓滑靈敏；在舉國手足不知所措的時候，他一人出來以鐵一般的意志團結人民；在危險的時際，他卓立不移；在叛變爆發的當兒，他顯出堅決的力量；在人民信心低沈的時候，他又恢復人民對大好的大英老帝國的信仰。但是庇得，狄斯雷里等人在十八十九世紀固能守先待後，勝任愉快，在二十世紀未必能成功。邱吉爾看錯了時代的潮流。這不是惡意的批評！不，這是友朋的諍言。

如果我對邱吉爾並無誤解的話，我說他從事於二十世紀的戰爭，不過是要想在戰後脫去大皮靴，爬上十九世紀的大牀睡覺，牀墊舒適地舖在印度，星加坡，香港上面。他有英國獅子狗可羨的堅忍不拔性，也有它的聰明，照帝國的標準看來，他是一個偉人；照未來的較好的世界看來，他不過又是一個克陀 (Carthago) 古羅馬參議員 大聲喊着：『Delenda est carthago!』『必須打倒迦太基』北非強國，羅馬勁敵。他甚或會變成小斯及比阿 (Scipio the Younger)。但是當隆美爾和蒙高茂來在突尼西亞爭奪迦太基的時期，我似乎覺得布尼戰爭 (Punic War) 羅馬與迦太基大戰 又發生於今日了。我覺得這有點像第四次的布尼戰爭。今日或許有一個漢尼拔會

出來拿坦克替代大象，自西班牙進攻義大利，但是地中海主權的爭奪戰原來不分時代，今古相同。戰爭的原因及實質是不變的。

齊物篇第二十一

此篇先指出今日科學思想進步物質觀念根本改變正足爲今日之救星爲唯物主義找一出路繼以老莊解恩斯坦明相對論哲學發展必趨之勢

現在人家說這個時代是物質時代，我們懂得什麼意思了。孤立派的人責怪華萊士副總統提倡『給胡頓脫族人一天一瓜脫牛奶』（即指使野人可喝牛奶爲和平世界的目的），實在是冤枉他；其實今日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走上了這條路。我擁護華萊士和世界合作，但是並不擁護『一瓜脫牛奶』。在這時代，最美麗的和平憧憬，乃是一人每天得一瓜脫牛奶，尤其是消毒牛奶。提高人類的生活水準，乃是我們最大的理想。我們似乎在說：『每天給一個人一瓜脫牛奶，他便會做一個好人，正義的人，自由安樂的人。每天給這世界一瓜脫牛奶，它便會變成一個好世界，正義的世界，自由安樂的世界。所以只要有足夠的母牛和青草，和平的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今日銀錢商已把上帝的廟宇轉成一個股票交易所了。五金的氣味和黎巴嫩香木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耶穌曾因爲這個緣故而抽鞭打人，大發雷霆。奇怪的是，耶穌教徒對此毫不在乎。我知道任何地帶的人民，不論是否基督徒，都有一個人生處世哲學；若無道德傳統，沒有一個國家能生存。中國人相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基督教國內之人民的道德傳統便是基督教。但是這個世界，正在動蕩；科學的物質主義已在動搖基督教的基礎。基督教與政治商業無

關，而今日決定我們生活形式者，乃是政治與商業。今日世界的一重公案，乃是信仰對抗無信仰的公案。

須知尋求信仰，乃是大家的事，因為在這信仰消失，在混亂黑暗的世界中，科學家與傳教士同樣受到影響。輪船觸礁，工程師與火夫共同罹難。科學家應該注意信仰問題，與傳教士應該注意科學問題一般，因為兩者都在探求人生的意義。當代人第一急務，是利用聰明，恢復人生的要義。

彩虹已被解剖，童年的好奇心和幻想已消失，世界已和我們一起轉成灰色。但是好奇心真的消失了嗎？世人不懂科學，正像他們不懂自己每日所吞的維他命丸一樣。一個大科學家的好奇求知的心決不會死去。須知今日領人賞嘆這神奇世界的，還是科學，求知之心只引起更大的難抑制的求知之心，學博則心虛。今日只有偉大的醫生才會對你說他不知疾病是如何醫好的，祇有偉大的科學家才對你說他不知道物質是什麼東西，何以如此旋動變化。事物變化過程之研究，並不能幫我們探討宇宙之真因與用意。科學家研究蝴蝶翅膀上的顏色，祇把問題弄得更複雜；電子顯微鏡照出翅膀上的小摩天樓，樓板的高度與紫光或藍光的光波相比。科學不能說給你聽誰造了這些細微的摩天樓，或誰叫蝴蝶生這些摩天樓。適於生存之優者之所從來，今日較往日更爲難解，達爾文的『偶然變化論』 (chance variations)，聽來不合理，而不能存在。今日教我們謙虛存心者，還是科學。將來科學與宗教之重歸舊好，必靠這『謙虛』二字。

不寧唯是，科學毀滅了物質，所以也在毀滅物質主義。科學研究宇宙，原一數學開始，現在卻把宇宙歸還數學。聰明的科學家已經幾乎把物質擺開（指普通物質觀念）。他把流質，硬質，光，色，味，音，以及其他物質的品性，都化成數學方程式——除了數學方程式之外，他認為別無所知，別無可知之物。一只立體的桌子已變成了空間；一個原子是像半里長的迴力球場，球場四周無牆，小球在裏面滾轉；一個分子是像許多露天的迴力球場，球場雖然緊連，卻看不出什麼壁牆；一團物體，不過是行動（電力作用）的『場地』（field，專門名詞，或可譯作『範圍』），小球既無體積，也無體量。物質已如經幻術突然不見了，而物質律在此宇宙萬物內的核心〔原子〕已不生效。宇宙與其說它像一架機器，倒不如說它像一個鬼。科學家已不及股票交易所內的商人那麼『物質化』了。

物質的舊概念消滅了後，十九世紀的機械宇宙觀也必隨着一起消滅。很巧，傑恩士爵士（Sir James Jeans）在新著物理與哲學（一九四二年出版）內也談到定數論與自由意志的問題，因物質觀念之變化而受影響。雖然他的態度是極端『科學』的，不敢言定『物質主義』和『定數論』的結果，祇說這是術語名詞的問題，但是他仍說：

『新物理最低限度已證明，因果律和自由意志的問題，現在需要新的說法……古典物理似乎阻塞了通往自由意志之門；新物理無此趨向，反之，卻證明那門是可以打開的——祇要我們能找到門柄。舊物理顯給我們看的世界，與其說像住宅，不如說像監獄。新物理顯給

我們看的世界，似乎可以作爲自由的居所，不僅是無知動物棲身之處——住在裏面我們至少可以隨意所欲，安排事業，人生在世，可以奮勉有爲，建樹功德……〔不論我們仍稱物質爲『物質』與否〕，新物理不論如何，與維多利亞時代科學家的血腥觸鼻的『物質』和咄咄逼人的物質主義，不可相提並論。他的客觀的和物質的宇宙，今經證明，幾乎不過是我們心知上構設出來的東西。在這方面及其它方面，新物理已向唯心主義(mentalism)的路走去。(註)

十九世紀科學的物質主義和達爾文式的自然主義，影響了人類的思想，終而產生政治和經濟的物質主義。今日科學排斥了物質的舊概念，也必影響人類的思想，使物質主義的價值傾跌，而完全改造這時代思想的機械性。有一天我們總必談起道德行爲的『場地』(“field”)，歷史發展的『時空間流型』，流(“time-space continuum”，相對論名詞)，沒有一點物質的成分在內。在這種世界內，只有沒有體積，體量及重量的『意念』，才算有真實性。人的心思，必反照他所認識的宇宙。科學已在把這世界精神化，但是要產生哲學的影響，尙費幾十年。

但是科學不僅已毀滅物質的傳統概念，並已產生相對論。這相對論在哲學上的含義，要到幾十年後方能明白。相對論乃是借數學通往玄秘主義的路徑。由窮研時間，空間，及動等觀念的究竟，他把這些觀念的基礎動搖；他相信或假定，空間是圓弧的，而時間或者就是我們心中

(註) 其恩著· Physics and Philosophy (MacMillan 1943) pp. 215—216.

所加於行動的形容法——兩者在數學上皆可與『動』互換的——這樣一來，相對論便引我們接近萬物消長起伏之理了。

現在我們對宇宙脈搏〔萬物起伏之象〕，已較前明瞭了。直的線，方的空間，直的時間，都繼『地方』之說破滅之後，爲科學最後所擊破的俗見。宇宙若非無涯，一定作圓形，所以天下決無直線可言，因這條線必在無形中略彎。大致說來，我們不懂宇宙之圓，正如兩只螞蟻在威斯康遜附近沿着二條平行的經線蠕行，不覺地球之圓一般。地球既作圓形，遠東實卽是美國的遠西，一個愛斯基摩人如向北直行，必抵澳洲或紐西蘭。宇宙既圓，其中一切方向體形，也必如此；地球在宇宙中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罷了。

所以在宇宙中，什麼都是圓形及圓形的變體。若要描繪世事人生，任何『圓體派的畫圖（'circulist'，——新創語，與'cubist'相對而言），都較立體派的畫圖正確。立體派在科學上是錯的，連光線飛馳都是依波浪形式。在立體派畫圖的尖銳直線上，我祇看到了現代精神的生硬冷酷。

所以良史之才描述歷代興亡人事進展，也只能依『循環』之跡，明其起伏交錯之象。中國道家哲人透識此理，整個陰陽之說便是基於現代所謂『波浪』之理。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愛默生（Emerson）在『循環』（'Circles'）一文中，也闡明此人生至理。宇宙中之至奧，乃萬物循環起伏，復歸於一，如莊子所言『齊物』之道。地球既作圓形，東西南北卽失其意義，同樣的，

在這『齊物』的相對哲學立場看來，生死盛衰，強弱大小，是非堅白等分別，都是相對的。

故冬令實起於夏至，自此以往，日漸短夜漸長；夏令實起於冬至，自此以往，日漸長夜漸短。此消長起伏，見微知著之理，乃儒教易經之基礎。由於『幾微』至於顯著，故賢者能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一起一伏，一消一長，故花盛必衰，權大必削。前輩後代之間，非截然如一串香腸接連起來，而是前輩正壯之時，下一代已經出世，如同女人身體之曲線，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一代一代思潮的起伏交替，情形亦然。一切生命都是像一個人站在海邊察看的波浪：浪似激進，卻是後退，浪頭未倒，水還上昇。

由此一切絕對概念，是非堅白，皆爲有識者所鄙夷。這個哲學，打破了歐克里特的數學（Euclidean mathematics）。相對論不僅是解釋宇宙的數學公式，也是一種人生哲學。科學的進步，到了最近方見到相對論的面目。但是在數千年前，道家先哲，特別是老莊兩家，跨越數學，單憑慧眼宏識，便已先見到相對論的哲學上意義——即一切等差之相對性。

下面這些話，可以算是莊子相對論的梗概：『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秋水）一切標準，都是相對的。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

矣。』(秋水)

所謂『差數等矣』，便是說一切標準的相對性，雖未明言，而一切分別全憑觀者立場之意甚明。高低之分別也同歸消滅，最低點卽上昇之起點，最高點卽下降之始點，所以以哲學眼光看來，最低點最高，最頂點最低。故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所謂『彼』『此』，亦是相對的：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已矣。』(齊物)

於是『天鈞』得以成立，而平行線可以相遇了：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齊物)

是故，一切是非皆混沒，一切等差皆通一，一切然否皆隨人而異。『物化』(莊子所言)成爲萬物生死輪迴之一部。井蛙擅一壑之水，自稱至樂；河伯見秋水灌河，欣然自喜；夏蟲不知嚴冬而語冰雪；學鳩自謂飛之至也，不知鵬鳥何必飛翔九萬里；彭祖壽長八百，心中自豪；鷓鴣得腐鼠，當爲至寶；小人稍得權勢，躊躇滿志。所以先賢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懂得一切標準的相對性以及生命之韻律，世上的爭執以及強力之愚信，必可煙消雲

散。知乎此，故人安排去化，相造乎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勞，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註)

人類的思想智慧，必須如此柔化一番；物質的機械化的信仰，以及死板的絕對概念等粗劣俗見必須摒除；一切事物，必察其起伏終始，交錯波瀾，而欲如此，必須具有遠大眼光，然後直者見之爲曲，而曲線成爲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大自然是優柔，作『S』字形循着波形的曲線，故得迂迴前進，不怕障礙。大自然以曲故達。妄信武力和直接行動的人，自以爲明理，卻實不諳自然之道。老子說：

『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

像希特勒這種妄信武力的人，總取直接行動，與自然之道相背，結果一遇障礙，便無法轉身避脫，而至滅亡。舉出老莊，希特勒和未來的希特勒便見得粗俗可笑。凡強力的組織，不論是何人造的，必歸滅亡。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註)拙著『中國與印度之哲理』，六五九頁。愛默生論『循環』文，值得仔細研究。他推究生命之韻律，以及應付『無爲』之難關，與莊子極像。他是美國第一個相對論家。

現在很明顯了，這相對和『圓體』的哲學，針對着西方傳統的絕對主義，自然能在人生觀上發生驚異的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受其影響的程度，竟使西洋人稱爲（“ways that are dark”即 Bret Harte 語）『行事怪誕』，你信循環主義，或信西方板直可笑的絕對觀念，竟會產生這麼大不相同的人生觀，似乎奇怪，但是事實如此。這不同的觀點，影響了你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左右你應付禍福的態度，以及觀察政治和平的方法。

第一個結果是革除（納粹）『鵝步操』，學習循『S』曲線行走，如溜冰一般。你應付世事，就想多轉幾個彎，凡事不欲居先，避開世人眼目；但是卻多一層含蓄，遇到緊要關頭，能泰然處之，因爲你知道『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你學會稍爲圓滑的做人方法；你知道人家佔何便宜，但是心中非但不怨，甚至略帶樂意，因爲你知道歡喜佔人便宜的人，結果必弄得孤零無助。你對一班莽漢，會養成極大的耐心。

相對哲學的第二個結果是，到末了你也必承認老子弔詭之言。自莊子的一切齊一境界，你必進至老子的一切顛倒境界。你將對權力霸道失去信心，而採取『柔弱勝剛強』的觀點。你將採納老子下面這些弔詭之論，領略一些老子的幽默：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第三個結果跟着第二個結果而生，乃是你培植了輕視武力侵略的態度，因為最強的軍隊，總首先潰敗，希特勒拿破崙破崙便是一例。古諺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大自然是柔和的，循着曲道前進，妄信武力和直接行動的人，簡直是連他自己身居其中的宇宙公例，都不懂。所以老子說：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我毫不懷疑，老子解決大小國間之關係及和平問題的建議，乃是唯一合理，能以持久的建議：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天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欲，大者宜爲下。」

在真正文明的和平條約中，「開戰之罪」一條是不應該書錄的。照老子說來：

「和大悲，必有餘悲，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在和平會議中，祇有雙方各認過失，方能產生永久的和平。

最後一個結果，乃是認識生命的循環律後，人便希望與宇宙合一，順道而處，如是則可不至敗亡，而達到能知天命的宗教境界。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湊巧得很，老子由這種針對權力論的世界觀，立場竟和耶穌完全相同。相同之點，不僅在『勿以怨報怨』，在以下這些真正的宗教概念，也可看出：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既以爲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已愈多。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不知怎樣，宇宙間的道德至理竟在小亞細亞和正亞細亞分別發現，而完全一致。兩者都好弄玄虛，其奧妙精微處，恐非好操鵝步的科學化現代人的科學家所能領會。

老子說過，飄風不終朝。近代文明是一陣飄風。祇有把人類思想挫其銳，和其光，方能挽救文明於萬一。德行的贅瘤，道之所惡，必須割除。

窮理篇第二十二

此篇借希臘先哲之口研究世界政府之基本原則

我們討論自然界問題，已經很遠了，現在應該回家，記住我們自己是人。今日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乃是：我們是什麼？人是什麼？

孔子聽說馬廐失火，他祇問有沒有人受傷，不問馬匹。我是一個重要的人，祇要此後能天下太平，就是全世界各類的貓狗馬兔死盡，也在所不計。這話有些東方異教徒的色彩，但是有些人頭腦也幾乎像我一樣狹小，他們雖然愛狗，然對人類大同的觀念，卻一無所知。我深信馬的思想，亦必如此。白馬效忠於人，但鄙夷棕色馬，棕色馬則鄙夷花斑馬。馬的愛，我知道，最爲膚淺。最意想不到的，皮膚顏色竟也成了馬類中間的分裂因素。同樣的，一條英國狗對人龍效忠，但是卻瞧不起他的兄弟愛爾蘭狗，因爲它的尾巴光潤筆直，而它兄弟的尾巴的毛太零亂，竟有些像鬍鬚。西洋人笑中國人的高額，杏眼，中國人笑西洋人的胸膛長毛。

但是今日這種事已不是開玩笑的資料，我們這個時代強迫着世界生活，還帶着古時的曾族特徵，和英國狗蔑視愛爾蘭狗的種族偏見。我們隨便談論世界合作，世界政府，那知道新問題的複雜，不僅是範圍廣大，就是性質也全未了然。

或許亞理士多德的『政治』（書名）已夠應付局面了，或許還不夠。但是假使今日的亞理士

多德研究世界政府所產生的問題，他必先深籌熟慮，探討基本的原則。亞理士多德就是我們所謂一個『現實家』，但是他的現實主義必有高深見地，他不會放棄原則，只求治標權術。他仍將世界政府分出可能的三大類：（一）一人統治的政府，（二）少數人統治的政府，（三）多數人統治的政府；世界政府的政體與國內政府相同，不過拿國家替代人做單位罷了。他仍會假設好壞的政府：好者乃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壞者乃暴君專制，寡頭政府，羣衆政府（此係沿用希臘原文意義，即 *monarchy, aristocracy, timocracy* 與 *tyranny, oligarchy, democracy*）。他會說明這些不同的政體的功敎如何，將如何退化，如何變相。他會應用他的動機心理學說：

『要研究政治革命及紛爭之所由起，我們必須首先確定影響到政制的開端及原因……：革命情緒的基本普通的根源，前面已說過，乃是求取平等的慾望，因為人都感覺他們與較富有的人，應該平等；或是求取不平等與優越地位的慾望，因為有人感覺他們所有，與庸弱的人相等，或是更少，並未超出他們；這樣自以為高人一等，也許不盡合理。』（註）

他會發現，求取平等與不平等及優越地位的兩個慾望，仍將在今日的世界聯邦中騷動，結果勢必引起紛爭與革命。他不致於假設一個世界政府，說它完美精妥，公正無私，內部不致因心理因素而起變化。亦不因爲屢次世界革命而變其體制。他祇會盡力建立最適當合理的政體，

（註）亞理士多德：『政治』，牛津版，一〇八頁，Jowett 譯本。

以保證最大的安全。他透識人性，看破人的弱點，所以重視現實，不去妄想烏托邦組織。但是他的頭腦，不像我們這樣機械化，他不會嘉納古爾柏森先生的國際橋戲，也不會信任國際警察的精密組織而說：『這是永久和平的基礎』。反之，假設今日的亞理士多德已讀過洛克（John Locke）著作，一定會馬上討論強迫和同意的原則及其反應。除了假設世界專制（一國統治他國），世界寡頭政治（少數強國統治他國），及世界民主（多數國統治）三類以外，他必同時假設一切的失敗，而各國分裂，回到各國自治的原狀。依現此國家觀念看來，這末一假定，甚屬可能。

亞理士多德，我相信，一定嘉納組織世界警察之維護世界和平的計劃。但是他必考慮這三點：（一）去巡治什麼？（二）誰去巡治？（三）誰該受人巡治？而說出理由。這樣一來，他便看出有些東西可以警察巡治，有些東西不能靠警察巡治。譬如說，他會相信，祇有大衆敬服的法律習慣，才能用警權執行，警權之產生，全賴人民的同意及公理，並不靠催淚彈和手提機關槍。巡治不合公理的世界秩序，就是等於維護正待改革的狀況。所以他必謹慎指出，在我們未決定用武力巡治某東西之前，先須認識那東西是什麼。譬如說，國際警團是否應該以武力維持原狀而彈壓所謂『反叛世界政府之行動』。第二，他必細察被巡治的區域的內況。他不會去嚴防和平的區域，而必集中精神於擾亂秩序，罪狀昭彰的強盜區。祇有歷史的經驗，方能指示我們誰該巡治人家，誰該受人巡治。爲示公道起見，他將堅持翻查舊賬，主張最好動兵犯人，最帝國

主義化的國家應受人巡治，信守善隣政策的國家，應該巡治人家。這樣，他或會出人不意，主張愛斯基摩人，爪哇人，薩姆亞人，中國人，美國人，丹麥人，瑞士人等等，應該巡治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葡兩國，雖一度曾為殺人不眨眼的海盜，如保證行為正常，倒可以考慮暫時給予自由。

可是鑒於『大國』的『求取不平等的慾望』，這種計劃當然不能實現。將來的國際警團組織一定是一種妥協組織，大家都可加入，以絕對平等為原則，不然便不成為警團，而成為權力集團了。在這個平等自主的原則下，國際警團不可『隸屬』於任何國家，正如市區警察組織不可隸屬於任何社會富豪一般。市區警察時或能給予社會富豪若干小便利。如在某幾條街添加燈光，某處移除『不可停車』的告示，因為他們稅付得多；但是這種便利，祇能在暗中行使，行使的程度，不可惹得社會中較窮的階級發動公憤。

這問題之上，還有一個哲學的問題；世界政府應該採取盧騷的放任主義，還是霍布斯（Hobbes）的管束主義；應該採取普魯士納粹式的警治政策，還是傑弗遜（Jefferson）和中國主張的民治政策。有許多問題，只要我們不多管閑事，必會自動解決。事實不言自明，治理的區域愈大，人口衆散，政府憑賴武力的希望也愈少。

中國人根據不賴警察律師治國四千多年的經驗，及治理寬大的幅員的經驗，必傾向傑弗遜的民主主義。一個相信以禮樂治國的國家，聽見德國式的警察政治，必定不勝詫異。中國大

概會領導衆國反抗警治，其對付警察，也自有其妙法。他們相信，警長太太生兒子時，義必送他一瓶酒，把他買好，謝他終日站在他們門前守衛之功。他們不知道他站在那裏的目的是維持公共秩序，因為在他們心中，寫格言的對聯和衆的譏評——『賊母生賊子』——就足以維持公共秩序。他們祇知道他站在那裏是替閩人開汽車門。他們自己並不鬧氣，但是他們知道，在大伏日子，拉他進來喝一杯涼茶，也能聯絡他。憑着這點處世經驗，他們知道沒有一個警察能拒絕這種結好手段。所以緬甸人，爪哇人，愛斯基摩人，薩姆亞人，高加索村夫，必跟隨中國人向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叫道：『什麼鬼話，我們爲什麼要你們來巡治？這裏沒有槍炮，也沒有降落傘部隊，爲什麼不巡治你們自己呢？爲什麼不去巡治莫斯科？』

此處可以順便談起美國一聲。論帝國主義，美國的歷史雖然不是無疵可尋，卻也不能算壞。美國人是民主主義的好信徒，所以不能成爲成功的帝國主義信徒。他拍着外國人的背，高興的時候還肯替印度人拉洋車。這是帝國主義信徒最該幹的事。美國人，你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天性。你今日拍一個人的肩，明天那個人便以爲他同你平等，而你的帝國也就此完了。人的念頭的確轉得奇怪，是不是？可是美國已蓄長了龐大的軍力，而軍力乃是一件危險的東西。我閃着眼等着看她如何使用軍力。美國已經發育到成年時候，有些像一個做考證工作的醫生，娶了一位社會交際花太太。『就是因爲戰爭，才結這門親事，』醫生解釋他的婚姻道。現在是繼續研究工作呢？抑是隨他風流妻子，到富戶區去掛牌行醫，替老爺小姐醫雞眼指甲小疾呢？這是

懸於這位醫生心中的大問題——美國目前唯一的重要問題。須知今日美國是站在交叉路口。做一個從事研究的醫生，我說。

一 揆篇第二十三

此篇引孟子之說言聖人與我同類及所以別於禽獸之人性以定人類平等大同之哲學基礎

我們還沒有決定人的本性是什麼。我們要組織人類世界聯邦，如不知其單位（人類），怎能成功？目前我們祇知道人類可分五種：白，黑，紅，黃，棕。但是白，黑，紅，黃，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一無所知。既不知他們的共同點，我們怎能把他們放在一起，叫他們合作呢？

在世界政府內，種族與國邦間的讎恨，必須消除。不僅世界幅員太大，世界政府所遇到的難題，不是任何一國家政府所會遇到的。一個國家通常有種族和宗教的分別，但是在世界政府內，除此以外，還有國族主義的分裂因素。這種分裂，只有一國之中種族常起爭鬪，才有相類的情形。可是一個國家如能不受種族和宗教歧視的影響而平安生存，其原理必與世界政府能不受國族主義競爭的影響而平安生存相同。瑞士共和國內，雖有種族和言語的分別，卻在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則下，平安度日。很顯明的，共同的信仰，聯繫住一個國家；若要聯繫住世界，也只得倚靠共同的信仰。一個國家內宗教的信仰或許不同，但是美國的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對民主思想和集團生活，都有若干基本共同的信仰。其次，他們都相信，沒有人較別人好。如果要世界變成一個大單位，我們必須培植這個信心：沒有國比別國好。

但是所謂「比他人好」有什麼意思？人的共同標準在那裏？我們須首先立一理論，證明各種族在人的地位上，都是平等的。第二，我們須證明，人類之共通性及其與禽獸之別何在。私人和國家間的情形相同：平等不能以智力或創造力或道德程度的標準來證明。平等基於這個玄妙的標準！人是平等的，因為大家都是人。

換句話說，如果要說得體面一些，我們可拿很難證明的「人類的尊嚴」做平等的基礎；說得「現實化」一些，我們可說我們是平等的，因為大家都是沒有尾巴的兩足動物。你相信「人類的尊嚴」說或是相信「沒有尾巴的兩足動物」說，全看你個人的觀點而定，因為一說沒有科學基礎，一說可用科學證明。有人以為良心的呼聲已足證明「人類的尊嚴」；有人認為那不過是空虛無稽的感情——這足以解釋，相信兩足動物說的人，應付其它國內或國際政治的問題，態度為何如此刻薄。所以甚至對於承認「人生平等」的根據理由，對其他問題，亦大有關係。如認為人僅是一個兩足動物，便沒有理由要憑良心行事了。相信人類天生尊嚴平等的人，必譏笑兩足動物的自然觀念，而相信兩足動物說的人，必認為對方的理論，全都是庸人的情感廢話。我們的標準是那一種呢？誰是對的？

在孟子的著作內「庸人的情感廢話」正多，他不僅相信性善，並且相信人的良知良能，並以爲單憑這人的共同的良知，就可見人類是平等的。孟子因此創立了全國所信奉的人道觀念，他的地位，僅次於孔子。孟子明晰地替人定了一個共同的標準，人類的「平等」，並不玄祕，

亦不借宗教觀念爲基石。甚至於同皮膚顏色都沒有關係。

孟子要替人立一個共通的標準，確立人與禽獸的區別，這區別，他已再三說過，不過在「幾希」之間。既然如此，我們今日就該洗耳恭聽。其實我已有些發急了。不管是誰，只要能用簡潔不玄祕的話說給我聽人爲什麼不是禽獸，我都願聽。過去一世紀內的科學知識的傾向，倒是使我們猜疑，人到底不過是禽獸，我們堅持「人的尊嚴」之說，不過是憑着一點固執成見，違背教授先生的高論，不肯平心靜氣的用腦子思想罷了。誰能用明白不玄祕的話給我解釋！

孟子看見一個乞丐的行爲，便爲一個奇怪現象所怔住；一切動物都把生命看做最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人有時卻不在乎。（孟子說動物的話，我想錯了。）他的推論是人在生存之外，尙有更有價值的目的，其次，凡人必認識這更有價值的目的。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罇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所以孟子說：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爲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不爲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

耳。』

孟子給人類立下的共同標準，乃是『心之所同然』，換句話說，那是共同的喜怒哀樂；團結我們，立定我們平等基礎者，即是這些共同之感。他更證明，人在心理立場上看來是一律的，所以味，目，聲，義理之感，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在解釋麴麥後，孟子說：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養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以天下之耳相似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義也理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義理之悅吾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更進一步指出人心四大共同點，這四點的要義是：第一，它們立定了人類的平等；第二，它們證明了人類的共同點；第三，一人如果失去這四點，便不成爲『人』。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亦作『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作如下證明曰：

『今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有心忘記提起皮膚顏色的區別，雖然中國，種族之多，竟使他說某一部人『南蠻駘舌』，其實，他明說過，『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其揆一也。』這種忘却皮膚顏色的立場，似乎可以使世界各國，不論『聯合』與否，培植種族平等的基本信仰。他沒有提起工業生產力的標準和今日生活的標準。就顏色，生產力及生活的標準看來，我們是永遠不會平等的。

因為生活的標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豈不每隔十年八載便變易一次？Wimpole Street 的 Barrett 府（即女詩人勃朗吟家），可有白磁浴盆？約翰遜博士可曾用過抽水馬桶，摩登衛生設備？迭更司可曾用過無線電？哥德可曾用過照相機？赫姆波脫（Humboldt）可曾放過冷熱水龍頭？他豈不是也用磁盆水桶盥洗的？特萊登（Dryden）可曾住過冷熱氣電燈設備俱全的房子？萊姆（Charles Lamb）可曾見過電影明星 Ginger Rogers，或用過新化學質牙刷？華資華斯可曾走過赫德生地道，或在 Merritt Parkway 汽車大道上駕駛汽車？莎士比亞生平可曾看過報紙，或說起一星期去看電影一次，或去聽 Flagstad 歌劇名家？他可曾看過約翰遜博士在一百五十年後才編的第一部英文字典？他在學校內的坐椅可能摺疊起來，課室光線可好？他可曾上派

克大道去看牙醫生！他吝嗇地遺傳給他妻子的『次佳牀』，可有席夢思彈簧！說得近一些，愛迪生可曾見過電影明星 Errol Flynn 和 Luther Burbank 可曾見過 Radio City。（紐約無線電城）Elinor Wylie（近代已逝的美國女詩人）可曾見過傳真！Will Rogers（已逝之美國幽默家，性好飛機）可曾見過空中堡壘！愛因斯坦可曾在大西洋無線電話中講過話！我們笑十九世紀末年的人的服裝舉止，二三十年後人家要笑我們。我們爲什麼要做宇宙的鑑鏡？標準在什麼地方？

這些不合理的假設必須廢除，人類的共通標準必須建立。孟子排斥了『兩足動物』的理論，以人心精神上之共同點建立共通標準。孟子這一說，乃是向今日的機械時代挑戰。

我們已談了很多重要的問題，排斥了千百項養豬式的戰後計劃，證明它們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無能，並把今日的混亂局面，追源於道德觀念的破產。我已設法證明，世界的混亂，戰爭，衝突，都源於我們對宇宙及人的概念的變化。我也設法證明，戰爭源於強權政治，強權政治源於對人類社會的自然主義看法，對人類社會的自然主義看法，源於科學的物質主義與定數論所加於人文研究與近代思想的影響。戰爭與和平這較大的問題，關鍵全在我們對人的觀念如何？他是一個化學混合物，機械性的爭鬭律的奴隸，或是釋迦牟尼以及其他古時聖哲所說的自由人？但是物質主義，自然主義，強權政治，戰爭，合組成一條緊固的鐵鍊，把今日的人縛住，使其無法脫身。在養豬式的戰後經濟計劃中，我們所知道的唯一補救方法，

乃是移置這條鐵鍊，把它寬放在機械奴隸的足踝或肩上。今日不乏蔚然大觀的專門科學知識，但是今日最高明的和平科學家，也不過是解剖專家，深知學理，只能告訴你感覺神經什麼地方最遲鈍，臀部什麼地方最厚，等到人家鞭你的時候，可以從容忍受，甚或感覺機械律之必然性，還帶着『此天意也』這種逆來順受的態度。沒有一個科學家有心去打破這些束縛人類精神的鐵鍊。

很奇怪的，我們碰上孟子，倒給我們恢復了人的精神觀，給我們定了人類平等的原則，世界合作的基礎，以及自由的可能性。他對人的估計較為體面，不像百年來無數科學家那樣把人當做機械所說的那樣下流。我不怕人家說我饒舌，一定要再說一次：物質主義的信徒祇能永遠混打下去。物質主義的信徒不能結束戰事或建設和平。他們的頭腦不行。他們沒有希望的勇氣，而且此刻也並沒有什麼希望。

奇怪的五尺的人，他能征服了這世界，卻怕區區的小念頭，定數論，似乎逃不出它的圈套！或許有一天他會豁然開悟，尋出逃逸之路，使他開悟的，不過是一點念頭，一把小鑰匙——天使將遺送給我們，用以打開束縛住凡人的鐵鍊——這鑰匙名『自由意志』。有了這把小鑰匙，普羅米恩斯 (Prometheus) 便可得解脫了。

後序

我的辭已盡，話已畢了。在每個時代，必有自由之神與反動妖魔，同時存在，凡是和平的戰士，何去何從，務必審慎決擇。誰曾經看見和平之神被擠門外，而猶躑躅簷下，依稀而不忍去，就要看見她低頭無言，轉移玉步，搭趟着走開。和平與權力是兩位妒婦，永不能同居一室。我們的當局現正同那個娼婦厮纏鬼混，狂飲作樂，而和平女神從窗外窺看，聽見屋內狂浪作謔行令傳杯之聲，就黯然回步，永不再來了。因為和平之神是一位名門閨秀，只有好逑君子，她才肯臨門。但是那些主持國家大政的當局，卻是些鄉愿德賊；他們並不愛她，只愛娼婦，而且她也知道。所以她就此退入朱門深戶，等到她知道我們真誠愛慕她，而不愛那權力婬子之時，才可重覩她的芳顏。

所以我恨那娼婦，並恨那些尋花問柳的人，因為我還為他們的子女後代擔心。和平女士就在我們的籬下盤桓，但是她永不肯進來。因為這時屋內，正在燈紅酒綠，恆舞酣歌。我的朋友正在醉生夢死，躊躇滿志。可不要小覷那娼婦啊，因為她自有她的魔力。男人一見她肌膚瑩潤，美色奪目，就如醉如痴，作起狂望，自比於陳後主，隋煬帝，或是什麼騷人墨士。他們眼看版圖之大，朝代之盛，就相告曰：『這回我們就真可將天下版圖收入我囊中了』。原來權小

姐這家娼婦的酒易醉，因為裏面有藥。

然而好景難再，千里搭涼棚總有拆散之一天。前夜醉舞酣歌，已成尼布嘎尼薩王國亡無日之末宴了。一場狂夢，忽然驚醒，將見劫運臨門，豪戶破產。拍賣行員將走入巨室，將祖宗的供像一一編號登記，倒篋翻箱，沸沸騰騰。一個粗夫就坐在娼婦前夜所睡的牀蓐，試試彈簧好壞。回頭搬運傢俱的人就要進來，滿脚污泥大步踏過地氈。祖宗的供像就和掃帚水桶七歪八斜裝運到拍賣行裏去。等到一切搬完四壁皆空之時，這家的子女，兄妹攜手怪可憐的從中門走出，也不掩戶而去，就此流為破落戶了。房子出賣，新主人搬進來，又從新裱糊牆壁，把新安樂椅放在壁爐前，說道：『鴻運新開了』。

但是，和平女士，請不要走開。我們還未打定主意呢。那些男人剛在開席飲權小姐的香檳酒，有幾個灌醉了，有幾個還清醒。和平的戰士，大家高聲呼喊，也許她還可聽我們的話。也許她還可以不走，只要我們對她說：『我們一致挽留你。無論你什麼條件，我們都可答應。這是我們無條件的投降。因為我們要請你來保護我們的子孫，以你的溫柔寬厚福庇他們。』

這是些簡單平淡的話。但是如愛默生所說，『除非我們有愛慕好尚之情，最簡單平淡的話也聽不懂。』彷彿這頹喪年代的強權政治家及學界批評家，中了什麼風魔，已經失了愛慕之心情及好尚的勇氣了。所以他們麻木不仁，無能建設和平。但是到了世人望治之心復懷熱烈的情調，而另一年代的人復能鼓起愛慕好尚的勇氣時候，那時和平之神就會躡足入我室內，從背後

兩手掩我們雙目，輕聲附耳說：『你猜是誰？』那末在我們毫無準備之時，她便不邀而來，成心在我們家裏住下去，來陪着我們，保佑我們及我們的子子孫孫。

